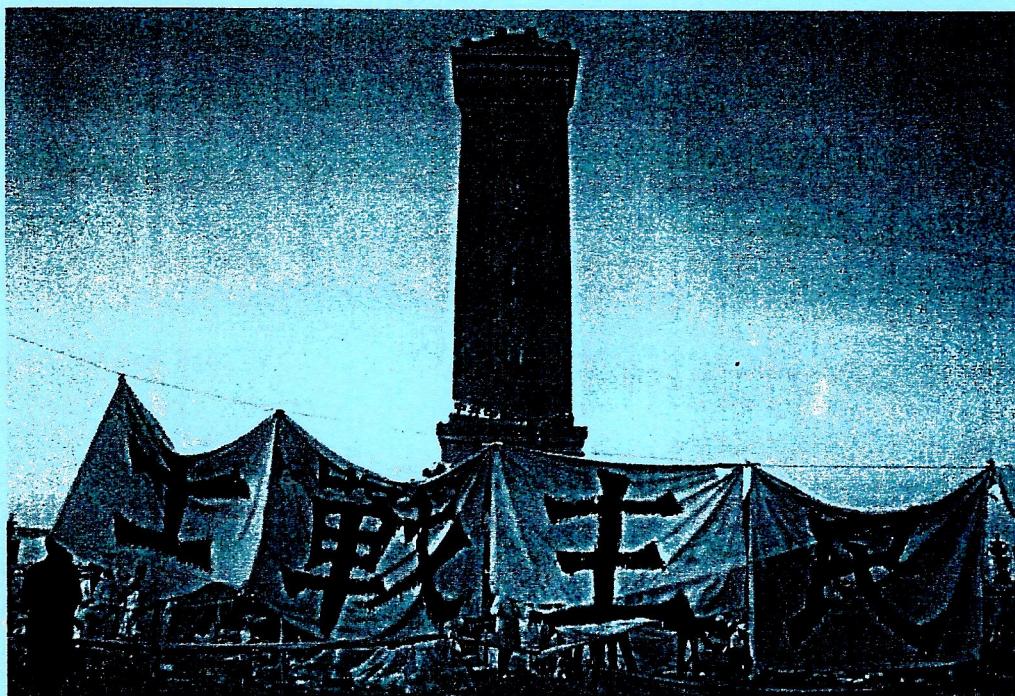


八九民運二十週年特輯

繼續努力爭取中國的民主人權



堅持港人治港，不要另一支管治隊伍

金融海嘯中的中國農民工

國際經濟危機決定世界政治

40 年前的國家大屠殺：墨西哥 1968

歐俄拉美左派專頁

堅持港人治港，不要另一支管治隊伍！

振言

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上，刊出《「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一文提出：香港的管治權，回歸後由兩支隊伍分管，除特區政府外，另一支便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這就把中央對香港管治具有的憲制權力，演繹為有另一支管治隊伍。兩支管治隊伍同時同地存在，便會像同一時期存在兩重政權一樣，兩者互相排擠。

即使中聯辦說，這篇黨校文章只是理論探討，但實際上，這支管治隊伍是一直不公開地存在，不時發出其影響力的，這是中共在大陸一向實行「黨的領導」的邏輯結果。

本來，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有憲制權力，這方面《基本法》有明文規定。中央在香港駐有解放軍，是行使憲制權力，但它並不應成為香港的另一支管治隊伍的一部份。外交部特派員公署也應如此。至於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它統籌中央與香港特區政府的一切聯絡工作，既標明「聯絡」，就是一個溝通的機構，就不是一個騎在特區政府之上的決策機構，不應是另一支管治隊伍。

但事實是，中央政府久已經過中聯辦，建立起香港的第二個權力中心。2004年港澳研究所朱育誠表示，香港過去一年發生一些事情（應該是指2003年50萬港人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後，中央對香港內部重新調整其政策，主導方向是不干預，但適當時候要有作為。

曹二寶文章也引用鄧小平六四後的講話作理論基礎：在考慮制定香港《基本法》時，不能使中央政府無所作為。

港澳研究所的董立坤更將中央干預說成是香港的需要，因為特區政府沒有執政經驗，管治水平有缺陷要提高。董立坤強調：這

個提法經過思考，並非干預，該中央管的就要中央管，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

曹二寶文章發表僅一周，澳門《新華澳報》有署名「永逸」的文章《中聯辦正積極發揮澳門第二支管治力量作用》，宣告江澤民時代的港澳辦和中聯辦的「守門員」的論點已經徹底放棄。

這一連串表現顯然已推翻了曹二寶的文章只是理論探討的遁詞，是替中央的干預製造輿論和口實，中央已憑藉其駐港的直屬機關建立香港第二個權力中心，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終於成為《基本法》的歷史裝飾品，但人們仍然「猶抱琵琶半遮面」。這與月前中聯辦官員提出特區政府與中聯辦有「十點協議」，後來又加以否認一樣，都是「欲蓋彌彰」的做法。

全港市民要爭取港人民主治港，實現真正的高度自治，不要第二支管治隊伍，不要變相的京官治港！

2009年5月15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6卷第1期（總第226期）

2009年6月4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繼續努力爭取中國的民主人權

——紀念八九民運「六四」二十週年

十月評論社

一九八九年中國學生、工人、市民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反對官倒的偉大運動，不幸被官僚統治者血腥鎮壓了！但二十年來的事實證明，這個運動所要爭取和所要反對的目標，是非常正確，對中國社會是迫切需要的。由於官僚層重新站穩了，使得他們的行徑更加囂張，對人民的壓迫箝制更加殘酷，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更被剝奪，官僚的貪污腐敗更加猖獗。而且，由於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造成錢權結合，大量幹部「下海」經商，合法地斂財而成為暴發戶，資本家正式成為黨員甚至黨領導人，當權黨已日益蛻變成資產階級性質，過去高唱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先鋒隊」等濫調已幾成絕響。九十年前五四運動所要實現的「德先生」（民主），在新中國成立六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仍無進步。

但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却更加分化，貧富更加懸殊，舊的福利已被取消，新的醫療教育等收費則日益昂貴，使廣大人民無力負擔，而工作又無保障，大量工人失業，官商勾結，搾取民脂民膏無孔不入，掠奪城鄉居民住屋土地，強拆民居迫遷，尤其是在農村，農民土地被賤價收購，無地耕種，生活更加困苦，「三農問題」日益嚴峻，成為「重中之重」。

當局的倒行逆施，不斷加深低下層人民的痛苦怨憤，加劇社會的矛盾，從而激發起城鄉人民更多更大的抗爭。近幾年來，許多統計數字都顯示，民間的抗爭在大幅度地與日俱增，單在 07 年已升到十萬宗，工人起來爭取權益的「勞資糾紛」更有四十萬宗以上，可見「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古語

沒錯。

社會在進步，各國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和改善生活的鬥爭在持續不絕，科技進步也在幫助人民的鬥爭（例如經過互聯網揭露不合理的事件，號召民眾參與行動等），極端殘暴反動的獨裁者，已難有立足之地；像現時中國的領導人也在人民的壓力下聲言要「以民為本」，擺出「開明」的姿態，但又不時露出壓迫人民的本質。

今天，我們要提出如下的要求，並全力爭取其實現：

1.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應立即宣佈平反八九民運和「六四」，確認其和平的遊行、請願、示威、集會等應有自由權利，推翻官員污蔑的「暴亂」定性；
2. 公布當時死難者、受害者的全部名單，賠償他們及其家屬的損失，追究血腥鎮壓的官員的責任；
3. 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在囚的不同政見者和「政治犯」，恢復他們的政治權利；
4. 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實行還政於民，推進民主政治，建立真正民主的政制，由全體人民當家作主。
5. 所有官員皆由人民民主選舉產生、監督和有權加以撤換，一切公民俱有選舉權、被選權、監督權等等，所有官員的薪酬待遇都與一般職工相若，杜絕貪污舞弊、假公濟私、享有官僚特權等弊害。

清除社會上的不平等和貧窮等弊病，與爭取得民主權利是緊密不可分的，祇有民主政制建立以後，才能帶來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快樂！

2009 年 5 月 20 日

特區政府每況愈下的表現

仲明

近日，特區政府的表現實在每況愈下。情況雖在意料之中，但卻令人不得不懷疑特區政府的管治愈來愈受中共官僚專制統治的干預。

特首關於六四的言論

八九六四的天安門廣場流血鎮壓，是擺在眼前的大是大非問題。根本的問題祇有一個：就是如何看待一個以鎗、以子彈、以坦克來對付爭取民主的人民的政權。任何一個中國人都要面對這樣的一個選擇，站在中共官僚的一方支持鎮壓，還是站在人民群眾的一方支持爭取政治、經濟、社會的變革。這個是對待天安門廣場那一夜所發生的流血事件的最根本問題，立場分明，容不下甚麼灰色地帶，更容不下一些轉換話題、轉移視線的廢話。

任何人都可以發表不同的意見，言論自由當然不是問題的所在。作為市民一份子，曾蔭權自然可以發表其意見。他可以迴避問題，甚至避而不答六四的問題。這是他個人的自由。相信沒有人會提出異議的。

但是，特首卻選擇了一個令人氣憤的方式，來回應立法會議員的提問，說甚麼：事情已是老遠的事，國家過去已取得重大的成就，對香港的經濟亦因而大有裨益。相信市民是明白事理的。他甚至大言不慚地說，代表市民表達這種看法云云。

這種回答在在顯示這位自命其志願是當政治家的曾蔭權，固然政治判斷不甚高明，就連自己在代表誰也糊塗透頂。

經濟領域的發展當然是任何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頭等大事。政府的施政目標就正是要人民的生活富足。責之所在，本就不足掛齒，

若論一個連溫飽也不能提供給人民的政權，還有甚麼可以構成其立於人民之中？不被推翻才怪！現在，曾蔭權好像把中國過去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說成是甚麼中共的豐功偉績、偉大貢獻，對香港是一大靠山。這根本就是混淆視聽、轉移視線的做法。

難道人民就祇有關心生活的份兒？日子過得好，就叫做國家大有進步？其它的就可以不用理會嗎？哪怕是指揮軍隊來鎮壓人民要求民主的運動？

這樣的論述是一個政治家的甚麼見解呢？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些都不是甚麼有見地的政治見解。它的意義，其實就是愚民政策的一個典型例子。是為中共官僚專制統治開脫的遮羞布而已！

特首為中共當年的血腥暴行開脫，完全可以理解。責之所在，身不由己。但是他居然還說成是廣大市民心中所想的一樣。那就真的是太過份了！

一個沒有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首長，說出這樣的話，真的令人極度氣憤！香港市民從來沒有選擇行政長官的權利。這樣子一個由八百個人選出來的官員，竟然可以大言不慚地，代表市民認同中共改革以降的經濟成就，以致可以把前事置諸不理，那怕是血腥鎮壓人民也可以無須理會了？

兩支管治隊伍的公開論述

除了曾特首的言論以外，另一個令人關注的言論亦最近浮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去

年在中共中央黨校刊物發表文章，談到香港的管治力量，在回歸後有重大變化。

據他說，回歸後的香港，在一國兩制條件下，有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和各級公務員；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

曹二寶在文章中說，中共 16 屆四中全會《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穩定繁榮列為黨的執政能力的一項重要任務，令中共在香港工作中的歷史方位發生了重大變化；管理好香港已成了中共及中共在港官員的重要工作及任務，他們作為一支管治力量將會合法、公開運作。

中共作為執政黨，行使其管治權力，本來沒有甚麼可以說的吧。在香港管治的範圍內，相信沒有多少市民真的天真到以為中共不會插手香港的事務吧！

問題從來就不是有沒有插手干預；有形或無形的干預，從來沒有或缺。也不是是否公然進行的問題。

香港市民應該不要以為可以獨善其身。以為中共官僚統治的惡行祇在深圳河以北才出現。其實，橫擺在眼前的是，專制獨裁的一黨專政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敵；是全國人民，包括香港市民在內，都要合力推翻的共同目標！

在八九六四二十周年之際，謹向人民英雄致敬禮！
2009 年 5 月 25 日

史實不容歪曲！ 謬論須予揭破！

-- 評陳一諤等人對六四的謬論

軍行

前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在任時，在六四論壇上發言，淡化中央鎮壓八九民運的罪責，只說手法上是「有啲(些少)問題」，同時醜化民運領袖之一的柴玲，說她是「走佬學生領袖」，質疑學生領袖們為何不可以理性方法解決，却作出一個不應該有的決定。言下之意是學生領袖堅拒撤走，才導致血腥鎮壓。他又反覆區別本地生和內地生對六四事件持不同立場。港大有些內地生也發表與他大致相同的意見。

陳一諤的言論立即引起全城以至海外的強烈反對，首先是港大學生會幹事會與陳劃清界線，發聲明表示陳一諤言論不代表幹事會立場。中大學生會更發聲明表示「極度憤怒及驚

訝」，批評陳一諤是「為劊子手開脫」。陳說要在六四期間赴美訪問王丹，王丹却迅速發表公開信，証實柴玲是同王丹們最後撤離天安門廣場的，以此答覆了「走佬」的指責。陳一諤的指責是否反映他潛意識中認為柴玲當時該被軍隊射殺，但她竟「逃走」了，使他引以為憾？！

其實，陳一諤說要遠赴海外查問真相，只是一種緩兵之計，繼續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的推搪之詞。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的史料和圖片，多得數不勝數，港大和許多的圖書館都可隨意找到，即使他當時年幼無知，以後也可很容易看到，倘若他真有求知求真的誠意，便不

難明白當日的一切真相，何況他是在香港就讀中學的（即使香港中學的教科書沒有講授「六四」事件的應有內容）。

不過，陳一諤就讀的是被視為左派學校的沙田蘇浙公學，雖然有大量左派學校學生也支持中國民運，參加紀念遊行和六四燭光集會，但陳一諤却表現出接受「愛國」思想主導，難以客觀虛心地求真求實，並不足奇。據2月8日《蘋果日報》報導：在今年二月競選港大學生會會長時，學生會刊物《學苑》出特刊，批陳一諤是左派學生，並列出他與親中組織香港菁英會一位主席王耀瑩有聯繫。（此外，香港部份傳媒也指陳一諤是「隱形左派」。）

至於許多來港升學的內地生，以前在內地所受的「愛國愛黨」教育薰陶，對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的官方歪曲可能深信不疑。而且，他們之中有些人家庭經濟在改革開放中獲益致富，本人得以來港升大學，也可能多少存有感謝國家甚至執政黨的情意結，他們在投票選學生會會長時，曾一度較多人投給陳一諤，部份原因也可能與此有關。

實際上，上述情況並不只是香港大學才有。據浸會大學《新報人》在四至五月間訪問了本港8所大學近800名本地及內地生，發現381名本地生與388名內地生對六四看法有分歧。五成六本地生認為，中央領導層須為六四事件負上最大責任，但只有三成六內地生持相同看法，逾兩成二更認為學生領袖及學生應負最大責任，而本地生則只有9%。

此外，對於中央政府應該使用武力驅散學生這個問題，不同意的本地生有70.6%，內地生有45.1%，持中立的本地生有22.6%，內地生有40.7%，同意及十分同意的，本地生有6.8%，內地生有12.6%。（引自今年5月22日《明報》）

然而，香港大學學生富有民主自由運動的傳統，保釣、中文運動、反貪污捉葛柏、金禧事件、八九民運等，港大學生都積極參與，這

一次，負責監察學生會的評議會眼見陳一諤當上學生會會長後所發表的言論引發社會上的廣泛反感，為了避免他繼續影響港大學生會的聲譽及對同學造成分化，起先是要求他就六四言論公開道歉，否則不排除採取進一步行動。結果陳一諤只就言論對同學帶來的影響致歉，而非就其六四歪論道歉，且堅持自己言論並非不理性。

為了重申港大學生對六四的立場，學生會舉行有關平反六四的全民投票。結果有效票1991張，其中1843票（佔92%）贊成平反六四議案，反對僅79票，棄權69票。這又一次表明港大學生是堅守一貫的立場的。

接着，在得到足夠學生會會員簽名支持後，啟動了罷免會長的機制，結果有1592票贊成，949票反對，114票棄權，通過罷免陳一諤會長職。

但保皇黨的曾鈺成却力撐陳一諤說，「任何人提出與主流意見不同的說話，是否就要遭圍剿或口誅筆伐，令他做了學生會長亦要下台？」<<大公報>>也刊出文章支持陳一諤。

這些都使陳一諤的「隱形」更加曝光了！而曾鈺成這幾句話也証實：陳一諤對六四的立場和意見，並非港大學生的主流意見，亦即是不能代表大多數同學的，他對血腥鎮壓民眾的統治者罪行輕描淡寫，對被壓迫的民運領袖却橫加指責，如果不起而揭穿、反對，就會被視為默認其正確，讓他一直欺騙大眾，矇蔽歷史真相；這怎能對得起六四死難者、受害者？

曾鈺成本人也發表謬論說：「六四下令軍隊進城開槍的是鄧小平。同時，他是開放改革的總工程師。平反六四，是否動搖了他？」這就是說，因為鄧小平主張改革開放有功，就不應平反六四，以免「動搖了」鄧小平。這個歪論徹底否定了平反六四的合理訴求，因為平反六四就會「動搖了」鄧小平的聲望「功績」的，這比「因噎廢食」還要遺害無窮！

同樣的歪論又出現在特首在立法會的答問中：「香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和看法我是明白的，但事件至今已經多年，其間國家各方面的發展均得到驕人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我相信港人對國家發展會作出客觀評價。」而且，他表示他這個意見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這顯然是強姦民意，正如吳靄儀議員所批駁的：是否認為只要經濟搞好，帶旺香港，便可不承認殺人。又是否為分享利益，便埋沒良心，見利忘義？這確是一針見血的指責。

他的一再失言，引起全體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反對，聲明他的意見不能代表他們，然後集體離場，以示抗議。事後他在記者會上公開道歉，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有如水已潑在地上，便「覆水難收」一樣了。

其後謬論愈來愈荒唐無理。香港青年發展網絡召集人呂智偉在城市論壇中批評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當年帶到北京「派錢」令事件完全變質。擔任主持的謝志峰當年在北京採訪，他隨即指出，華東水災時，港人也送錢到內地賑災，批評呂的言論是對歷史「麻木」，違背史實。司徒華亦指帶錢上京是為了送帳幕給天安門廣場露宿的學生，呂的言論是無良知。呂智偉這番言論表現出他的冷酷無情，同時向統治者獻媚，甘願為虎作倀，歷史將會對他作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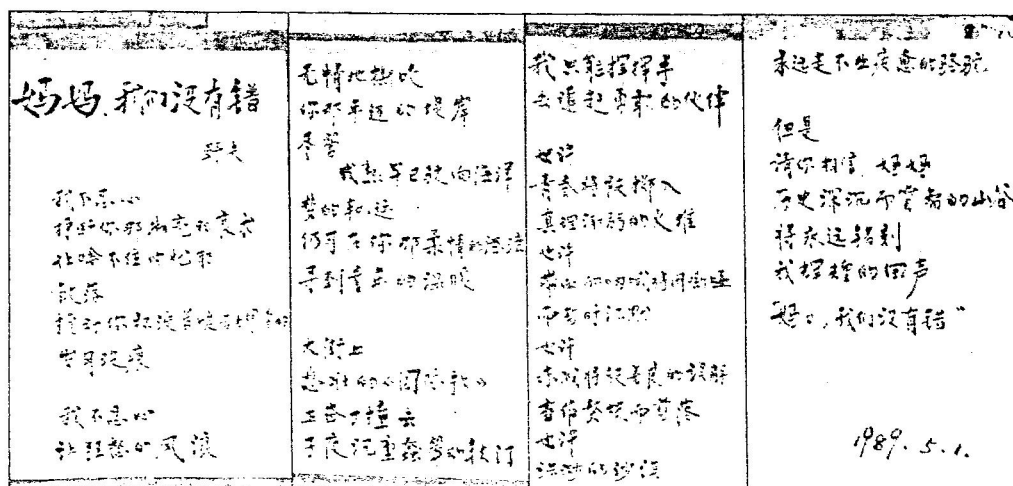
公正的懲罰。

事實上，李卓人當年帶款援助學生們，正代表了港人對北京靜坐同胞的同情支援，與當時 150 萬港人的支持民運大遊行相配合，兩者都是全港市民意願的反映。

而更有害的不只是言論上扭曲歷史真相，而且是民建聯、工聯會等在立法會反對平反六四的議案，以致這樣的提案一連十一年都遭這些保皇黨否決而不能通過。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琴還要強詞奪理地說：「現在還執著 20 年前發生的「小波浪」有什麼意義...，國家當年這樣做一定有她的原因」（意即有理由）。這個「小波浪」比中共中央後來改稱的「六四風波」更加平淡。但港大民調最新調查結果，61.2%受訪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創回歸後的歷史新高。這項民意顯示，民建聯等議員的反對平反，是違背大多數港人的意願的！

以上從陳一諤到曾鈺成，再到呂智偉等人有關六四的言論，反映出他們為了討好北京，便不惜扭曲六四鎮壓的歷史真相，堆砌諸多藉口去否定平反六四的合理訴求，抹煞了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性和必需性，損害了六四死難者、受害者及其家屬的應有賠償權益。歷史將來定會算清這些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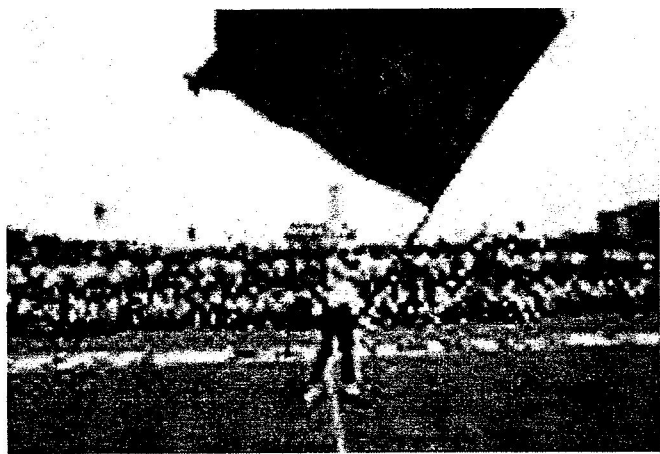
2009 年 5 月 25 日



評價趙紫陽對八九民運的回憶

張開

趙紫陽在 1989 年被鄧小平們指責犯有支持動亂、反對派軍隊鎮壓群眾、分裂黨等罪名而遭撤職並長期軟禁。在家之後有時間閱讀資料和思索，在親信的幫助下，口述錄下了他的回憶。錄音帶長達 30 小時，避過了監視他的公安，成功帶到美國，翻譯成英文，在「六四」20 周年之前不久，終於首先在海外出版了英文本，書名《國家的囚徒》，中文版取名《改革歷程》，也已面世。《明報》根據鮑彤兒子鮑樸提供的中文版原文，對該回憶錄作了較詳細的引述報導，把回憶錄所包羅的許多中國存在的困難、矛盾和中共內部的爭論、鬥爭情況，公諸於世，揭開了中共嚴密封鎖的內幕。以下的敘述絕大部份都引自該回憶錄。



關於政經改革

趙紫陽說：「大多數關鍵的改革，諸如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勾勒出中國極其成功的出口導向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給意識形態鬆綁（諸如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等），以便推動市場改革，都是由趙紫陽主力構思推動。」這個說法

與過去高度讚揚鄧小平為改革的「總工程師」大為不同。

他說：「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裏，開始也不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後，我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決人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惠辦法，這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 2%-3% 就不得了了，而我們經常增長 10%，但人民生活沒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裏沒有什麼模式，沒有系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這表明了：人民在辛勤勞動後，生活並沒有改善。

據回憶錄說：趙紫陽在八九民運前對政治改革的態度，仍是集中於對共產黨的領導的改進，提升內部民主及法治，並未想過一定要走議會民主路線。但八九民運後他相信，西式議會民主是中國必須走的方向，「如果我們不朝這個目標邁進，這將不可能解決中國市場經濟的不正常狀況：像是不健康的市場，濫權投機倒把、社會貪污猖獗以及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法治亦不可能實現」。趙紫陽強調，解決中國問題之道，在於循序漸進、但不能停下步伐的邁向民主，「我想已是時候認真處理這問題」。

他指鄧小平雖然強烈相信市場改革，但卻極度抗拒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西方影響，常強調獨裁手段的作用。

當然，將來哪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

制更好的、更高級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關於民主改革

趙紫陽說：「我相信鄧小平對現存的政治制度是有不滿的。但他心中的改革，並非政治民主化和現代化，而是某種行政改革，只涉及一些具體規管、組織、方法學和總體政治操守。鄧認為改革的前提，是維持共黨一黨專政，改革的目標是鞏固一黨專政，他反對任何削弱這方面的改革。」

在十三大報告時，鄧小平多次警告我不得受西方三權分立所影響，報告絕不可有分毫觸及這些想法。但我覺得若不推動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在持續深化上，將陷入重重困難。要解決貪污等問題，關鍵是透明度和民主監督，包括傳媒和輿論的監督，以及獨立的司法。

及至 1989 年下台後，我對中國政治改革又有更新理解。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太表面，只是由小撮人甚至一人統治。20 世紀存在過多種政治體制（例如君主專制、法西斯主義、無產階級專制等），但只有西方議會民主顯示出最強的生命力。這是現有最好的選擇。…台灣和韓國成功逐步從舊制度邁向民主議會制，是正面的經驗，可讓我們借鑑。」

筆者對趙紫陽（以及中共）常稱建國後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民主」完全不能認同，在官僚獨裁的政制下，根本就沒有民主，更談不到「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應該比資產階級民主，例如台灣和韓國所部份地表現出的還要民主無數倍，像列寧在其《國家與革命》一

書中所闡釋的。儘管台灣和韓國等地區的資產階級民主仍很不足夠、不健全，低下層市民難以和富人一樣平等地享有全部民主權利，但比諸中國大陸仍是遠為進步，值得中國大陸的統治者借鑑的。

趙紫陽進一步主張：「如果最終的目標是議會民主，執政黨必須實現兩個突破。一是容許其他政黨及自由媒體的存在。這可以逐步發生，但一定要追求。第二個突破是在黨內有民主，就是黨內需要實行民主程序，並使用民主手段去將自己改革……不同的意見可以存在，而不同派系亦應合法存在。」

這清晰地表明：趙所說「必須實現兩個突破」的情況，即黨內外都無民主的情況，一直存在，因而中共必須加以「突破」（改變）。

領導層內的鬥爭

談到北京定調六四事件是由於天安門廣場情況變得失控，黨不得不採取清場行動，趙紫陽反擊稱，是李鵬等強硬派的行動導致混亂失控，「若採取了正確的行動，就不會出現如此的結果」。趙在聲帶中解釋稱，初時他採用較溫和的態度，示威也漸漸有所紓緩，未料李鵬趁他出訪朝鮮，策劃了4月26日政治局常委會議，與其他強硬派人物聯手，說服鄧小平認為廣場的示威，已威脅到黨的統治，然後李就下令刊登4.26社論，將示威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因而激怒了許多人，令示威規模壯大。鄧小平接受楊尚昆的主張，決定派軍隊入北京，宣布戒嚴清場，進而開槍鎮壓；趙紫陽不同意《人民日報》社論這一定性，要求修改，提出以下三點質疑，並要求舉出證據：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但趙說當時說過，多數人是要求改正錯誤，而不是根本推翻我們的制度；第三，官方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而他則認

為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趙紫陽已經因反對調軍隊進入北京戒嚴而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根據回憶錄的英文版，他說：「我告訴自己，我絕不做調兵鎮壓學生的（黨）總書記。」在1989年6月13日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趙紫陽被指犯有「支持動亂」、「分裂黨」的錯誤而被撤銷一切職務。

重要的啓示

從以上引述趙紫陽的回憶錄部份地透露出來的情況可以看出：中共在一黨專政後實施的政策，造成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困難和問題，使得人民的怨憤日增，激發學生、市民、工人們起來抗爭，爆發八九民運，於是官僚層中有些人在強大的群眾要求壓力下，覺得必須進行某種改革，以圖克服統治危機，從而在領導層中出現了溫和的、甚至較開明的改良派，提出企圖改善黨形象的主張，趙紫陽就是其中一個代表人物。

可是，趙紫陽的主張即使十分溫和，而其

本人又是執政黨的總書記，仍然遭到黨內頑固、保守的強硬派（如李鵬等人）的猛烈圍攻，後者之中更有不少人是要乘機爭權奪位的。結果，趙被撤去所有職位。

這種發展再一次證明，官僚層害怕自己的政治經濟特權受到侵犯、損害，不容冒險嘗試改良。作為黨國太上皇的鄧小平雖然名義上是退位了，但仍然大權在握，依舊是整個官僚層的最權威代表，掌有最高的發號司令實權，甚至一人說了算，不必經過領導層按章開會由多數決定。他雖然倡導對外開放經濟，對資本主義者讓步，卻不願意對本國的抗爭民眾讓步，這種作風同斯大林的個人獨裁頗為接近。因此，趙紫陽的失敗並不是偶然，而是整個官僚制度所決定的。官僚層不可能自我民主改革，唯有經過外來的力量，徹底改變這個制度，才能實現民主，解決中國的重大問題：由此又一次得到啓示和證明。

2009年5月30日



金融海嘯中的中國農民工

青岩

資本主義世界爆發金融與經濟危機，使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中國，也直接受到影響，許多依靠世界市場而外貿訂單大減的中小企業，被迫停產以至倒閉，工人跟着失業，其中最受打擊的是來自農村的所謂「農民工」。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稱，2009年中國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因為“我們最擔心的兩件事情，其一是農民工返鄉問題，其二是大學生就業問題。”

2009年2月2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過去一年間，在一億三千萬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中，有15.3%，即大約兩千萬的農民工由於經濟不景氣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就返鄉了。陳錫文說，由於金融危機，外需減少，特別在沿海發達地區，過去主要從事外貿的企業遇到生產上的困難，所以確實有相當一部分的農民工失去就業崗位。年前國家統計局公佈全國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農民工的總量大概是一億三千萬人。¹

據新華社報導，農民工大省河南省2008年11月份便出現這種趨勢。從全國各地返回河南的農民工平均每天達到六萬，這一數字遠遠高出以往年份。河南共有2100萬農民工，其中1100多萬在省外工作。2008年12月，國務院曾對嚴峻的形勢發出警告，號召當地政府把支持農民工列為“重大緊迫的工作”之一。

2009年2月9日《南方都市報》援引廣州市人力資源市場主任張寶穎表示，據廣州市勞動部門對全市用工總量超過26萬人的397家規模以上企業的調查顯示，今年一季度企業用工需求普遍下滑。一季度有招工需求的企業

只占企業總數的58.7%，比2008年初的70%以上下滑了11個百分點；需求人數占當前用工總數的比例也從2008年同期的11%以上大幅降到了7.12%；有20%的企業表示一季度有可能減員；勞動市場求人倍率（即求職者人數和崗位需求數對比）從2007年初1:1.3下滑到了1:1.04，“基本上就是一個人一個崗位，這是多年來比較少見的。”企業提供的薪酬待遇也在下滑。張寶穎說，根據對16個行業的實地調查和全面平均測算，企業目前給予無技能要求崗位的月工資水平為1050元，比去年同期的1160元下降了110元，降幅在10%左右。目前廣州地區外來農民工回流就業的態勢明顯，預計元宵節後有超過90%的春節返鄉農民工回到廣州就業或求職，同時還會有不少

“新人”來廣州求職。截至目前抵達廣州的求職人員中大約有20.3%是第一次來廣州的，只有約71%是節後返工。張寶穎說：“老的在返回，新的還在來，珠三角的就業壓力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大。”同時，廣州作為珠三角高校集中地，今年應屆畢業生達33萬人，受經濟危機影響，他們的求職潮已從往年的4、5月提前到今年的2月初，這和農民工求職潮形成“疊加效應”，亦加劇供需矛盾。

2009年第2期中國《財經》雜誌指出，提前返鄉的農民工已經逾1,000萬人，失業的農民工更遠超此數。官方刊物《瞭望》亦表示，今年大學應屆畢業生以及上年未就業畢業生合計超過700萬。²另外，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稱，2009年將確保實現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5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4.6%的就業再就業工作目標。2008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即886萬人，比三季度末增加56

萬人。據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預計，中國 2009 年城鎮真實失業率將上升到 14% 左右。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報告，中國城鎮的實際失業率為 9.4%。

中國農業部副部長范小建在政協會議上發言稱：“2008 年下半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貧困地區的影響逐步顯現，貧困地區減貧速度放緩、返貧壓力加大成為扶貧工作面臨的突出矛盾。”范小建說，最貧困地區失業的農民工占這些地區全部農民工的近 30%，高於國家 2008 年底 15.3% 的平均值。他警告稱，許多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已經脫貧的農民一旦返鄉，僅靠農業收入，一個五口之家人均年收入可能下降十倍之多，返貧壓力顯而易見。2008 年，中國農村人均收入增長 8%，達到 4700 元，其中多數收入來自外出打工所得。

“與其他農村地區一樣，貧困地區同樣存在潛在的土地糾紛、農業生產投入下降以及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等問題。”國家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今年中國將加大扶貧開發力度，將扶貧對象擴大覆蓋至 4,007 萬人。³

中國農業部副部長危朝安表示，伴隨著農產品價格下滑，中國農村家庭面臨更多失業，2009 年達成農民增收政府目標的難度加大。儘管政府近期工作試圖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農民收入繼續以快於城市收入速度下滑。去年農民年平均收入為 4,761 元（696.2 美元），是城市收入的三分之一。危朝安更指出，一個部委調查仍顯示，一些沿海發達地區已經減少雇員達 30%。就業機會已經明顯減少，5 月和 6 月的表現將最為嚴重。他估計，約 10% 在城市製造業就業的農民工已經失業，其中 80% 正試圖繼續在城市裏找工作。另外，由於蔬菜和蘋果汁等農產品出口市場不景氣，鄉鎮企業出口增速也出現下滑。⁴

國務院的對策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農民工的就業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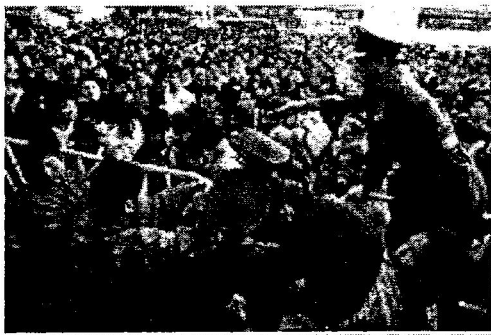
2008 年 12 月 20 日，國務院辦公廳專門發出關於做好當前農民工工作的通知，其中有六條大的政策：（一）鼓勵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的企業盡可能不解雇或者少解雇農民工；（二）對暫時沒有工作的農民工，各級政府都要給他們提供更多的職業技能培訓機會，增強就業能力；（三）凡政府投資的公共設施建設，都要盡可能地多吸納農民工，對於已經返鄉的農民工，政府要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鼓勵他們參加農村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四）政府採取一系列支持和補貼的辦法，幫助農民工回鄉以後創業；（五）要求各地切實保障外出農民工的土地保障權益，回來以後如果確實沒有其他的工作可做，家裏的承包地還在，還可以保證溫飽。同時還要求各地的黨委和政府要重視農民工工作，特別在當前，要做好監督企業對農民工工資的發放以及農民工社會保障經費的繳納等工作。



2009 年第 2 期《財經》雜誌的專題報告“農民工失業調查”有以下的判斷：（1）提前返鄉的農民工逾 1000 萬人。失業的農民工更遠超此數。2009 年上半年，若不採取有效措施，數字可能繼續攀升。（2）農民工大量失業，直接影響農民增收。目前，農民務工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接近 40%，也是農民收入增加的主管道。如果農民工大批失業持續半年以上，將嚴重危及農民收入增長，從而抑制農村消費。（3）失業農民工中，大多數人已屆中年。他們在家庭中是經濟支柱，不但承擔了上一代人的養老義務，還肩負著下一

代人的教育責任，負擔最為沉重。同時，新生代農民工亦佔有相當比例。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放下書包進工廠”，並無農業生產經驗，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對鄉村生活產生疏離感。他們無論返鄉還是滯留城市，都需要引起高度關注。(4) 農民工大量返鄉，會增加農村土地糾紛和衝突。由於農村土地流轉多屬於私下交易，缺乏成型的契約和合同，農民工返鄉必將加劇農村固有的人地矛盾。(5) 農民工失業，將考驗中國城鄉公共服務體系。由於城鄉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民工“二次就業”成本大增，各級政府在對農民工就業技能培訓、權益維護、創業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準備。(6) 大量農民工失業和返鄉，凸顯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失衡。由於大中型城市的公共服務和城市建設並未真正將農民工納入考慮，導致承載能力有限，因此戶籍制度未對農民工開放，相應的福利制度形同虛設。

鑒於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香港人權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發言人說：“今年中國很有可能出現動盪局面。只要失業率大幅上揚，就業市場僧多粥少，就會有這種可能。”這種動盪局面的威脅，將迫使當局可能加速發放援助款項吧！



從以上所引述的各種情況可以看出：中國農村的問題是十分嚴重的；大量農民工的失業，將會大大加重他們及其家庭的經濟困難，生活倍加艱苦；如果得不到解決，他們便很可能起來抗爭，造成社會的不安，使三農問題更添加不穩定和不利的

因素。

近幾年來，「三農問題」已被官方列為「重中之重」急待解決的問題，可見這問題的嚴重性、緊急性。上引國務院關於做好農民工工作的通知，必須要各級政府加以落實。但地方黨政幹部會首先為自己的利益著想，不能夠遵照《通知》做到很多，或者大都會像過去常見的「陽奉陰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樣的敷衍了事，「走過場」，這都是很有可能的。

三農問題在經濟衰退危機打擊之外，08年秋冬之間，北方又遭遇少見的乾旱，真可說是雪上加霜，農民苦上加苦。國家有巨額的財政盈餘，已決定用4萬億元抵禦金融危機，但這筆款項之中究竟有多少能確實地惠及農民，包括幫助農民工解決其燃眉之急呢？暫且等著瞧吧！

從制度來看，正如蒯轍元先生在《農民工問題的理論與制度思考》一文中恰切地指出的：「中國的農民工問題，是中國的城鄉二元社會在工業化進程中的產物。」中共當權後的政策使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合稱為「三農」）作出巨大犧牲，「城鄉二元社會在市場經濟中依舊分割的戶籍制度，和束縛農民的土地制度」仍未根本改革，農民工遭到的社會歧視、政治歧視、制度歧視，他們被定性為在城裏做臨時工的農民，表面上看是亦農亦工，實質是非農非工的流動人口。」因此，要解決農民工問題，必須改革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破除城鄉二元社會制度，實現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同等待遇的一元社會制度，即公民制度⁵。

¹ 人民網北京1月20日電

² 路透社北京1月20日電

³ 路透社北京3月6日電

⁴ 路透社北京3月12日電

⁵ 3月18日《文匯報》《論壇》。

大旱的警告

破謎

自 2008 年 11 月到 2009 年冬春季，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安徽、陝西、湖北等 12 省市區出現 30 年一遇的罕見大旱。截至 2 月 17 日，全國作物受旱面積 8383 萬畝，已接近多年同期平均水平（7600 萬畝），其中重旱 2679 萬畝，乾枯 421 萬畝，有 464 萬人、248 萬頭大牲畜（多年同期均值 811 萬人、538 萬頭）因旱發生飲水困難。旱情最嚴重時，河北、山西、江蘇、安徽、河南、山東、陝西、甘肅等 8 省冬小麥區受旱，面積高達 1.6 億畝。中國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曾於 2 月 5 日宣佈啓動 I 級抗旱應急回應。



截至 2 月 8 日，北方冬麥區 8 省日最高投入抗旱人數 1349 萬人、開動機電井 126 萬眼、泵站 2.18 萬處、抗旱機動設備 179 萬台套，出動機動運水車輛 28 萬輛，累計投入抗旱資金 32 億元。現在，8 省旱區受旱麥田已灌溉五成以上。

2009 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國家啓動 1300 億元投資計畫，其中 950 億分配給地方，用於保障性住房建設、農村“水電路氣房”建設、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等；呼籲地方政府要善於利用農民工因金融危機返鄉待業的機會，採取以工代賑等方式，發動農民大興水利，不誤農時。

《南方週末》專題《大旱背後》（2009.2.12）報導河南省蘭考、民權、睢縣三地嚴重旱災。他們發現在旱災肆虐的鄉村，村民喝完地下水

後，開始用漂白粉過濾山澗河水飲用。環保諮詢專家馬軍分析，全國七大水系已有三成失去使用功能，連農業灌溉都不行，“水資源利用不合理，水體污染，已經成為加重旱情的兩大因素。我們將逐漸喪失應有的抗災能力”。河南人均擁有水資源量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且近一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已不適合使用。

1950 年代中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灌溉系統，可是，隨著包產到戶和取消農村勞動積累工、義務工，這些集體水利工程大多遭擱置或荒廢。現在中國農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 30%—40%，河南的數字更低。水利部副部長鄂竟平承認及正視中國農田水利工程長期“欠賬”的問題。農業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風田說：“國家的投資都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反而忽略了對農民最密切相關的溝塘渠。”

《法制晚報》張永琪（引自華商網 2009.2.9）文章《我國 55% 耕地無灌溉條件 地方追逐 GDP 釀惡性循環》指出，“據水利部門的資料顯示，目前全國 18.5 億畝耕地，有灌溉條件的只有 8.3 億多畝，其他 55% 的耕地完全靠天吃飯；而水澆地中大部分灌溉標準不高，灌溉設施老化失修嚴重，真正旱澇保收的只有 2 億多畝。”張永琪批評盲目追逐經濟發展乃水利欠賬的深層原因，“水利欠賬多，其深層原因是農業對 GDP 的數字貢獻較小，很多地方重工輕農、重商輕農，導致農業發展失去應有的資金和人力支援。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種地收穫缺乏穩定性，投入產出不能成正比。農民越不肯種地，土地產出率就越低，對農民的吸引力就越小，甚至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根據《南方週末》報導，全球變暖使喜馬拉雅山脈冰川以超過了過去 300 年的 10 倍的速度融化，而且全國還有超過八成的冰川都是這樣。這意味黃河、長江、嘉陵江等重要水系都面臨著逐漸枯萎的命運。2007 年 7 月 12 日，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在全國湖泊污染防治工作會議上介紹，我國湖泊生態功能退化問題十分突出。新中國成立 50 年來已減少了約 1000 個內陸湖泊，每年平均有 20 個天然湖泊在消亡。長江、鄱陽湖的水位也持續下降，達到歷史新低。

上述情況的形成，除了自然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生態環境日益遭到破壞，森林植被日益減少，以致水土流失。

今年 5 月 6 日的香港《文匯報》指出，黃土高原水土流失、沙漠化和石漠化，是中國的三大生態危機，土地石漠化和沙漠化的成因有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其中，自然因素主要有地質災害，災害性氣候等；人為因素有毀林（草）開墾，樵採，放牧，火災，礦產開採，土地不合理耕種和工業污染等。人為因素是石漠化的最主要原因，引發的石漠化面積佔 63%。其中森林植被的破壞和減少是形成石漠化的主要原因。解放以來人為亂砍濫伐毀林主要有 3 次，50 年代末期毀林燒炭大煉鋼鐵，60 年代經濟困難時期毀林開荒，70 年代毀林造梯地和「人造平原」等，導致大面積的森林被毀，森林植被遭到嚴重破壞。

因此，要緩和、紓解上述的三大生態危機（至少是阻止它們繼續惡化），必須從消滅上述的人為因素著手，特別是停止人為亂砍濫伐毀林的行動，國家要帶頭採取多撥財政資源等措施，去植林、蓄水。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明史研究專家朱永嘉的網絡文章《再談憂患意識》（2009 年 2 月 15 日），借古喻今，指出山陝地區連年嚴重乾旱，是明朝覆亡的導火索。朱永嘉引述清人計雲計《明季北略》裏馬茂才的奏疏，敘述崇禎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陝北延安地區饑荒的狀況：“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唯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朱注：即觀音土）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而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於饑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不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

朱永嘉再引述《明奇北略》之《總論流寇亂天下》：“自寇起於崇禎之三、四年也，不過饑寒之民嘯聚山谷，所謂寇也。比五六七年間，放劫千里，出沒無方，此則所謂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後則不然矣，非複草賊行徑矣。”

對照現狀，朱永嘉有如此的擔憂：“全國有一億多農業勞動力在城市打工，農村的孩子都不安心在農村務農，讀書受教育是為了離開農村，農業的青壯勞動力從那兒來啊，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壓根兒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成長的，農民工在金融危機衝擊下，失業後，能回到土地上去嗎？恐怕很難，近代史上的湘軍是從農村中招募來的，戰爭結束，遣散回鄉都成為遊民了，三合會都是從遊兵散勇中產生的啊！他們是農村不穩定因素。再說農村的老齡化和空心化，比城市還來得早，它加劇了農村治理的危機，村一級政權處於半失控的狀態，村黨委的幹部缺乏好的候選人，黨員中年齡老化，文盲和半文盲居多，因而支部書記始終在少數人封閉的圈子轉。”最後，朱永嘉以清人鄭觀應《盛世危言》（光緒十九年，即西元 1893 年）作結，勸告今人不能對當前的大旱掉以輕心。

中國南方航空公司： 走向國際化的國家官僚資本主義

趙京

2008年11月29日，我接到 proxyvote.com 的 Important Notice Regar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Proxy Materials for the Shareholder Meeting 電子郵件，要我作為股東就12月29日召開的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特別股東會議投票。不用說，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是中國國內運輸飛機最多、航線網路最密集、年客運量最大的航空公司。

我立即在網上閱讀相關文件，選擇“出席會議”而不是僅從網上投票。不久，我收到了列印出來的投票證書。我馬上與廣州的維權人士唐荊陵聯繫，請他代我出席會議，並送傳真到中國南方航空公司表達我的意願（附件1）。我們的基本目的是：1）瞭解走向國際化的原中國國營大公司的股東會議程式（希望比其上司北京政權尊重基本法制）；2）利用機會表達對人權問題的關注；3）幫助中國的海外上市公司在國際上做生意時遵守“世界人權宣言”等原則。

12月3日紐約Mellon銀行(BNYM)(附件2)發傳真給我，說BNYM是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在美國的depository（存款者），我的股份ADR只能通過Broadridge投票，再由BNYM代理投票。其中，這句In practice, ADR shareholders can not present themselves in person and vote their ADRs at the meeting（現實上，股東不能本人出席股東會議投票）隱含“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官僚資本主義性質，把絕大多數的小股東民眾

排除在經濟決策過程之外，與“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把人民排除在政治決策過程之外同出一轍。²這正是我們要改變的。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既然跑到美國來上市，還能如法泡製，欺凌小股東嗎？

我立即與BNYM聯繫，指出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拒絕我出席股東會議，侵犯了股東的基本權利。因為美國證券法規正是基於大蕭條的教訓而設立保護絕大多數小股東的，特別在今天，所有美國人的退休基金等都以各種途徑流向股票市場，更需要保護小股東的權利，我保留向Securities & Exchange Committee(SEC，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申訴的權利。BNYM馬上理解了我的意向，說他們只管報告股東投票的結果，而沒有權利過問股東是否能出席會議，並把我的出席會議的意向同時轉送給我和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我為了不把事態弄複雜，用信件送出了投票（而沒有等到開會時才在會場投票）。

直到會議前夕，我沒有收到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的任何答復，就判斷中國南方航空公司不會違背常識阻礙股東出席股東會議。以下是唐荊陵的“南方航空股份2008年12月29日臨時股東大會會議情況彙報”：

[我於早上9:20到達位於新白雲國際機場南工作區的南航明珠大酒店。上到四樓的會議廳，門口正進行入場登記。]

接待人員問我是否辦理過股東出席登

¹ 據公司2008年第三季度報告，公司總資產為878.37億元。見

http://www.cs-air.com/cn/investor/other/c_01055ann-20081029.pdf

² 正如背著中國民眾向華盛頓當局出賣中國民眾利益的北京當局貿易談判代表龍永圖謾罵廣州市民是“刁民”一樣。

記，我答復說我是作為代理人出席會議，股東本人已經向公司進行了必要的登記。我看到桌上的股東簽到表只有寥寥幾個大機構股東。我報出我代表的股東名字並出示我的委託書、身份證等文書，對方顯然是有備而來，稱不能確認我所代表的股東身份。我讓接待人員再給予核實。後出來一位徐小姐，稱趙京為ADR（存托憑證）持有人，不屬於A股、H股股東，不具有會議出席資格。並稱ADR持有人應向其經紀人表明投票意見。

我指出我來是要代表股東發表對公司經營相關的意見，如果公司在我方的出席資格上出現錯誤可能導致嚴重法律問題，且趙京先生已經就此事與南航公司取得了一致意見時，徐小姐聲稱已經就此問題諮詢過中國和美國方面的律師，公司方面還曾向美國投行查詢以便確認趙先生是否為ADR持有人，但對方聲稱因為隱私保護的理由不能提供有關資料，故他們不能確認趙先生或者其代理人的出席資格。

經過交涉後，徐小姐聲稱願意接納我在會議旁聽區參與，但不能作為股東代表發言。我進入會場。會場前方是排成正方形的會議區，圍著就坐的為董事會成員、監事會成員、見證律師、董事會秘書等成員。後方為旁聽區，新聞黨委辦等在旁聽區。會場左後方是董秘辦的區域。出席會議的董事長（代）為李文新。會議通過書面投票方式通過了擬訂的議題。投票前，出席會議的兩個大股東博時基金和國泰基金分別就具體經營上的一些問題提問並得到解答。在投票等待計算票數和休息的間隙，董事長到靠近旁聽區的股東席上和上述兩家基金的代表談話。我趁機會直接和李文新先生打

招呼，並表明我是代表美國的ADR持有人趙京先生來表達對公司經營戰略問題的關切：一是公司方面是否注意到了在跨國經營中人權問題對公司發展戰略的產生重大影響的一些案例？比如雅虎以及一些石油公司；二是公司方面是否對自己所從事的商業活動可能產生的人權問題作過評估或將採取什麼對策？李先生沒有立即回答我的問題，請我和董事會秘書謝兵（該人列席會議）聯繫。我正和李先生談的時候，董秘辦的一個女孩子趕緊過來，很緊張地看著我們，似乎想阻止我們交談，但因為整個談話不長，她最終沒成功。

投票結束後，會議於10:15分左右宣佈結束，我找到謝兵先生，他給了我他的卡片，聲稱他知道我們的情況，因為他始終都得到過有關這個事情（我方準備出席會議和交涉的經過）的報告。他介紹董秘辦的徐小姐（前面出來交涉的女士）給我，請我們將有關意見發給他們。

徐陽 證券事務代表
xuyang@csair.com

謝兵 董事會秘書
xiebing@csair.com



原來，中國南方航空公司這些天默不做聲，正是爲了這樣對付我們這樣的小股東！我馬上致信中國南方航空公司（附件 4），請其回答 1）：爲什麼不在會議之前答復我的出席會議意向的通知？2）拒絕我的代理出席會議的依據是什麼？

2009 年 1 月 11 日，我接到了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徐陽以 Company Secretary Office（公司秘書處）名義於 1 月 7 日發出的第一次對我的答復（附件 4）。這個答復表現了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的傲慢與偏見。它沒有回答我的提問，也沒有出示任何法規拒絕股東出席會議發言，還聲稱唐荊陵沒有出示 effective shareholder's identification（有效證明）。如果股東投票證書不是“有效證明”，什麼算“有效證明”？我（以及所有的美國股東）憑這個證書出席股東大會，從來沒有被拒絕過，爲什麼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有權自行要求“有效證明”？

我 2009 年 1 月 13 日再次致函中國南方航空公司（附件 5），希望中國南方航空公司誠實地對應。

1 月 21 日，我接到徐陽的電子郵件，問能否在北京時間 1 月 22 日上午 9 時與我通話。我立即答復可以。遺憾的是，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沒有來電，讓我空等許久。我只好於 1 月 26 日向 SEC（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申訴（附件 6）。

2 月 2 日，我意外收到來自北京的電話。原來是一家英國律師事務所 DLA Piper UK LLP 北京辦事處的 Partner（合夥人）Liu 先生和徐陽女士打來的。我請他們把談話的內容用書面表示，不久即受到 Liu 的電子郵件（附件 7）。我回函要求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確認 DLA Piper UK LLP 有權代理中國南方航空公司與我交涉，並再次聲明向下一次股東大會提交書面提案的意向。

2 月 11 日，我收到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秘書
十月評論 2009 年第 1 期

謝兵的電子郵件，附帶題爲“謝總”的檔（附件 8）。這實際上是經歷了這麼多回合，代表公司的秘書給我的第一份正式回復，其中包含足以說明目前中國的一黨專制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官僚資本（所謂“國營企業”）的國際化特徵的資訊。

首先，按照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章程第 76 章第 16 節，只有持有 3% 以上股份的股東才有權向股東大會提案。除了持有大多數股份的國家官僚，持有 3% 以上的股東幾乎不存在，這就是爲什麼唐荊陵“看到桌上的股東簽到表只有寥寥幾個大機構股東”。這“寥寥幾個大機構股東”即使有個別股東持有超過 3% 的股份，也絕不敢挑戰持有大多數股份的國家官僚，其結果使得整個公司被置於國家官僚的幕後黑箱操作之中。

更重要的是，像美國這樣，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被置於股票市場支配之下，面對動盪複雜的股票市場，必然要求對普通小股東有更多的權利保障，而參與股東大會就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所以，不能由各個公司自行制定股東的權利，而必須由證券管理委員會來統一決定。例如，參照美國 SEC Rule 14a-8，持兩千美元以上股票價值的股東就有權提案到股東大會表決，在中國，可以讓持一萬元股票價值以上的股東有權提案到股東大會表決，這樣才初步體現基本的經濟民主原則。要達到這一點，除了需要越來越多的中國股民的參與外，³更需要中國的民主化。⁴另一方面，黑洞操作下與國際帝國主義資本豪賭的中國“主權基金”也日益需要接受中國民眾的監

³ 這一次唐荊陵的參與就是一個先例。

⁴ 我清楚地記得一個金融資本的代理得意地炫耀他如何利用機會，促使江澤民下定決心實施股份制。這也由江氏的所謂“三個代表理論”（首先是代表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體現出來。

督管理。⁵

其次，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有意劃分出 shareholder（股東）和 holder of ADRs（ADRs 持有人），以我通過 BNYM 購入公司股票的路徑為由，把我定為 ADRs 持有人，進一步否認我出席（或指定代理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基本權利，是對“股份公司”制度的粗暴侵犯。無論通過任何第三途徑（公司為了擴大吸資渠道，總要通過各種渠道發行股票，就如中國南方航空公司通過 BNYM 在美國出售股份才吸引到我這樣的小股東），只要能夠證明持有公司的股份（正如中國南方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承認我持有其股份一樣），就有權參加股東大會。按照美國設立 SEC 的基本精神和 SEC 保護小股東的基本原則，中國南方航空公司這樣的粗暴違反股份制度的股份公司應該被趕出股份交易市場。我於 2 月 20 日再次向 SEC 申訴，要求 SEC 履行職責，維護美國股份市場的公平和安定。

3 月 21 日，我終於收到 SEC 發出的日期為

⁵ 廣州的鞏勝利在《北京之春》2009 年 3 月號“誰能監管中國主權基金？”一文中問道：“中國外匯交易買賣，中國‘主權基金’進出海外，從來沒有給中國納稅人、‘國家主人’——公民們任何交代”“中國‘主權基金’沒有透明度及中共黨的政治意圖，國家外管局很少發表公開聲明，從未透露過投資標準及已經投資的產業，像‘黑道’一樣格外掩飾在世界各地的投資。”“中國國家外管局目前有旗下三家分支機構在運行操作中國‘主權基金’在國際資本運行，概不公佈外匯交易，也不發表任何公報，更不告知 13 億國民。”

“中國購買美國國債、企業債券，在中國國內從未公告過，就是號稱最高權力——全國‘人大’也從來沒有數字公佈。”“中國擁有美國大量的國債和債券，這個決策是怎樣出籠的？執行操作又是怎樣做出的？由誰決定拍板，由誰批准執行的？操作過後為什麼不向全國納稅人及全國人大報告？最關鍵的是沒有‘陽光化’規則，有地下‘黑幕’交易。”“這相當於近兩個 29 屆北京奧運會投入的中國國家債券交易所得傭金，又流向何方？有沒有人以權謀私，中飽私囊？難道不該公告，給中國公民一個交代嗎？”“目前之中國，不管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還是國家監察部，或是新成立的國家反貪局，以及中國銀監會、國家證監會等所有中國監管機構，都無法對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子公司操作外匯、運行進行有效的監控，沒有形成任何監管機制能審查中投公司在中國之外及美國註冊地的外匯帳戶，中國監管當局無權進入美國進行監管該公司，而美國監管當局又無法監管設在中國的該公司運作，特別是在美國、歐洲等資本市場運行交易，中國對監督外匯交易沒有任何遊戲規則。”

3 月 11 日的信函回復我 1 月 26 日的申訴（附件 9）。看來，SEC 把我的申訴編號為 HO1312999 正在進行調查，但是告訴我，除非 SEC 通過調查，發現問題，決定對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向司法機關提出起訴，否則不能通告我調查的狀況和結果。我除了等待以外，別無他法。至於 SEC 是否會對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提出起訴，不容樂觀。除了 SEC 自從金融危機以來忙於應付更大的案件無法調查我與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的這件“小官司事件”外，通過我與 SEC 打交道的經歷，我更擔憂 SEC 一貫的偏袒大公司的做法。因為 SEC 拒絕我這樣的微小股民，沒有什麼代價，但要起訴大公司，會遇到大公司雇用的律師的抵抗，代價高昂。何況，在目前美國政府需要中國政府“幫助”之際，很難指望 SEC 會秉公勸告、指導中國南方航空公司遵守美國法規而嚇跑來美國上市的中國的國家官僚資本。

這件個案再次證明，不能指望任何國家權力會自動保護普通民眾的經濟政治權益。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只有我們每一個地球公民在自己的所在國度挑戰、監督、改變政府的政治權力壓迫和經濟制度剝削，才是最有效的防止人類文明倒退的方法。

2009 年 3 月 24 日於美國聖拉蒙
（編者註：附件冗長，故略去）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0144 號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 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 元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 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 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 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 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 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 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 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 元

經濟危機多方面地決定整個世界政治

弗朗索瓦·薩巴多

〔第四國際 2009 年 2 月的國際委員會會議上作的這份報告，在 2008 年 11 月執行局會議提交的報告結構內，發表在 2008 年 11 月的第 406 期《國際觀點》上，題為“評金融危機”。〕

1. 最近的事態發展證實了危機的深度和持久，尤其是它的制度特性。

這不是一個短週期的危機。金融危機與生產過剩的總危機相吻合並加重它。信貸的癱瘓正在逐步減少經濟活動。這場危機已經蔓延到整個世界。其規模可與 1929 年的危機相比，但不同於 1929 年，危機是全球整體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擴大到整個世界經濟。資本主義全球化已構成了世界商品市場，實行了廣義的“再商品化”運動，並為一個世界勞動力市場創造了條件。

因此，這場危機具有整體性質。它有幾個組成部分：經濟危機，銀行和金融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氣候危機。2009 年 1 月貝倫世界社會論壇（WSF），實際上最清楚地表達了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的這種結合。一些人想把貝倫論壇中心限制於生態環境的問題；事實上，從標誌著本次論壇的各個方面來說，這次中心是經濟危機。

資產階級及所有的“專家”們擔心焦慮。他們沒有一個替代模式。他們正在討論各種情況，但沒有專家能看到一個擺脫危機的方法。他們設想 2010 年底的“軟”復蘇，或者一個日本式的危機：一個近 10 年的持久通貨緊縮，但沒有人敢預想一條擺脫目前危機的路。與 1929 年不同，各國政府和行政當局進行了干預，以圖遏制它。在一

系列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用作減震器...但要到何時？

當然，這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結束，因為只要沒有任何的替代品，也即直到反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可以實施以前，對於該制度不存在“沒有出路的局面”。它總是可以創建新的迴旋餘地。資本主義可以同它的危機、它的痙攣、它的衰退一起苟存下去。所以無處可容納大難臨頭的說法，但目前我們清楚地看到，該體系已達到了極限，資本主義危機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的代價已經把擺脫這種制度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對有些人，這是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的改革問題；對於反資本主義者來說，有必要同資本主義決裂，推翻它。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將有這一危機的‘前’和‘後’。

2. 因此，我們處在深刻而長期的危機中

*銀行和金融危機在繼續：“有毒”產品在毒化該制度。

出現了“垃圾桶銀行”或“壞銀行”的說法，其用意是剔除所有的“有毒”金融產品，但由於他們並不真正瞭解金融產品的深淺，所以他們不能決定用什麼價格回購這樣或那樣的產品。結果，各國政府要麼倒退，例如美國，要麼害怕啟動機制，會曝露更大範圍的未解決的信貸問題。避稅天堂繼續發揮作用。金融市場的不透明性阻止發展新的控制機制。銀行發放的貸款越來越少。國家的貸款，援助和資助不能得到保證，因為銀行的情勢依然令人懷疑。即使政府貸款很難進行談判。去年 12 月在德國有警告。一些

國家已破產，比如冰島。而希臘，匈牙利，巴基斯坦，西班牙和立陶宛則局勢危急。新的銀行破產可以把該制度系統進一步拖下水。公共財政不能無限期地延伸，除了印刷更多的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進入危機的一個新階段...。斯特勞斯卡恩代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了干預，要求給銀行更大規模的國家援助，用以重新啟動信貸供應，對政府提供的資金沒有達到危機的規模表示遺憾。因此，國家的償付能力和債務的暴增有限。在這個階段只有美國，由於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角色，有辦法繼續其負債政策...

*生產過剩的危機---在銀行和金融危機之前，它已出現在某些部門 --- 已經遍及各處。

世界經濟正處於衰退狀態。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約為 0.5 %。美國和歐洲聯盟國家則是負增長。我們正在目睹工業生產的下降：美國下跌 9%，日本下跌 9.8%。成千上萬的公司關閉或裁員。漸漸地，每個部門都受到影響。美國有 7.2% 的失業率，即一千一百萬失業者。據克莉絲蒂娜·羅默和傑瑞德·伯恩斯坦（奧巴馬的經濟顧問）的一個報告，在未來幾個月內有 300 萬至 400 多萬的就業機會可能會喪失。通用汽車公司和克萊斯勒公司仍然需要幾十億美元，才能維持不垮臺。關於失業問題的預測令人印象深刻：經合組織國家會有超過 3000 萬至 5000 萬失業者。這是一個真正的失業浪潮。至少在 2009 年和 2010 年，該就業的萎縮和失業率的上升將繼續增加。我們會有自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最高的失業率。

* 危機是世界性的。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和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情形，兩者之間並無關聯，這個假說還沒有得到證實。中國經濟增長下降了 7 至 11 個百分點。根據中國海關數位，貿易出口量 11 月下跌 2.2% 和 12 月下跌 2.8%。進口則萎縮了 21.3%。上海有數以千計的公司已經關閉，數以十萬計的中國

人，首先是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發現自己要失業了。無可否認，百分之七的增長速度證明了中國經濟的實力。危機甚至會確認世界經濟重心傾向新興國家的改變趨勢，但在該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美國和歐洲。更重要的是，這場危機將導致中共政權優先發展國內市場，在很大程度上，這也將取決於政治和社會的鬥爭，包括在共產黨內部...但是，在這場危機中，中國經濟能夠成為重新啟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成為帶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台火車頭嗎？目前沒有這樣的證據。更何況還有如俄羅斯和印度這樣的國家也開始捲入了經濟衰退。



3. 新自由主義“模式”遭受了歷史性失敗

華盛頓共識爆裂了開來。統治階級，新自由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政府已遭受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失敗。有一種新自由主義的一致性，即：私有化，靈活性，放鬆管制。今天，這一致性已經移位脫臼。但他們還沒有遭受到社會的失敗。離政策或方向的修改還很遠，他們的政策就是“堅持頂住”，使工作者和人民負擔危機，並把新自由主義的框架同一系列的設計或“堅持頂住”措施結合起來，希望...這場危機將結束，他們能回到正軌！此外，資本家利用危機重新調整公司結構，推進公司高度融合的過程，繼續壓低工資...

因此，有變化，有新論述，有保障措施和局部經濟刺激措施，但他們並不質疑總體的路線。我要從這個角度論述三個問題。

3.1. 凱恩斯主義回頭了嗎？

可能有一些劑量的凱恩斯主義，一種凱恩斯主義的代用品，注射進新自由主義政策，但不會有新凱恩斯主義的回頭。無可爭議，有國家在經濟方面，在挽救銀行方面的新干涉主義，有工業和金融集中和重組的政策。同整個極端自由主義的列根和戴卓爾腔調--- 少而又少的國家干預 --- 相比，這是一個改變。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這是個管制鬆散的國家，私有化的國家，摧毀了社會成果的國家。我們不應該混淆講話與現實：國家從來沒有消失。今天，國家的干預是要保存制度，絕不是重建“社會性國家”。國家並不會爲了捍衛普通民眾而進行干預。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和民主黨左翼鼓動家保羅·克魯格曼，在他的博客上表示的：“讓我們弄清楚，它完全是黃色社會主義：損失社會化而利潤私有化”。只有考慮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全部有關層面，凱恩斯主義的討論才有意義。這不是關於這個或那個經濟措施的一個討論。

從這個角度來看，毫無疑問有一個“浪漫”的凱恩斯主義觀點，但如果我們用1930年代中後期的美國以及戰後歐洲的政策，作爲一個參照點的話，情形就遠非如此。

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選擇，不是統治階級內部一場意識形態辯論後的社會經濟建設選擇。它是力量關係促成的，美國工人鬥爭的高漲，使得公共政策和工資政策上的轉變有必要。但最重要的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執行，依據於軍火經濟，該經濟同戰爭和一些勢力有關，這些勢力同特殊的社會和政治運動相聯，而那些運動促成了戰後的“社會妥協”。是戰爭造成的破壞，使得戰後必須要重建，從而爲經濟復甦創造了條件。

因此，那些是特殊情況中的事件。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危機深度以及各種有必要“重新發現資本主義”的論述同行動兩者之間的不平衡。有一些象徵性的決定---如美國某些收入的高端數目被封頂，英國政府的代表出現在英國銀行的管理董事會上---，但並沒有關閉的避稅天堂，沒有新的金融規範或有效的信貸控制，以刺激經濟活動。還沒有採取技術上和財政上可能的措施。例如，瓦勒裏·季斯卡·德斯坦聲明（發表在2009年1月12日的世界報）證實了這個事實，即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尚未建立新的財務準則，新的審計程式，新的條例（例如，有關銷售你所沒有的金融產品這種“賣空”做法）。

但更重要的，必須強調的是，所有的刺激方案都被認爲是不夠的。有分歧存在：法國計畫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5%至2%。七千八百七十億美元的奧巴馬計畫則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分量更重。但是，我們必須看看這個計畫涉及的美國危機的深度。據奧巴馬的經濟顧問克莉絲蒂娜·羅默和傑瑞德·伯恩斯坦的說法，這一計畫只會把失業率在2010年底限制在7%至7.5%之間---比現時的失業率多一點---如果沒有計畫，預設的失業率是8.8%。更重要的是，在共和黨的壓力下，公共開支減少了910億美元，減稅額增加了640億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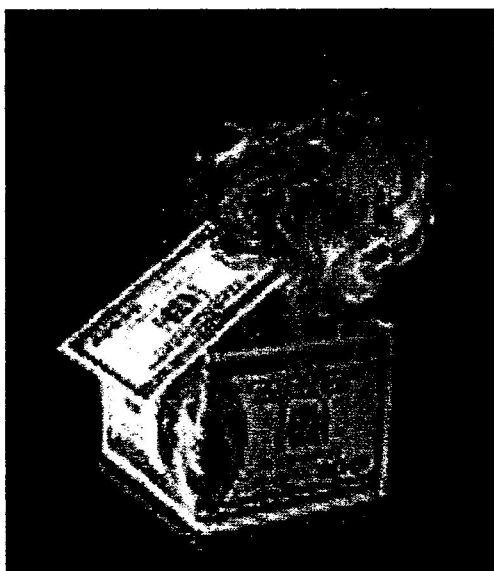
美國政府的計畫和決定，考慮到教育，社會保障，某些大公共工程的新公共開支，但如果我們給銀行，給富人減稅，給公司援助投資加上二萬億美元---但在什麼樣的控制下？---並且限制旨在刺激需求的措施，我們就不會找到危機的出路。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保羅·克魯格曼的說法，刺激方案只能彌補增長所喪失之潛力的一半。相對於按現有的生產能力和勞動力預計的增長，可能的增長將只有一半，這已經使奧巴馬受到了民主黨左翼的尖銳批評。

塔多·帕托的文章[我們將出版該文]，談的是目前政策和凱恩斯政策之間的關係，

它解釋說，在 1960 年代末，德國社會民主黨部長制定了凱恩斯刺激方案。這項計畫是 400 億德國馬克的公共投資。今天，將相當於 400 億歐元。然而，德國政府只投入了 50 至 80 億歐元。

在美國和歐洲，他們又在談論銀行的“國有化”。我們不能從理論上排除銀行的“資產階級國有化”。換言之，即“臨時和部分”的國有化，用以挽救資本主義銀行體系，但我們不應該誤解國家干預的含義。實際上，為了挽救銀行系統，只有通過國家和大規模援助進行干預，對問題銀行作或多或少的國家控制。在英國，政府代表參加銀行的管理董事會。當政府或專家們設想“國有化”時，它僅僅被視為暫時的，局部的。總之，這是再次由社會負擔損失來挽救制度，並為在適當時候重新私有化和重啟利潤爭奪戰創造條件。此外，沒有任何政府質疑過去幾年中進行的私有化。打擊公共服務，削減公務員人數的做法得以確認。再一次，我們遠離戰後國有化和公共服務設立時期盛行的經濟和政治關係。



我們處在危機的第一階段。它的深化可以傾覆所有的資產階級政策。經濟和政治的理性“可以推動更多的經濟刺激，工資和社會的讓步，更多的綠色增長”。在統治階級的政策中可能有實質性變化，這取決於各個勢力的社會和政治關係，但資本主義並不是

一個合理的制度，而是各個有自己利益的資本之間的競爭，是有其自己利益的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是有自己利益的各國之間的競爭... 所有這一切可能導致新的緊張和新的對抗。在任何情況下，當今壓倒一切的是統治階級的社會和政治利益，統治階級正在尋求一切手段維護自身的利潤。

3.2. 另一個問題：“綠色資本主義”能重新啟動運行嗎？

我們可能有一個既處理環境問題，同時又開闢新積累領域和新市場出路的資本主義嗎？關於這個問題，圍繞著奧巴馬的某些建議（見邁可·哈的文章《綠色資本主義可能嗎？》在 2009 年 1 月的‘意外事故’）有一整套說法。

綠色資本主義是理論上可能的。氣候變化問題的決議，提交給了下次世界大會作討論，它指出：“抽象地說，在可再生能源基礎上的資本主義似乎是可以想像的，因為可再生能源的技術潛力，相當於全球能源消費量的 8 至 10 倍。在實踐中，從百分之八十的能源基於石化來源的現存資本主義開始，朝向這一綠色資本主義的轉型，完全不符合急救氣候的要求。重新啟動當今資本主義而又不重新開始溫室氣體的排放，這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只考慮排放量減少的定量指標，而轉型的過渡需要許多定性指標。”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存在。

將要引進新技術，生態稅，導致交通和住房領域中的變化。但是，談論“綠色福特主義”或“擺脫危機的綠色出路”，則是不懂資本主義處理生態環境問題的局限性了。

a) 首先是一個“時機”的問題。這場危機是即刻的。需求下降，信貸萎縮，預算問題限制了新能源的開支。這些問題的答案，即使按照“綠色資本主義”的說法，也是中期和長期的。而這場危機需要立即，甚至迫切的答案。

b) 他們需要有足夠的盈利能力。新技術的成本或生態稅造成了盈利能力的問題。

對一系列部門而言，這是太昂貴了。而且不能肯定，在作了大力投資的綠色部門，生產效益是否足夠高和持久。

c) 必要的是，不僅要有可觀的增長，而且還有發售。但是，工資持續的下跌限制了這個綠色增長的銷路...

d) 一個世界經濟的“生態”重組，需要協調，國際標準，中長期的選擇和取向。這些選擇同競爭律及市場是衝突的，後者的基礎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

e) 最後，這樣的選擇，結合持久的凱恩斯主義回頭和大規模生態增長，只能是來自於經濟實際動力以外的選擇，來自於與巨大動盪有關的社會和政治選擇... 如果沒有這些選擇，我們將處在危機的深化和局部有限的復甦交替出現的情形中。

f) 更加實質性的是，一個滿足社會需求，相應於新生產消費模式的邏輯，同資本競爭主導的資本主義盈利邏輯是不能共存的。我們需要國際的規劃和協調，以便重組世界經濟。這是生態社會主義方案的基礎。

3.3. 貿易保護主義的轉變提上了議事日程嗎？

危機自動地加劇了競爭，甚至能夠把它變成經濟戰爭。世界貿易和交流趨於萎縮。美國政府要求“購買美國產品”的聲明，西班牙政府的“購買西班牙產品”的聲明是一個跡象。歐洲聯盟和捷克主席對法國政府用六十七億歐元援助其汽車產業所作的批評，也反映了這一傾向。歐盟的內部矛盾使得協調的歐洲計畫無法設立。由於危機，歐洲的經濟管理比以前更為本國化；把穩定公約放置一旁。德國，英國和法國之間，關於他們在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上的經濟特殊地位的問題上，相互對立，就表明這些矛盾。

因此，我們將有壓力、衝動、“保護主義”傾向，在緊急情況下，這將促使各國領導人為維護自己的地位採取一些行動，特別是反動的、民族主義甚至排外的政治舉措，

但這個世界的領導人追求的選擇方向是保護他們的階級利益，這恰恰意味著，要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維護他們的地位，繼續把他們融入世界經濟和國際機構。

此外，歷史經驗促使統治階級遏制其保護主義衝動。但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危機的深化可能會導致修改。並可能引起大眾階級的波動，民族主義的，反動的，極右的思想可能重新出現。高舉反動口號“英國工作給英國工人”的英國勞工運動某些部門的反應，幸好是少數，卻是這一點的證明。貝盧斯科尼政府授權的，由反移民尤其是反羅馬尼亞移民的義大利右翼所組織的夜間“巡邏”，也證明了種族主義、仇外和極右思想的崛起。

在任何情況下，工人運動必須保護自己免受這些“保護主義”或民族主義政策之害。任何懲罰南方人民的政策，特別是通過各個海關和稅收施行的懲罰政策，必須予以拒絕。還必須拒絕這個或那個國家工人之間的任何競爭。圍繞在國際層面上的共同要求的團結，是面臨危機時的決定性問題之一。



4. 奧巴馬的勝利是世界轉折的一個顯示

我們已經說過，在美國地位大為惡化的經濟形勢下，它是美國統治階級“改頭換面”捲土重來的選擇，以及美國大眾拒絕布

殊政府 8 年執政的選擇，這兩者的結合。的確，要瞭解奧巴馬的上臺，注意到美國世界地位的削弱這一點是重要的。

因為在新的世界局勢中，奧巴馬將是捍衛美帝國主義利益的人，更何況美國市場和軍事力量的巨大仍然給他重大的優勢。

在經濟層面，美國依賴於其債權人——日本人，中國人，各種主權基金——資助其債務者。但是，這些債權人反過來也依賴於美國和美元的價值。事實上，我們可以預期，美國遭受危機的打擊後，美元會下跌。然而，美元卻在上升！首先，因為它得到一個國家的支持，這是不同於歐元的地方。其次，得到大眾效應——美國巨大而持續的力量的支持。最後，美元得以維持上升，是因為如果它崩潰，將禍及中國，日本和各種其他的資金。構成中國儲備的二萬三千億美元中，有一萬七千億美元投資於美國！人人相挺以致炒高了美元...所以這就是美元（和它的美國資本主義），儘管同人民幣和歐元關係緊張，它仍然是世界參照貨幣。

在軍事方面，奧巴馬的迴旋餘地有限，但毫無疑問，他仍然是美國政治軍事機器的頭子：在以巴衝突上，他將繼續全力支持以色列政府。他在重定美帝國主義的戰略重點，優先考慮阿富汗，在那裏美國下令新增部隊（超過 1.7 萬人），並敦促其盟國再派遣一些部隊！在伊拉克，他已決定了情況允許時的撤軍日期。在更廣泛的層面，美國保留了政治和軍事霸權，但必須同其盟國重新談判，重新討論這個問題。2001 年 9 月 11 日以後，我們不再處於 1990 年至 1992 年的情形中，甚至也不處在 2001-2004 年的情形中。奧巴馬政府將與歐洲聯盟，與拉丁美洲之巴西這樣的國家有更為合作的政策。但這需要拉丁美洲的配合對應，即：同進步制度保持相當距離甚或決裂。查韋斯已被定性為美國和其他南美國家建立良好關係的“障礙”。奧巴馬已確定美國對古巴的政策。此外，卡斯特羅聲明譴責美國新總統的幻想。

更何況還有大量的幻想。你可以在貝倫世界社會論壇的某些部門感覺到它，有人竟然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奧巴馬不在世界社會論壇上？幸運的是，這些聲明是非常孤立的。考慮到現政府的，同布殊政府相比的“新立場”，我們應該沒有錯解奧巴馬是什麼人，他維護什麼樣的利益。

5. 危機多方面地決定整個世界政治

危機將挑起變化，也許是左翼和工人運動情勢中的動盪。

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仍然在其社會自由的框架內。其領導人原則上支持救援銀行的計畫，同時考慮它們的不足，並要求補充。正是這些勢力，尤其是當他們在野時，引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以便將其納入仍然在新自由主義框架內的政策。然而，面對著民眾對危機的反應，反對和抵制，他們可以騎牆越過運動，採取更左的立場。但是，當它是一個基本立場的問題時，就像在歐洲那樣，他們就採取其一般的方向立場。討論左翼領導能力，比討論面臨危機時各個勢力和民眾第一反應的關係狀態，更無意義。第一反應表明，人民和工人不準備無動於衷。抗議危機的第一次世界大示威是貝倫世界社會論壇。除了各種各樣的反應，十三萬與會者表示有必要拒絕資本主義危機。他們給全球正義運動以新的能量。重新發現了世界社會論壇的“巴西”根源，使得論壇有可能再次開始。因為，儘管有盧拉政府的政策，貝倫論壇還肯定了存在于巴西的社會運動，工會運動，MST（無地農民運動）和成千上萬的如印第安族群那樣的其他社團的力量。也是在這個同查韋斯的帝國主義局部破裂經驗的框架內，莫拉萊斯和科雷亞激勵拉丁美洲人民的抵抗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儘管有美帝國主義的巨大壓力，儘管有希望在其任內，使這些國家同巴西以及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的右翼勢力一致的盧拉經驗，在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全民公決中“贊成”票的勝利，代表著拉丁美洲的決定性支持點。社會成果（保

健，教育，減少貧困）和政策（反對美國統治）是不可否認的。如果這些制度已經失敗，我們可以想像這些國家和拉丁美洲的力量關係的變化，古巴的壓力，等等。現在，他們面臨著一個主要問題：面對危機所採取的態度，目前的社會成果是不夠的。特別是，如果委內瑞拉以石油為基礎的迴旋餘地減少的話，這確實代表一個考驗。或者這些國家將無法抗拒危機的影響，或者在危機的基礎上 and 社會運動的壓力下，這些國家的政府將採取影響經濟結構，財富分配和財產結構的措施。現在是確認破裂程度加深與否時候。

經濟危機和工人的社會政治激進行為之間沒有自動的聯繫。

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之間沒有機械的關係。相反，有左翼和右翼的兩極化，存在可能或將要發展的反動壓力，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他們的組織不接近危機，同勢力和既得地位沒有關係，沒有出現在這裏和那裏的激進力量。在一些國家，在一些部門已經有社會阻力。

在更廣泛的層面，在貝倫的成功和拉丁美洲的那些抵抗，希臘青年的暴動，法屬西印度群島事件，1月29日巴黎的200萬示威者之間，我們怎樣才能著手把它們聯繫起來？我們必須遵循每一個國家示威和罷工的曲線。儘管有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敗，但是已經獲得的成果，和工人運動維持的政治上，組織上和憲法上的地位，以及準備鬥爭的新生代的出現，這些代表了對社會抵抗運動的相當多點的支持。

正是這種雙重運動：傳統左派和社會抵抗的社會自由演變，給反資本主義左翼提供了新的空間。

最後，在國際危機的關頭，中東和巴勒斯坦問題是一個關鍵問題。贊同加沙人民抵抗的支持運動給巴勒斯坦人民團結運動提供了新的活力。

6. 資本主義的危機，其深度，其持續性，把反資本主義的行動方案提上了議事日程

在宣傳領域裏，原先一般解釋的那些東西，會變動盪。自由秩序的捍衛者完全動搖了。新自由主義說法的一致性被粉碎在半空中。讓資本主義更道德，重建資本主義，這樣的咒語，完全缺乏可信度。它們不過是困擾著資本主義領導人的恐慌的表現。我們的答案則有一個新的意義，一種新的相關性，即必須建立直接要求和社會變革目標之間的聯繫，這將導致制度的改變，為21世紀的社會主義引導出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的過渡計畫。

“我們應該拯救人民，而不是拯救銀行家！”

“不能讓人民和工人負擔危機，要讓資本家承擔它！”

面對裁員，解雇，購買力下降，公共服務的破壞，和環境污染，我們需要有一個社會和生態應急計畫。拒絕裁員，拒絕技術性的和部分的裁員，減少工作時間，和讓失業者分享所有工作者定期和不定期的工作，以便人人有一份工資合理有保障的工作，增加工資，以刺激需求，保護和重組面向大眾的公共服務，大型公共工程主要優先考慮生態因素（節能，可再生能源，打擊污染，公共交通，社會住房，在對社會有益的生態活動中創造就業機會）。婦女的特別要求是，反對強制性非全日制工作，反對不定期工作，新的公共服務，特別是關於兒童的，也必須在社會緊急狀況中佔有完全的地位。

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有一個“巨大”的論據。在過去幾十年中，在競爭的名義下，在競爭力和打擊預算赤字及債務的名義下，當權者頑固不化，拒絕了每一個重大的需求...而一夜之間，數百億送給了銀行！！！！

給銀行的這些資金必須用於資助優先的社會需求。圍繞這些需求，我們建議最廣泛的團結行動。

這次緊急社會計畫還必須同民主權利和自由的捍衛相結合，尤其是捍衛移民和非法勞工的權利。

除此之外，還要就危機答案展開戰略辯論。從這個角度來看，貝倫世界社會論壇的辯論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第一種方案，新凱恩斯主義，集中於新的規定：關閉避稅天堂，新的財務準則，金融交易的稅收。貝倫金融危機會議的討論宗旨是“讓金融服務於公民”，但並沒有質疑銀行和大公司的所有權，要不就主張私人銀行與一個公共銀行中心的混合系統。我們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的混合系統，結果會讓私營部門作主導。這些建議同時伴有一個辦法，這個辦法規定國家和國際機構發揮核心作用。社會運動只是向聯合國或這樣那樣的 20 國集團會議施加壓力，G20 有機會擴大到南部的某些國家而成爲 G23。

第二種方案採用部分需求（稅收，打擊避稅天堂），但把它們同挑戰資本主義制度聯繫在一起。首先，通過一個重新分配財富的激進政策，把大量的利潤分給工資，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服務。

但是，這場危機提出了另一個問題：誰控制，誰決定，誰擁有？這是所有權的問題。銀行或大企業的破產不僅是金融過度擴張或欺詐的結果；它是不計代價爲少數特權者尋求利潤的主導之制度的後果。我們必須有一個變化的規則。例如，必須讓權力遠離銀行主。銀行必須在工作者和消費者的控制之下國有化。破產的公司，必須置於公共控制之下，由工作者管理。但是，圍繞“公共財產的概念”——全球正義運動的要求之一，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危機擴大了“公共財產”的概念。“公共財產”不僅是水，土地，衛生，教育。有必要把它擴大，擴大這個概念的使用範圍，包括社會需求所必須的所有經濟部門。這意味著，將中心放在事物的使用價值而不是交換價值上，就像世界社會論壇許多討論中（特別是在解放神學家弗朗索瓦·胡塔特的插入發言中）強調的那

樣。而且，如果經濟被視爲公共財產，那麼，關鍵經濟部門的公共和社會撥款，民主和控制的問題就提了出來。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運動大會的宣言，它支援的有這樣一些目標，比如對銀行作無償的並由工作者控制的國有化，減工時但不減工資，發展各種形式的社會財產，所以它構成了我們參預的支持點。

所以這是一系列更新了的論點，旨在提出擺脫危機的反資本主義出路。在戰略層面，它有雙重後果：

a) 爲了滿足需求，把各個力量之間的社會關係，放在動員的中心位置。深度危機作出的必要變化是這樣的，它們需要一場異常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亂。這些力量關係能夠在體制水準上表達出來。可以得到部分改革。但瘋狂捍衛自己利益的統治階級的行爲，確定了即便要獲得部分改革，我們也需要並將繼續需要大規模的社會動員。

b) 反資本主義方案的應用，需要一個反資本主義政府，依靠大眾階級的動員和自我組織，承擔同制度破裂的進程。必須依靠民眾控制和管理的部分經驗，通過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對抗，爲這一目標做準備。爭取這種反資本主義的政府，同參與管理資本主義危機的議會聯盟或政府不協調，就像社會民主黨和中左派今天所做的那樣。

► 弗朗索瓦·薩巴多，第四國際執行局的成員和革命共產主義同盟全國領導層成員（LCR，第四國際法國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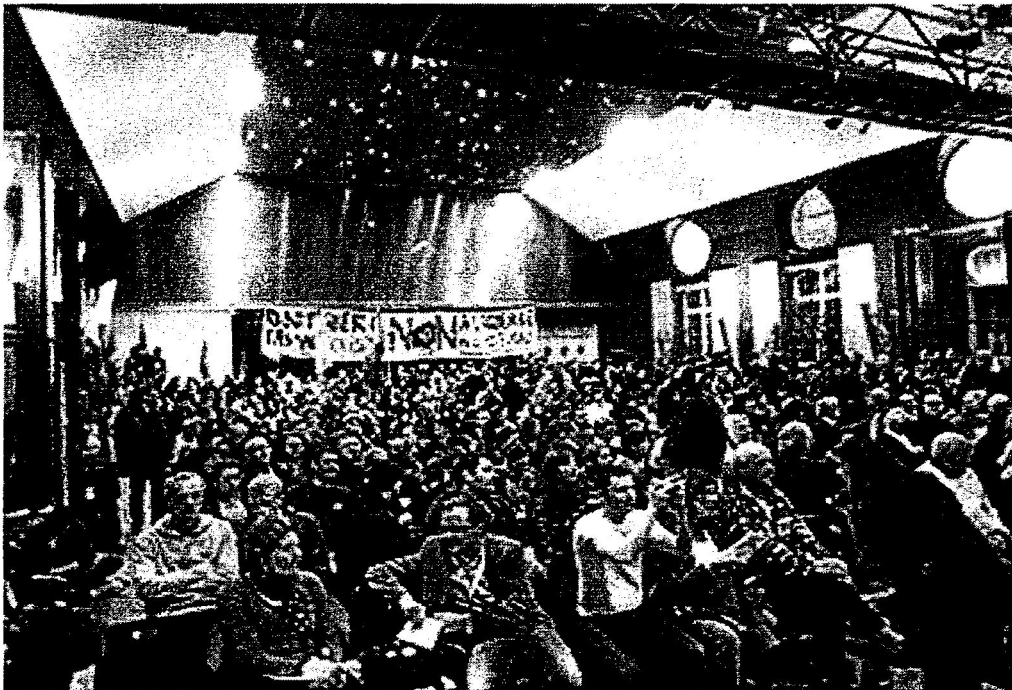
反資本主義歐洲左派會議聲明： 不是人民和工人，而是資本家應為危機買單！

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

下次歐洲議會選舉將在 1929 年以來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危機期間舉行。

它是一個全球性的，經濟的，社會的，財政的，金融的，糧食的，氣候的總危機。統治階級再次要工人和人民為危機買

單。政府已給了銀行數千億美元，但在同一時間卻有數以百萬計的裁員加諸于雇員。失業正在攀頂。工資購買力在下降。對公共服務的破壞仍在繼續。



反資本主義的左派集會，斯特拉斯堡，4月3日

歐洲聯盟各機構的這項政策已經在法國，荷蘭和愛爾蘭被“不”投票否決了。

我們反對歐盟政府拯救銀行，而不管人民的計畫。

我們提出了一項緊急的社會和民主的計畫：

▶ 不裁員！給大家一份穩定可靠，工資合理的工作！

▶ 增加每個國家的工作者、失業者和領取養老金者的工資和收入！

▶ 自下而上協調歐洲人的社會權利：最低工資，減少工時不減少工薪，退休金和社會保障！

▶ 歐洲合作推動促進社會保護失業者和窮人，保護公共養老金可持續性的共同政策！

▶ 保護和擴展跨越整個歐洲的公共服務系統！

- ▶ 設立一個保證人人平等享有醫療保健的公共衛生體系！
- ▶ 維護公共教育：取消博洛尼亞改革！
- ▶ 拒絕支付破產銀行的赤字，建立在公眾控制下的統一的公共銀行和金融體制！關閉所有境外機構！歐洲國家必須示範，開始關閉設在自己領土上的境外機構，這些機構負責2/3的全球境外商業活動！
- ▶ 取消第三世界債務！
- ▶ 保護無身份移民，爭取歐洲所有居民的平等權利，無論其是“土生的”還是外國的！
- ▶ 所有無身份移民合法化！
- ▶ 爭取男女之間的平等權利！
- ▶ 爭取婦女自由和安全避孕及墮胎的權利！
- ▶ 爭取 LGBT（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的權利，爭取異性和同性夫婦的平等權利！
- ▶ 廢除反恐法和法外程序！
- ▶ 爲了歐洲的生態環境，有效地對付氣候變化，我們需要一個在雇工和消費者監督下的能源生產和分配的公共服務系統，我們需要發展交通和住房的公共服務系統！
- ▶ 拒絕戰爭！解散北約和所有歐洲軍事機構！外國軍隊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以色列軍隊撤出西岸！結束封鎖加沙地帶！承認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立國權利！

在這種情況下，並考慮到每一國家的具體情況，我們將集中力量致力於反對雇主和政府的攻擊，同時爲政治替代方案和基於全民動員的反資本主義力量的一極的興起創造條件，將支持一個富含社會權利的歐洲，並拒絕任何形式的支持或參與社會民主黨或中左黨派的社會自由政府。

事實上，現在需要的是打破資本主義和它的邏輯。在這個意義上，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提出這些目標的角度是，爭取 21 世紀的社會主義，並承諾就財富，財產和民主的新分配問題重新展開辯論。

在此基礎上，在各個組織的選擇範圍內，以下的簽字各方，在未來幾個星期的歐洲議會競選活動中，將干預影響該競選活動。

簽字組織：

比利時：革命共產主義聯盟，社會主義鬥爭黨

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

德國：國際社會主義連線，革命社會主義黨

大不列顛：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工人黨，國際社會主義集團-社會主義抵抗運動

希臘：聯合反資本主義左派（左翼重組黨，左翼反資本主義團隊，第四國際希臘支部，社會主義工人黨）和來自左翼聯盟（激進左聯）的組織，國際工人左派，聯合行動左派運動，希臘共產主義組織，紅黨，Roza，社會主義國際組織

義大利：左翼批判

波蘭：波蘭工黨

葡萄牙：左翼聯盟

蘇格蘭：蘇格蘭社會主義黨

西班牙國：反資本主義左派

瑞典：社會黨

瑞士：反資本主義左派，社會主義團結運動

德國國際社會主義連線和西班牙國的反資本主義左派沒有參加會議，但發出支援資訊。

▶ 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從歐洲各地彙集了廣泛的黨派統籌安排政策討論和實際行動。

〔2009 年 4 月 3 日於斯特拉斯堡〕

俄羅斯

反資本主義左派和社會主義鬥爭

伊利亞·布德拉茨克斯，瑪麗亞·庫爾茲納

當代俄羅斯激進左派的語言似乎令人驚訝的陳舊過時。這涉及的不只是措辭習慣，這個習慣儘管不好卻可原諒。這種語言的停滯還證明了思想的僵化。

例如，我們必須自問，“在左邊（留下）的環境工作”這組詞是什麼意思？是否是指協作的技術過程或者資源的重新分配？還有，“同工人一起工作”或“同青年（一起工作）”，是什麼意思？它是運動的發展，還是運動的工具主義化及其自身繁衍工作的調整？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指責你身邊的人有“改良主義”的同時，它一併展示自己的“革命主義”。嗜好這種措辭的人無法去試圖理解，在這個具體的社會裏，為什麼革命可以而且必須進行以及如何進行。因為，不管人民的生活情況可能是如何地難以忍受，革命並不是人民生活情況的結果，而是在這些情況下人民活動的結果。

我們認為，有一種左派把自己設想為一個生產現成答案的產業，其產品不標明保質期而且既不能退貨也不能換貨，現在是終止這種左派存在的時候了。無可否認，如果把社會主義組織設想為不可替代的，符合“有效”定義的領導，你就很難找到一個比它更好的模式。問題是，在客觀現實中，不存在這樣的地方，它容納一種生產充分認證的有效答案的機制。如果想在各種情況中找到我們的位置，我們必須能夠抓住當前的時機，分析當前局勢的所有含糊處和所有矛盾。

工會

在蘇聯的最後幾年裏和後蘇聯時代，工會組織構成俄羅斯社會運動的最大和最先進的一部分。目前，他們展現出來的是在鬥爭中有組織有毅力的社會力量，而且其重要性正在持續

增加。然而，試圖客觀的評價（甚至定量化）俄羅斯工會活動的規模和水平，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其中首先涉及的是方法論。

目前，俄羅斯經濟的員工約 6900 萬人，毫無疑問，在此基礎上有必要增加大約 500 萬失業者（就業機構的記錄約為 150 萬人）。如果我們採納工會自己的數字，則各種工會的成員總數達到 3150 萬的俄羅斯聯邦公民。其中，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1）組織成員 2900 萬人（所有工會會員的百分之九十一點二），泛俄羅斯勞工聯合會的 150 萬名成員（百分之四點七），俄羅斯工會同盟（Sotsprof）（2）達到 50 萬（百分之一點六），其他聯合會和獨立組織大約還有 50 萬（百分之一點六）。

因此，工會活動涉及百分之四十二點五的俄羅斯工人。相比之下，在法國，荷蘭和西班牙，這個數字不超過百分之十五；在德國，瑞士，義大利，葡萄牙，奧地利和英國，這個數字在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四十之間；在挪威，比利時，丹麥和瑞典，則在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九十之間。乍一看，該表似乎完全令人放心。但矛盾的是，俄羅斯工會的工人參與程度只能被視為非常低。

世界各地的工會活動絕不是一致的。不僅存在嚴重分歧，而且相關的組織形式，工作水平和工會活動水平也五花八門。法國和西班牙的小工會似乎是工人階級鬥爭的先鋒。根據他們的觀念，積極參與其中，就同這裏所謂的政治組織成員相類似。此外，這些工會的影響，它們動員和組織罷工的能力的延伸擴展，大大超出其嚴格意義上的中堅基地。在這些國家，集體鬥爭和集體協議涉及百分之七十至九十的工人。還有一種“斯堪的納維亞”工會模式，

即：一個組織，其福利國家利益再分配機制的角色是在法律上注明的。這些工會有非常多的會員（因為社會保護的獲得取決於一個工會的會員數）。他們強烈集中，有一個繁重的機構，它的決定很少作為公開辯論的結果而被採納，但對集體討論過程之外的生產組織有直接影響。

很顯然，俄羅斯工會的這種情況既不相當於前一個也不相當於另一個模式。因此，作為一般規則，它或多或少同時類似於兩種模式。在法國的戰鬥工會和俄羅斯的“另類”工會（儘管關於成員數量水平，或者甚至他們的影響力，他們兩者都不能作比較，但他們使用的鬥爭方式和組織方式是類似的）之間劃一條平行線，這當然是可能的，卻並不總是貼切的。但是，嚴格地按照相同的平行意義，把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定義為一個“黃色”工會，或更恰當地定義為“帶有一個黃色領導層”的工會，會引起嚴重而有根據的懷疑。

俄羅斯的“另類”工會來自新思維改革浪潮和社會運動的興起，他們在那裏發揮了中心作用。然而，由於“民主資本主義”理想的殘忍幻滅，使得社會活動迅速衰落，其後果是，這些工會沒有形成為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只在某些部門，他們設法保持著自己的群眾組織，在這些部門，工人階級堅定團結，而且工人們高度集中在企業的框架內：煤炭部門的俄羅斯礦工獨立工會（NPGR）（3），運輸部門的俄羅斯碼頭工人聯盟 RPD（4），俄羅斯火車司機聯盟 RPLBJ（5），飛行員工會，飛行管制員工會。在所有其他部門，“另類”工會只有少數覺悟工人的小團體。

今天在俄羅斯，所有的獨立工會只代表百分之七-八的有組織工人（即所有工人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三點五）。然而，在這一小部分的社會運動內，目前正在發生對整個社會極其重要的進程，同跨國公司和俄羅斯大型企業裏獨立有組織之勞工的顯現和發展相關的一切，其重要性都超不過這個過程。它就是前所未有的對階級的集體自我組織的需求綜合征。這樣的工會正出現在新的環境中，出現在青年工人的環境中，出現在經受新一代管理（常常是外國的）的企業裏，換句話說，出現在“蘇維埃”

企業的舊的工作關係之外，而舊的工作關係建立於從經理到清潔女工的“全體人員的”內部階級利益上。

這代表性保存了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在保護公司，工作場所，以及工作團隊和公司管理層之間垂直關係的問題上，工人和舊的管理機構的利益有部分而矛盾的相合。此外，蘇聯結束後的幾年，在 1990 年代中期，在私有化運動的中期，這項安排達到其發展的頂點。“我們不給外國人！”：在幾十和幾百家公司，這個口號團結了有關工作團隊的“老一代的”工人和管理人員，就像維堡的 TsBK 例子（6）。

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就其目前的概念本身而言，作為企業內部的社團關係的一個整體系統，從根本上說，是這種矛盾和兩難局面的產物。因此，在財產再分配過程完成的時刻，當領導人和“老一代”及“新一代”業主的衝突變得次要，被階級對立掩蓋時，這一組織得已發展並維持的地基本身卻消失了。這反映在聯邦政治效忠性的變化中，從俄羅斯聯邦共產黨 KPRF（7）到俄羅斯合眾國的改變（8）。現在家長作風和內部階級團結的時代走了，在勝利者腳下頂禮膜拜的時候來了。

對於勝利的資產階級，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 FNPR 因此顯得沒有必要。它不捍衛工人（甚至常常直接背叛他們的利益），同時，作為雇主的一個工具，它是絕對無效的。事實上，仍然直接同工作有關的社會團體，只有這個組織的“仲介層”：工頭，車間和部門主管，經理助理...。這中間層情況的特殊性是，它表現為公司管理層的“先進支隊”。它的任務 --- 激勵和監督 --- 是非常複雜的。其心理狀況不止是不舒服，因為，它總是與普通工人為伍，儘管其工資狀況更接近它的下屬，而不是管理層，但它必須遵循管理路線。“在外國人中間他們是本地人，在本地他們是外國人”。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 FNPR 作為一個社團，工作組織，同時擁有鼓勵手段 --- 優惠券 poutiovki（9）等 --- 和推廣加速法，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 FNPR 可以聲稱為“工會”，既不是按其社會成份，也不是由於

它在生產關係和在社會存在中的作用，也不是因為它的政策。儘管如此，在俄羅斯的勞工和社會運動中它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不過，這並不是由於它的“好鬥”的普通激進成員，而是因為對於社會抗議的管道，它的作用，猶如巨大而幾乎無底的水庫，而且也是詆毀那種工會工作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在我們看來，可以正確的說，俄羅斯工會組織的真正會員，據最樂觀的計算，不超過 300 萬人，即所有工人的百分之四。這代表了“另類”工會和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 FNPR 的某些較健康部門。



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由”工會把企業的一個積極工人少數組織了起來，這些人處於企業管理層的攻擊下，不讓他們加入集體協議最後的締結中。通常，獨立工會沒有“第二層次”的組織者，而且一些領導人的解職，剝奪了普通成員的鬥爭能力，導致工會組織的破壞，在法庭上能夠證明解職是非法的之前，使工會消失。另一方面，“另類”工會的成員，一般的特點是高度的自覺性和鬥爭中的自我犧牲精神，他們比較團結，並準備抵禦對組織的攻擊。至於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 FNPR 的群眾成員加入工會，往往並不是加入工人組織的一個意識清醒決定的結果，而是出於完全不同的動機：人事部門一個建議，習慣，把工會視為福利源的感覺（優惠券 poutiovki，幼稚園...）。

“另類”工會和 FNPR 好鬥工會的嚴重困難在於同它們自己領導的關係。他們似乎是地方一級的戰鬥的階級組織，但他們的全國機構往往不是建立在透明和民主的基礎上。你可以看到領導和普通成員之間的距離。全國領導扮演的是協調中心，法律和物質支援，以及提供資訊的角色，而不是真正積極的和普通活動份

子控制下的代表性機構的角色。領導的獨立性使個人有可能為個人目的使用這種形勢。因為以上所述的這一組織的結構特點，FNPR 的好鬥工會，在激進和公開反對雇主的情形下，往往進入同當地或企業領導層的直接衝突中，其結果不是激進分子的挫敗就是離開聯盟的工會自治。

社會主義運動

並非偶然的是，勞工關係的穩定和工會的覺醒同對社會主義領域的進攻巧合。1990 年代末，生產的私有化處在其最後階段。另一方面，運輸，各種基礎設施，住房，衛生組織，教育組織，科學和文化組織，養老保險制度，代表巨額公共財產的所有這一切都未被觸及到。與此同時，國家給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領域的保證仍是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的阻礙。第一次打擊來自於修改勞工法例，並同時限制民主自由。這十年起初時期的群眾行動還沒有被俄羅斯精英遺忘。組織和集會權利的限制，以及設立對媒體的控制，其目的是在“群眾憤怒”事件中保證其統治並使鎮壓合法化。

這些反改革做法沒有正面施行，而是在保持多數人冷漠的同時，針對某一類的人口施行。這些法律的通過拖了幾年。因此，俄羅斯政府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提出修改勞工法，但新的版本在 2001 年才通過；養老金的改革用了五年多的時間；教育改革開始於 1993 年，至今仍未完成。後來，破壞性更少的反社會主義法律，勉強通過得更快，但俄羅斯社會，被 20 世紀 90 年代初的衝擊打垮，陷入衰退，未能建立一個長期抵抗戰略。最後，所通過法案的真正內容不被廣泛的各階層人們理解，並且反對派的解釋工作未能匹敵於新自由主義大眾傳播媒介的宣傳。

總共大約有 300000 人參加了非常巨大的反新勞動法“聯合行動之日”活動，該活動是“另類”工會組織號召的，但他們之中只有少數人參加了會議和一日罷工。對退休金改革的反應，則只有一個被動的抗議，即：公民並沒有把他們的錢置於非國有基金，從而導致政府計畫的失敗。

對其能力越來越有信心，使得資產階級精英，加快制定改革計畫的節奏並為議會對它們的審核做準備。2003 年春季選舉後，國家杜馬轉變成一個純形式機構，它的組成有助於計畫的通過。因此，臭名昭著的聯邦法律第 122 號，2004 年秋季提交給議會，同年由總統簽署實施（10）。2005 年通過的住房條款，僅用一年，就走過了所有階段，從籌備工作到正式生效（11）；關於教育，科學及文化私有化的一大堆複雜計畫已在 2006 年秋季提交給議會並由議會作了審查。

這些改革後果，已經影響到非常不同階層的人們，有：工人，退休人員，學生和失業青年。2005 年初，反對 122 號聯邦法律的動盪是從下層發出的第一個強烈的抵抗信號。這些抗議行動，大部分性質激進，發生在近 600 多個城市，換句話說，幾乎包括了所有的地區首府。第一批示威遊行，開始於聖誕及新年假期，特別具有自發性質，只是略微帶有一點“官方”反對黨派的影響痕跡。這些反對黨派不理解發生中的事件的重要性，當地區的自治組織機構成立並開始採取行動時，他們只是試圖控制運動。雖然運動迅速平息，對於以後抗議運動的發展，其重要性卻是決定性的。

協作會議（KSs），成立於“棉花革命”的浪潮中，吸納了最多樣化的成員，從小型左派團體的激進分子到初次對社會主義進程表現出興趣的人們都有。

在這種情況下，2005 年 4 月召開的第一屆俄羅斯社會主義論壇，彙集 1000 多名與會者，代表各個地區的協作會議（KSs）。它試圖構造全國範圍的運動並把它政治化，其做法是策劃出一個全球性的方案，以替代克里姆林宮的反社會主義政策。

新住房條款和一系列相關法律的通過，為社會抗議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這項改革的具體特點是，它直接觸及所有俄羅斯公民的利益。圍繞住房問題，數以千計的倡議提了出來，涉及房屋管理以及建設方案，家庭問題，住房資金的狀況，租戶的服務費支付（12），租金增加，住房權，被欺騙的投資者的權益，等等。儘管同住房問題相似（居民和那些建築公司之間的利益矛盾），我們並沒有把要求統

一起來。反復協調這些倡議舉措的企圖，遇到了相互的不理解和觸及到地區問題上的鬥爭重點。

抗議行動中顯現的，特定社會群體間矛盾的存在，一般是其發展的障礙。深化中的教育，科學和文化的私有化進程，以同樣的方式導致學生和該領域裏的工人毫不含糊的抗議。但是，抗議立場的斡旋協調成為一個大問題。這一改革的實施激發起各種恐懼。學生們不滿意對免繳學費的攻擊，而許多教授希望這將改善他們的物質狀況。與此同時，高等教育領域的教授正在反對引進研究參與的選擇機制（13），而學生家長則在計算，從支付私人導師的花費裏能節省多少錢。基本科學領域的科學家們擔心喪失科學院的獨立性，還害怕他們的機構將會關閉；但他們應用科學專業的同事們正預感到他們將收到額外的資金。中學教育自籌資金的做法，事實上把各個學校的所有雇員置於相互競爭的境地。

當政治開始時

在整個後蘇聯歷史上，內在地聯結於國家機器的新統治階級，是唯一的在這種社會裏建立了政治體制和政治代表的主體。我們可以認為 20 世紀 90 年代和 21 世紀頭十年的初期是一種“資產階級孤獨的”形態，它建設同其利益協調的決策結構，而不參與這樣的社會。單方面反對社會大多數的戰爭通過私有化體現它自己，它需要建立一個政治制度，能夠快速對社會環境，對工作場所和生活標準施行攻擊。激進社會反改革運動的開始同政治的反改革運動一致，後者隨著議會批評炮火的齊射和 1993 年短命緊急狀態的實施而開始（14），這並非偶然的。這樣一個系統，由於其本身的性質，沒有理會（而且仍然沒有理會）其政治下層的任何反對。

對於工人組織和社會運動的代表而言，任何欲把他們自己安置於現有的公共政策之內的企圖，都使他們屈從龐大的腐敗壓力，屈服於現有機構的操縱。每個新的選舉週期導致一群准政治組織的建立，它像一場海嘯，威脅著要淹沒仍然獨立的首倡精神。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在這些條件下，運動如何才能保持其獨

立性，留在主導的政治文化之外，並且策劃出明確的替代方案，能夠確保工人有一個獨立的工具，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並且爭取改變他們的狀況。

然而，目前俄羅斯左派完全沒有力量在這個方向的發展上建議任何東西。雖然左派游離於為官僚機構和企業設立的政治領域之外，它卻處在其長期影響之下，不知不覺地與它互動，並仿效它同社會運動關係的戰略。在追求自我肯定時，左派團體嘗試利用工會和普通成員的進取精神去確認他們的共同特點，即：對一些特別方案的認可。罷工和住房領域的抗議行動，工人階級的團結行動和反對改革後果的抗議示威活動，所有這些，對那些想要成為第一個插入他們的旗幟或自己的黨派標誌的人，是有吸引力而且可接近的高峰。在相對缺乏經驗的社會活動家眼中，這種關係往往實際上抹去了激進左派和資產階級政治家之間的差別，後者對選舉中的成功感興趣，或者對成為他們的具體商業利益代表的事實感興趣。

我們必須努力克服社會運動和左派之間的互不信任，克服對相互利用的害怕。今天被認為是正常的並作為一種規範的情況，導致工會或社會運動的組織者，把政治激進分子視為免費的輔助劑，其形象就是“給予，帶來和走開”

(15)，有需要時，可以讓它領導一個糾察隊或組織一個國會議員的遊說團，但對於“真實”的工作，它是絕對無用的，確實有害的。

“把政治撇開！”和“我們支持那些幫助我們的人！”，這兩個口號，得到了絕大多數社會運動活動分子的認同。轉過來，左派對他們也有類似的態度。

因此，對於社會主義者，對於那些想要一個真正社會變革的人，首要的問題，仍然是尋求運動中的行動自由，尋求同激進社會運動的技術化和消費化道路作真正決定性的決裂。根據真正的政治選擇，以獨立的立場出現在其內部，如此投入運動，才是唯一現實的可能機會，讓左派的觀點在公共場所充分表達出來。這種投入，這樣出現階級的內部，對左派不僅不意味著其身份的喪失，或在政治層面上拒絕任何形式的進攻，而是恰恰相反，創造了使它開始存在的條件。

左派的角色

我們可以區分四個起點，它們同時標誌著社會運動和俄羅斯左派的弱點，以及他們協調發展和共同成長的可能性：資訊的傳播和接收問題；低水平的協調和互動；人數不足的訓練有素的激進分子；作群眾動員的不可能性。

溫和的和激進的或工會的運動，無論它是否是左派的，今天該運動在俄羅斯發現自己處於同媒體絕緣的地步。大眾傳播媒介對其活動缺乏興趣，甚至作公然的歪曲報導，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雖然從宣傳和組織大規模抵抗的角度看，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運動本身裏面的資訊和經驗的交流問題，其嚴重性並不稍減。目前的交流水平幾乎不可能讓人們瞭解具體的壓制案例。對於廣泛長期的運動，那是不夠的。

各個事件的資訊，其作用（特別是網際網路）就像一個萬花筒，而我們需要的是總結好了的資訊，以便讓人們有可能尋找到傾向趨勢，聯繫點，共同的要求和辦法。今天，這一工作多半是由社會學家——首先，我們必須對集體行動研究所發揮的作用致敬（16）——而非政治活動家來做的，不幸的是，這影響了它的特性。

不克服社會運動的極端保守，不超越左派的亞文化，不建立一個一般的通信空間，就不可能談論社會運動政治化的景觀，也不能說這些運動意識到其一般利益。在此背景下，團結運動發揮特殊作用。它們是重要的，並將繼續是重要的——對於社會運動，它們應該不僅是解決其特定問題的一個方法（並不總是足夠有效的），而左派不應只看到它們自滿地展示其同階級的形式上的連接。與此相反，這種共同的行動必須成為抗議運動和工會的現在意識的活躍而連續聚集的領域，把他們的政治代表性問題列入議程，因此，也把在政治選擇的問題列入議程。

相對於一個孤立的團結運動，協作會議和工會團結委員會的出現，成了向前邁出的一步。構想作為交換意見的永久空間，設計全球行動計畫，發行聯合出版物，它們使全國規模的廣泛機構的出現成為可能，即：社會論壇和

協作會議聯盟（SKS）。這種機構的有效性取決於確切的情況和時機的要求，它們表達為對每個實際必要性的具體形式的某種意識程度。此外，政治活動家仍必須爭取在同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能夠參加這些主動活動。

缺乏訓練有素的幹部，是左派，社會運動和工會的一個普遍問題。一方面，社會運動中急缺合格的戰士，沒有足夠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在這個意義上，幹部短缺的問題，與運動內部資訊和分析的不足交織在一起。另一方面，左派一般缺乏與正在發生之社會行動的關係，即使所涉及的不是一個純粹實際的鬥爭，而是一個社會主義或工會運動（即這種鬥爭的政治泛化，一個統一的運動本身往往具有的意識）。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僅是工人階級鬥爭的直接產物，而且同時是其所有過去經驗的總結。這就是為什麼作為一個政治分析實踐，維護馬克思主義是可能的，唯一的條件是：每一個新的個人經驗沒有按照既定的規則作切割，而是被視為一個連貫社會經驗的形成部分，該社會經驗在同它的接觸中演變發展。因此，幹部培訓同左派插入群眾運動並獲得社會活動家和戰鬥工會領導人的政治支持，是分不開的。

主要的問題之一，仍然一方面是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動員群眾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左派團體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的極度減少的增長。今天，反對公共服務的商業化的動員（17）無疑是一個真正群眾運動的唯一經驗，它能夠對形勢作足夠的反應，而且它會這樣去擬定一致的要求，這些要求能夠使成千上萬的示威者走上街頭。同時，這一運動都和其他一些更為區域性的大型運動，兩者都同具體的形勢和短暫的時期有關。出現於運動浪潮高峰的這些主動舉措，在大多數情況下，最後並不能實質性地擴大其在公共生活的出現或在有規則和有條理的基礎上建造它們的活動。除了與當前群眾意識的特點相連的客觀原因外，這些有限的結果被歸因於廣泛而有組織的政治運動的嚴重缺乏。

雖然左派做的是如此地越來越多，它在出席和參加運動上的明顯無能，說明了其中堅分子的數量不足以及為什麼它發現它無法吸引新

的力量。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今天，青年人對反資本主義思想的興趣增加了，左派僅僅是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利用該興趣的潛力，而且並沒有顯示自己能夠對當前的社會問題做出積極的反應，未能提出開放和令人信服的理由，也未能明確和毫不遲疑地給出廣泛的當前問題的另一種解釋。這“光榮的孤立”既導致分門別派的傾向，又導致活動參與者的“減少”，並把他們的政治立場完全稀釋於作為“良性社會主義中堅分子”的日常活動中。

除了所有的客觀差異之外，對政治形式的不信任，對政治層面問題的不信任，不是俄羅斯形勢的一個顯著特徵。對歐洲政治組織最根本的反對，典型地表現在開始於二十世紀頭十年初期的社會運動中，一旦抵抗的真正邏輯促使人們尋求一個積極的替代辦法時，它就失勢縮減了。因此，由於對歐洲憲法說決定性的“不”，有組織的左派恰恰成為這樣的力量，即通過私有化和社會環境破壞之間的有機聯繫的交往活動，通過它在國家和歐洲聯盟水平上的制憲表現，它可以表達增長中的覺悟。這可稱為“政黨回歸”，它的基礎是，理論和實踐之間，日常的鬥爭經驗和社會主義傳統之間的聯繫和深刻的相互作用。這種形勢的變化，聯繫的不僅是社會的覺醒，而且有左派過去經驗的一個重大修改，及其同目前局勢問題相關的東西。

只有在運動內部的日常工作基礎上，對可理解的鼓動性政治方案的發展，展示決定性的影響，這樣的修改才是可能的。正是基於這一點，過渡方案的真正原則得以建立，該原則就是設立明確而一貫的要求的思想，這些要求已經傳達給了廣大人民群眾，多虧當前的機會，這些要求，內在地聯繫於反對市場邏輯的必要性，聯繫於有意識地和徹底地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

伊利亞·布德拉茨克斯和瑪麗亞·庫爾茲納是“Vperiod”（“前進”）組織的成員，該組織已建立了同第四國際的關係。本文首次出版在 Levaya Politika（“左翼政治”）2007 - 01 期，一個伯里斯·卡加利茨基編輯的季刊。

注釋

1. 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 (FNPR)，成立於 1991 年 3 月，出自于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後者號稱“工會”，實際是一個控制工人工具。FNPR 保留了它的大部分成員，幹部和財產。它依賴於政府維護其憲法的地位和其財產。

2. 俄羅斯工會同盟成立於 1989 年，是單一工會模式和後來的 FNPR 模式的反對派。其領導曾經支持資本主義的恢復和新自由主義改革，但其基層往往非常好鬥和反對自己的領導人。然而，它注重保護自己的成員。

3. 俄羅斯礦工獨立工會。它成立於 1990 年，處於 1989-1990 年大罷工的浪潮期間。工會領導堅持工會保持政治中立立場，但其基層往往好鬥得多。例如，1998 年夏季俄羅斯礦工獨立工會 (NPGR) 的激進分子採取“鐵路戰爭”的主動行動（罷工糾察隊，封鎖鐵路），並要求伯里斯·葉利欽辭職。

4. 俄羅斯碼頭工人聯盟。

5. 俄羅斯火車司機聯盟。

6. 維堡是芬蘭邊界一個 80 萬居民的鎮，在芬蘭灣。TsVK 是該鎮生產紙張的纖維素廠。1998 年 3 月至 2000 年 1 月，工人和雇主之間的鬥爭導致工人接管工廠。該廠的生產是高質量的，具有重要的出口渠道，但在 1994 年私有化期間，業主從事的投機活動，導致其破產。工廠的 2200 工人選了一個“群眾經理”並控制了工廠。面對雇主和地方當局的反對，經過員警兩度嘗試入侵工廠後，自我管理的實驗只是短暫的存在。

7.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 (KPRF) 由中層官僚機構在聯共的廢墟上創建於 1993 年，該中層官僚機構並沒有設法在恢復資本主義的框架內，圍繞等同於共產主義（史達林版）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保守意識形態打轉。它由岡納迪·久加諾夫領導並鐵腕統治。

8. 俄羅斯合眾國是一個新保守主義黨，成立於 2001 年，宗旨是支援總統普京，並給他一個議會的多數。自 2003 年以來，這個黨掌握了國家杜馬 450 個席位中的 305 個和 178 個聯邦會議（上院）席位的 88 個。這足以使它隨心所欲地修改憲法。其主席伯里斯·格雷茲洛夫，是國家杜馬主席。

9. 優惠券，讓工人利用工作諮詢會的服務（度假營，兒童集體假期...）。

10. 社會權利“商品化” (commercialisation) 的法律，用簡明英語說，這意味著最貧窮者被剝奪了國家的援助。某些服務的免費性質（例如：健康，醫藥）改為財政“補貼”。這項法律的生效導致 2005 年 1 月的大示威遊行。

11. 住房條款生效於 2006 年 1 月 1。它的目標是私有化市政府所擁有的住房。它終止租戶買房優惠措施，這是葉利欽曾經鼓勵的，目的是把住房私有化盡可能加快。它使房產管理將交給私人公司成為可能，如果房產共同主人不自己去這樣做，那末市政府就會選定私人公司來做管理。

12. Zhilitchno-kommounalnoe khozaïstvo：所有的國內住房服務（電力，供熱，公共空間...）。

13. EGE，聯合國家考試。自 2001 年引進，EGE 是中學教育的期末考試，並可以作大學入學的選擇之用。將在 2009 年推廣普及。

14. 在 1991 年 6 月獨立後，俄羅斯聯邦自己置於舊的俄羅斯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體制連續性中 (RSFSR，蘇聯的俄羅斯)，使用同一憲法。最後一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扮演了議會的作用。主要由共產黨人組成，它反對伯里斯·葉利欽的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局勢嚴重惡化，1993 葉利欽派出坦克轟擊議會，並讓精銳部隊強佔議會建築。今天，你可以在莫斯科現代史博物館看到一個佈滿彈孔的議會門。俄羅斯聯邦現在的（總統）憲法，緊接著這一政變而頒佈了。

15. “工作作風：給與，帶來和走開” 的俄羅斯表達，表示在最低水平上簡單執行的工作。

16. 集體行動研究所由社會學家佳李·克萊門特領導。其網站（俄語：www.ikd.ru）出版關於社會運動和工會鬥爭的資訊和分析，還有每週文摘。

17. 反對 2005 年 1 月的 122 號聯邦法律，前面我們已經提到。

► 伊利亞·布德拉特科斯 是“Vpered”（“前進”）組織領導人，該組織已建立了同第四國際的關係。

► 瑪麗亞·庫爾茲納是俄羅斯 Vpered 小組的成員。

拉丁美洲左派戰略

克勞迪奧·卡茨

建立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呼聲，再一次掀開了關於拉丁美洲左派戰略的討論。為向社會主義目標邁進，人們又一次對社會主義特徵和行動路線進行研究和分析。



這一反思包括 6 大主題：物質條件、社會力量關係、社會主題、民眾意識、制度框架和受壓迫者組織。[1]

生產力的成熟

第一次爭論又承接上了經典的論戰。拉丁美洲的生產力是否已經成熟到可以開始一個反資本主義的變革的程度？現有的資源、技術和條件是否足夠開始一個新的社會主義進程？

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一地區的國家準備不足卻更迫切地需要面對這一改變。在營養、教育和衛生方面，他們比經濟發達國家的民眾遭受著更大的不幸，而用來解決這些問題的物質條件卻又相對更差。這一窘境是拉丁美洲周邊特徵[在全球經濟大範圍內——編者]和其造成的農業不發達、工業不完整和財經不獨立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面對這一狀況，左派方面有兩種傳統回應：推動一個進步資本主義階段或發動適合於地區不足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轉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們已經述說了支援第二種方案的各種論述。[2]

但另有一種同等相關的討論集中在每條路線的可能機會。在經歷過生產低迷和財經崩潰的創傷期後，拉丁美洲正在走上一個這

樣的階段：因出口上升導致的經濟成長和商業利潤重組的階段（增長期）。有人會提出反對意見：在這種條件下，並不能預先看見到任何崩潰情況，而崩潰的出現是進行反資本主義變革的理由。

然而，社會主義方案並不是克服衰退週期的權宜之計，在這一點上它與凱恩斯主義有著嚴格的區別。[3] 它的目標是克服作為資本主義特點的剝削和不平等。它致力於消滅貧窮和失業，根除環境災害，結束噩夢般的戰爭和制止財經動盪。

這一兩極對立傾向正發生在當前的拉美危機時期。富裕階層在利潤和消費方面的增長與可怕的痛苦指數形成鮮明對比。正是這些災難在經濟危機達到頂峰時更為明顯給出了為社會主義鬥爭的理由。經濟崩潰狀況並不成為根除這一制度的唯一恰當的時機。反資本主義的轉捩點是貫穿始終的自由選擇，它可在任何一個危機時刻開始。二十世紀的經驗已經確認了這一事實。

沒有任何社會主義革命恰好發生在經濟危機的頂峰。大多數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都是戰爭、殖民佔領或獨裁壓迫的結果。此類情況有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俄羅斯），毛澤東在中國建立自己的政權，（Tito）鐵托獲得南斯拉夫的執政權，越南趕走美國以及古巴革命的勝利。這些勝利中的大多數都是在戰後的迅速發展期完成的；也就是說在有記載的資本主義成長階段完成的。因而，經濟的崩潰不會自動導致社會主義的開始。在這一制度之週期變動的任一階段，資本主義產生的貧窮就足以使其自我推翻。

有一種反對開始社會主義進程的論調誇大了由全球化產生的障礙。這種論調認為，當前的資本國際化使拉美的反資本主義挑戰變得不切實際。

可是障礙究竟在何處呢？全球化並不構成諸如社會主義這樣的全球事業的障礙。跨越國界反而擴大了資本主義的不平衡，並為社會主義變革提供了更好的客觀基礎。

全球化作為一個沒有替代模式的平臺，其出現是新自由主義觀的一個支流，該新自由主義觀聲稱不存在右翼模式的替代品。但是如果我們因此而拋棄社會主義，那麼也必須拒絕凱恩斯或者調整過的資本主義替代模式。認為極權性的全球化已經埋藏了反資本主義方案，而容忍各種干涉主義形式的積累，那是說不通的。如果所有社會主義的方案都關閉掉，那麼新發展主義也一樣沒有出路。

然而，實際上全球化並不成為歷史的結束而所有替代模式仍然是敞開的。它僅僅是一個新積累時期的開始，通過利潤重組維持下去，利潤重組的代價是：犧牲受壓迫者利益，把大多數國際不平衡轉嫁給最為虛弱的經濟體。這些倒行逆施的做法給社會主義的必要性以新的生命，社會主義是對該新平臺唯一的大眾回音。面對資本投機的氾濫、帝國主義極端化和市場與技術進步之間的脫節，對於克服由全球資本在單一民族國家範圍內的擴張所產生的不穩定而言，這是唯一的出路。

什麼是力量關聯性？

有利於被壓迫者利益的勢力關係的突起，是社會主義轉變的一個條件。如果面對很負面的權力失衡，民眾大多數就不能勝過其統治階級對手。但是我們如何評估這些因素呢？

在拉美，力量關聯性取決於以下三個團體已經取得的，岌岌可危的或已經失去的地位，三個團體即：當地資產階級、被壓迫民眾和美帝國主義。1990年代，一場資本對勞工大規模的全球進攻在全球範圍內完成。在此方面，最初的撒切爾夫人支持者的猛烈攻擊力量已經弱化，但它把一個不利的大氣候留給了國際範圍內的工人。然而在拉美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這一地區的資本家積極參與了這次攻擊，但最終受害於這一過程所產生的各種間接後果。隨著商業貿易的發展，他們失去了其有競爭力的地位，而隨著生產機構的非國有化，他們對外部競爭者棄守投降。後來，金融危機打垮了制度，並剝奪了他們直接的政治存在。其後果是，右派淪為少數黨，而中左派政府取代了許多保守主義者管理國家（特別是在南錐地區）。[4] 從而，資本主義

精英力量再也無力去高枕無憂地確定整個地區的各项政治議程。他們受到了新自由主義危機的影響，這種危機可使此計畫產生結構性衰退。

地區力量關係還受到大規模民眾起義的影響，這使多個南美國家首腦倒臺。在玻利維亞、厄瓜多爾、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的反抗活動已經使整個統治階級產生了直接反響。他們挑戰商業侵略並同許多國家的民眾達成了一定的調整和妥協。

然而鬥爭的推動力很不均衡。在有些國家（玻利維亞、委內瑞拉、阿根廷、厄瓜多爾），民眾參與積極性顯而易見，而其他國家（如巴西、烏拉圭），作為欺騙的後果，退潮占了上風。在新自由主義排行上名列前茅的國家（智利）和被群體虐待和民眾遷移所累的國家（墨西哥）中，工人和學生運動的喚醒是一種新的發展動向。在拉美，力量關聯性更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但是其民眾動員的總體趨勢是，在整個地區範圍內再一次肯定了自己的力量。

在1990年代初期，美洲帝國主義通過自由貿易和設置軍事基地的方式，在其後方推行其重新開拓殖民地的政策。而這一情況現在也已經發生了改變。原始版本的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已告失敗，其原因為全球化和依賴內部市場的公司之間的矛盾，出口商和實業公司之間的衝突以及此計畫所遭受的廣大民眾的反對。美國國務院發動的雙邊貿易協議的反擊，也不能抵消這一挫折。

布殊的國際孤立（共和黨之選舉潰敗、伊拉克之敗、痛失歐洲聯盟）已經關閉其單邊主義的發展空間並喚醒和促進了反對美國的地緣政治集團（如不結盟國家）的發展。美國（洲）的這一衰退突出表現為，委內瑞拉的挑戰並沒有引起軍事上的回應。

因此，力量的關聯性已經從拉美發生的各種重大形式變動中表現出來。統治階級再也不能依仗其新自由主義戰略方針，民眾運動再次出現在街頭，而美帝國主義勢力已經喪失了其干預能力。

主題多樣性

一般而言，社會主義變革的參與者是資本主義統治的受害者，然而在拉美，這一過程

的各個特殊主題則大相逕庭。在有些地區（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墨西哥）土著社區已經在反抗鬥爭中佔據了主導地位，而在其他地區（巴西、秘魯、巴拉圭）農民領導著反抗鬥爭。在有些國家，唱主角的已經是城市的正式工人（阿根廷、烏拉圭）或城市的臨時工（委內瑞拉、加勒比、中美洲）。土著社區的新角色和工人聯盟的相對微弱的角色已經凸現而出。在各個國家，社會階層的多樣性反映出社會結構和政治特徵的不同。

然而，這種多樣性也決定了社會主義變革參與者的多樣性。隨著資本主義對工薪工作的剝削和多種形式壓迫的擴大，社會主義進程的潛在參與者是所有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這一角色不僅僅是落在直接創造剩餘價值的工人階級肩上、也是所有資本主義不平等的受害者的義務。然而關鍵是要在一場圍繞不斷變化的反叛重點展開的共同鬥爭中讓這些團體聚集起來。勝利取決於反對敵人的行動，敵人是以分化民眾陣營的手段去取勝的敵人這一行動。

在這一鬥爭中，某些階層的受薪工人往往發揮一種更為核心的角色，這是因為他們佔據著經濟結構中的重要行業（礦產、工業、銀行）。資本家從所有受剝削受壓迫階級所喪失的權益中獲利，然而他們的利潤卻取決於受剝削者直接勞動力和從一些行動中特別獲得的利潤。

這一核心作用在當前的經濟復蘇的重要時刻得以有力證實，這經濟復蘇傾向於重建受薪工人的重要性。在阿根廷，各工人聯盟正在走上街頭向人們展示著他們的突出地位，這與 2001 年經濟危機時期失業者和中產階級所扮演的角色形成鮮明對比。在智利，礦工們的罷工運動在起著主導作用；在墨西哥，一些工人聯盟正在確立他們的地位；在委內瑞拉，自從石油工人們同政變（2002 年）企圖作鬥爭以來，他們的核心作用一直持續著。

民眾覺悟問題

消滅資本主義是一項完全依賴於被壓迫者覺悟程度的事業。只有這些信念，才能指導人民為社會主義鬥爭的過程。

作為歷史長河中不可避免的變革，這一發

展的原始遠景已經失去了智識共識和政治魅力。這一類型的歷史演變無固定模式可循。社會主義要形成為（組建起獲得）絕大多數人的自願創造，否則它就永遠不會興起。發生在所謂“現實的社會主義”下的事情，揭示了用官僚專制強制取代民意是多麼的可怕。

然而受壓迫者的覺悟是一個易於遭受突然變化的球，並且受鬥爭經歷的支配。兩股相互對立之力量影響其發展：一是受壓迫者在其與資本主義進行對抗中所吸收的知識經驗，一是令人窒息的勞動、生存的壓力和日常的孤獨疏遠而產生的沮喪情緒。

受薪工人們疑慮還是接受現行規則的取向，根源於上述兩股力量之間的相互衝突作用所產生的不同結果。有時批評占主導，有時順從為主流。這些態度還取決於許多因素，並作用於截然不同的新一代資本主義觀念之上。例如，與 1970 年代恰恰相反的是，大批當代青年是在無望獲得更好的工作或教育機會，目睹著排斥、失業和不平等是制度作用的正常面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伴隨現存次序的這一新景象，新一代的拉美人重拾前人的好戰性。

但具體而言，社會主義覺悟並不僅僅取決於資本主義的先決形象。在此層面上，由階級鬥爭和重大國際事件所帶來的影響而得出的結論才更為重要。這些里程碑確定了一些“社會主義覺悟的平均程度”，並轉化為各種程度的反資本主義事業參與熱情或者對反資本主義事業的幻滅。在俄羅斯、中國、南斯拉夫、越南或古巴取得的勝利，帶來了正面的社會主義看法，這期間雖屢遭挫敗，該看法並未破滅。

當今的拉美年青一代並不像他們的父輩在以大勝利著稱的年代那樣成熟。缺乏一個成功的反資本主義參考 - 接近他們切身經驗的參考 - 可以解釋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天然比較冷淡的原因。

當代與 1960-1980 年代的最大區別多在於政治覺悟的程度，而不在於社會力量關係或民眾主題的改變上。這不是社會衝突的增強，也不是受壓迫者抗爭的部署或壓迫者控制能力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而是社會主義模式的可見性和民眾對它的信心發生了變

化。

蘇聯的解體導致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信譽危機，也限制了左派的行動。拉美也不例外，但在地區範圍內受影響程度比較有限。拉美的左派在“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前已經在蘇維埃模式基礎上取得了很大進展，並且其低落更大程度上是由專制獨裁遺留的負面效應、桑地諾革新運動失敗或因中美洲叛亂所遭受的封鎖所致。[5]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古巴革命的倖存形成了制衡力量。

但不管怎樣，低落的氣氛正逐漸被一股重建解放進程的衝擊波所代替。反新自由主義意識的進展充分體現在對私有化和縮減調控的有力拒絕（比在諸如東歐的其他地區所見到的強烈得多）。反帝意識的復興，也不存在盛行於阿拉伯世界的民族性或宗教性的退化成分。

然而，這種反資本主義方面的前後關係成為反新自由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驅動系統中的大斷鏈。這一斷鏈至今都一直阻礙著民眾意識的激勵進程，因而就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進行討論至關重要，這一討論由（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革命進程所發起。這一意識形態的重建是可能的，因為這裏的左派受斷裂之害少於其他地區，存在有許多連續性特徵。無論是工人歷史政治身份的喪失，還是出現在東歐多個國家的與左派的疏遠，都是很不明顯的。

憲法框架

拉丁美洲左派面臨一個比較新的戰略問題：憲法制度的穩定性。該區域歷史上第一次，在幾乎所有的國家和一個重要時期後，統治階級通過非獨裁的機構管理他們的政府。經濟崩潰，政治危機，還是民眾起義都未能改變這種形式的政府。

軍事政權的返回對該半球的精英而言多半是一張用過廢棄的牌。在最緊急的情況下，總統被某些軍政過渡類型的其他領導人所取代。現在拋棄的是獨裁統治的重建，同上層的分裂或下層的叛亂作戰。

目前的體制不是真正的民主政體，而是服務於資本家的金權政治。這個系統的設立已經使得一些社會職權濫用弊端永久化，這些弊端做法，甚至許多獨裁統治都不敢啓齒。這

些濫權行為，削弱了該系統的合法性，但並沒有導致民眾抵制憲政體制，如同舊暴政所遭遇的那樣。



克勞迪奧·卡茨

資本主義統治規則的這一變化對拉丁美洲左派的行動有相互矛盾的影響。一方面，它擴大了公共自由條件下政治行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穩定的議會，政黨和公務人員向資本家提供更多的政治安全和不斷增強的事業信心。

一個制度，減少壓迫者權力的同時又鞏固它，這個制度就代表了對左派的一個巨大挑戰，尤其是當這個制度被大多數人視為一個現代社會運作的自然機制。

右派和中左派鼓勵上述的後一個信念——右派抓住了在憲法背景下進行政治活動的作用，而中左派要保留進步面具下的現狀。雙方都為虛偽的選舉極端化煽風點火，把權力人物的簡單替換當做有意義的變化來展現。

關於該互補性的當前例子是所謂“現代文明的左派”，它出現在盧拉（巴西），塔瓦雷（烏拉圭）或巴切萊特（智利）的政府裏，旨在延續資本家的特權。不過，其他情況更加麻煩，因為欺詐（卡爾德龍在墨西哥）或總統辭職（玻利維亞，厄瓜多爾，阿根廷）打破了體制的連續性。

結果，這些動亂導致資產階級秩序的重建（基什內爾，阿根廷），而在其他國家，危機導致被權勢集團排斥的民族主義或改革派總統意外的掌權。這是查韋斯（委內瑞拉），莫拉萊斯（玻利維亞），並且也可能是科雷亞（厄瓜多爾）的情形。在這些國家，危機和暴動一開始就具有的非體制性質導致了這些後果。

在這些進程中，選舉地區已經被塑造成了一個同反應作鬥爭的區域，以及同激進變革達成協議的支援點。這個結論對左派是非常重要的。舉例來說，自1998年以來，所有的選舉都加深了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革命進程的

合法性,並把街頭右派的失敗轉移到投票箱上。選舉的範圍和動員的成功相輔相成。

幾十年來左派已經習慣於面對一個獨裁的敵人,憲法設置大大改變了他們行動的框架。戰鬥在這些系統裏並不容易,因為制度主義同再造現存秩序的永久藉口一起作用。因此,有必要把直接行動與參加選舉結合起來。對這條路,民權興起---是每個革命進程必需的---的時機,和社會主義覺悟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憲法舞臺而促成的)是相輔相成的。

運動和政黨

大眾覺悟轉化為組織。被壓迫者的分組組合對創建反資本家的變革的手段是不可缺少的,因為沒有自己的組織,被剝削者就不能為社會啟動另一種事業。

運動和政黨構成當代民眾組織的兩種模式。這兩者為社會主義信念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加強自我組織的信心和未來民眾權力集體運作的發展基礎。

運動支撐著直接的社會鬥爭,而政黨發動更蓬勃的政治活動。這兩個情況對促進直接的行動和參加選舉是必要的。不過,這種互補性經常遭到質疑。有一些排它性的運動和政黨鼓吹者。

但這些反對,只是使某些政黨的行動無效,並不涉及這些結構的一般功能,這些結構在政治層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只在社會層面上,沒有一個解放計畫能獲得進展,解放計畫不能沒有特定平臺。這些平臺由政黨組織提供,把權力的需求和戰略鏈結起來。這些組織有助於克服自發反叛的局限性。政黨促使反資本主義覺悟的成熟。這種成熟不會從抗議行動中突然出現,它需要把資本主義條件下爭取改良的鬥爭和爭取社會主義目標的鬥爭區別開來。

政黨的不合格同優越性的缺陷一樣是不足的,有些左派組織仍在展示優越性。他們保持舊的先驅領導者觀念,實行嚴苛的等級行為,還總是自許高人一等。該組織的狂熱崇拜,在所有的社會運動裏,導致派系分立和追求獨佔。

這種形式的政治行動本身繼承的是集體軍事獨裁的傳統,或由上而下的強人政治傳

統。在一些國家,這種行為還表現出固執的壞習慣,這些壞習慣的來源,是在幾十年的秘密行動和反獨裁抗爭中建立起來的組織文化。在目前的公眾自由和政黨競爭的框架內,這種行為的混亂性質是顯而易見的。保持這些做法的那些人可以發展起來,但他們絕不會領導一個社會主義改造。

改革和革命

物質條件,力量關係,社會課題,大眾覺悟和民眾組織環繞著左派的戰略,形成主題六邊形。按照社會主義意識把行動、信念和建議聯接起來的必要計畫,依賴於這六個基礎。

然而,這些組件很少是相合的。有時,物質條件的成熟度同力量的關係,社會課題的辯護,或政治背景的傾向並不合拍銜接。這些因素同反資本主義運動必需的組織程度、覺悟程度和民眾領導能力的聯繫仍然不夠普遍。左派戰略是探索克服這些不一致性的途徑,探究這六大問題的解析特點,以促進這一分析。

最大的問題在於連接這些支柱的鏈結。要走的路線是極其不同的,因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普遍性並不等於均一性。二十世紀的經驗已經說明了,在每個國家這一進程的基礎是如何以不同的形式相結合的。它也證實,在叛亂迅速結束者(俄羅斯)兩權長期相爭者(中國,越南)之間,社會主義初期的臨時性質有顯著不同。[6]

改革和革命,這兩個社會主義變化元素之間的斷裂引發出兩難困境,對該困境有傳統上相互對立的兩大反應。第一路徑是通過社會改良進程,促進這些脫節元素相結合,這些社會改良包括加強工人的地位,把他們的政治份量、體制存在和組織力量團結起來。

但這些改革-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可行的-不積累也並非不可逆轉。或遲或早,改革的鞏固(或深化)會同利益原則衝突,並遭受雇主的濫用以至挑起重大衝突。在這種情況下,相應的民眾反應是要求推進社會主義變革。

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改革只能作為一條紐帶才能生效。不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導致的不僅是放棄反資本主義的未來,也會丟失改良本身的前途。為了“稍後討論社會

主義” 首先嘗試“解決眼前的問題”，這是不對的。如果資本主義能在結構上解決這些問題，那末社會主義就是不必要的。

第二個關於社會主義改變的想法是推進革命和拒絕改良。它呼籲，通過行動，把資本主義的危機高峰同群眾鬥爭和社會主義信念的部署聯結起來，從而克服客觀和主觀條件之間的脫節。不過，這個聯結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即便出現了接近列寧主義模式的革命形勢的局面（“上層不再繼續主導，下層扮演歷史劇變的領導角色”），也是這樣。

過去的幾年中，在南美洲我們觀察到各種各樣的這類情況出現，但並不帶有任何社會主義的結果。統治階級的霸權或權力危機（在葛蘭西條款裏，多數共識和領導能力的喪失）同下層階級的反抗的匯合是不夠的。[7]

社會主義的成熟需要一個事先的學習過程，這並不是權力征程上的即興之作。這個準備包括通過改革獲得的社會成就和民主戰果。後面一項不是一個貶義詞，也不是革命的反意詞。它是一個有用的工具，有用於逐步發展革命的飛躍，架設橋樑讓被壓迫者更接近社會主義目標。

改革和革命的結合可以把立即征戰和同資本主義徹底決裂兩者聯接起來。第一種成果是創建人民權力不可缺少的，第二種則用來挫敗不放棄其特權的敵人。

把改革與革命聯接，是適應各個國家的力量相互關係和民眾行動的辦法，那些力量相互關係和民眾行動有可能促成反資本主義的變革。但是有必要用它們的匯合點取代雙方的道路上的舊對立。

樂觀與理智

關於戰略的討論，其預設的條件是，尋找一個總是對新的情況和經驗開放的，過去經驗裏的鼓動指南。這項調查包括了前所未有的假說，而且並沒有一個簡單的計算模型可供重複使用。

左派戰略包括有在其他政治架構中無法找到的一個自由層面。它以共產主義的視野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目標，那不是資產階級思潮所能提供的。但這些目標的公信力取決於其組織者的行為，而且這種行為的先決條件是這樣一種態度，即對不平等的自發抵抗和

對不公正的天然排斥。

戰略的功能是把面對苦難的憤慨和被壓迫者的團結轉變成理性的事業。而且這個發展要求以理智無畏的精神面對最棘手和最不愉快的問題。如果沒有處理困難的意志，社會主義道路一定會繼續受阻。

當代拉丁美洲的轉機要求以坦率、公開和尊重的辯論更新左派的戰略爭議。用熱情和批判的態度採納各個成就和權衡各個局限性，現在正是時候。這兩個立場有助於建立理性的樂觀主義，這是社會主義鬥爭所要求的。

克勞迪奧·卡茨任教于布宜諾賽勒斯大學，並參與阿根廷網路雜誌‘左派經濟學家’（EDI，‘左派經濟學家’）的工作。

注釋：

[1] 這篇挑戰性理論文章首次以英文發表。克勞迪奧·卡茨介入拉丁美洲社會主義未來的熱烈爭論，這些事在整個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網站和雜誌期刊上有很多討論。在提供卡茨最近作品的譯文時，“新社會主義者”雜誌社嘗試向北美讀者引進一種特別味道的討論，主題是為21世紀建立一種當前發生於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編者給原著加了註腳。克勞迪奧·卡茨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經濟學家，國家科技會議的研究員，阿根廷“左派經濟學家”雜誌成員。本文由“新社會主義者”雜誌編輯傑夫雷·R·韋伯翻譯，發表於“新社會主義者”第61期（2007年夏）
www.newsocialist.org

[2] 克勞迪奧·卡茨，“社會主義和新發展主義”，見於西班牙 www.lahaine.org，1-12-06，或 www.rebellion.org，1-12-06。

[3] 凱恩斯主義指凱恩斯的改革派經濟理論。是二戰結束至70年代最具影響的思潮。

[4] 南方錐地帶指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和烏拉圭。

[5] 桑地諾主義指1979和1990間尼加拉瓜桑地諾革命政府的實踐和主張。這裏中美洲武裝起義指1980年代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進行的不成功的革命遊擊戰爭。

[6] 雙重政權指一個革命形勢的不穩定和不持久的階段，這時候被剝削被壓迫者的民眾機構出現在一邊，同政府的現存機構相對立。

[7] 安東尼·葛蘭西是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發展了關於領導權的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40 年前的國家大屠殺

墨西哥 1968 年：社會爆發成政治舞臺

阿圖安·吉亞

“如果整個國家感到羞恥，它就是一個正準備跳躍的獅子。”——奧克塔維奧·帕斯，德里，1968 年 10 月 3 日。

1968 年的墨西哥學生騷亂是舉世皆知的，因為 10 月 2 日在墨西哥城的特拉德羅爾

科的三種文化廣場發生了大屠殺。在共和國總統的策劃下，超過 1 萬名士兵和警察進行了一次軍事行動，包圍和關閉了約 6000 正在舉行和平集會的人，其中有學生，教授，母親，兒童，雇員和工人。



直升機，奧林匹克營的軍官，警察，士兵和坦克用強大的武器向手無寸鐵的人群開火，他們採取的這項行動，被辯稱為一個意想不到的衝突。但它是一個有預謀的精密計畫組織的國家犯罪[1]，目的是把數十萬動員民眾的衝突徹底粉碎解決掉，因為這些民眾贏得了公眾輿論和取得了全國各社會階層的廣泛同情。

鎮壓造成無數青年，婦女，兒童和老人死傷，死傷者不僅彈痕累累，而且還被士兵刺刀插過。這個 10 月 2 日，超過 2000 人被逮捕，

包括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積極分子和成員。他們經歷了酷刑的漫漫長夜：模擬處決和閹割，恐嚇，針對家庭成員及朋友的綁架和暴力，極其難以置信的指控的虛構，導致後來法院的立案基礎是完全捏造的證據。

有廣泛的迫害，未言明的戒嚴狀態，通信工具的控制，憲法保障權事實上的中止，這一切針對的是一個想像的顛覆活動。[2] 在墨西哥，一如往常，國家用了其全部不成比例的武力清算並且從而最終結束了傲桀不馴的學生

1. 挑釁和暴力

在 1968 年 10 月 2 日，他們希望用暴力結束開始於 7 月 23 日和 26 日的應對警察暴力的歷史。7 月 23 日，緊接著兩所學校學生之間的爭端，鎮壓部隊入侵其中之一（是國家理工學院 IPN 的一部分），用不成比例的武力，不分青紅皂白和無情地用棍棒毆打學生，教授和學校工作人員。7 月 26 日，成為學生運動的真正開始，理工學院學生號召的，抗議這一鎮壓行為的示威，融合了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UNAM）的學生和各種左派團體特別組織的支援古巴革命的傳統示威。

應理工學生的要求，成群的學生試圖達到左卡洛廣場聲援再次遭警察棍棒毆打的學生。但是他們被暴力推回去，此後有許多對抗，當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UNAM）預備班的學生離開課堂時，他們遭到警察的襲擊，促使這些對抗延伸和擴大。警察完全包圍了市歷史中心的舊大學區；被包圍的學生立即建立路障。巴黎五月路障的記憶仍然新鮮，媒體對它做了大量的宣傳。[3]

學生的第一反應，完全是自發的，碰到了升級的鎮壓和廣義的對抗，對抗的高潮發生在 7 月 29 日夜間軍隊的干預，和對國立大學及理工學院的幾所學校的暴力襲擊和佔領。包括在清楚知道這座歷史建築裏住著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預備班的情況下，發射火箭筒。在這 4 天的結尾，各機構被搗毀並佔領，警察包圍了一些地方，被燒毀的公共汽車變成路障，有人員傷亡，逮捕，失蹤，甚至有人說，一些人已被殺害，在此期間，對學生的威脅恐嚇從未停止過。[4]

因此，它是國家的過分暴力，是 1968 年墨西哥學生運動的起源，也是同樣暴力的產生原因。我們可以從一開始就看到代表政府的明顯挑釁行動和行為，旨在尋求對抗。這表現在警察和士兵的鎮壓行徑以及對教學場所的入侵，還表現在技術學生全國聯合會（FNET）領導人的混亂行動，[5] 他們出現在“波拉斯”（棍棒）——防暴團體——出名成員的路障上，還有，特別是 7 月 26 日奇怪地出現在市中心垃圾桶的石頭。

實際上，暴力是所謂墨西哥革命體系的家常便飯，該體系得以建成，有賴於制度革命黨

（PRI）的社會力量的義務合作，得力於一個全能強大的作為國家和民族化身的總統權力。中央集權體系和嚴格施行的等級制度不會容忍任何持不同政見者，也不允許民主形式的參與和立法的發展（選舉是儀式活動，除了預先指定候選人的立法活動以外，沒有實際效果）。

一切形式的暴力，合法和非法的，形成了一個反動和侍從關係的封閉秩序的本質。1958 年至 1959 年工人鬥爭失敗之後，接踵而來的經濟增長和國情穩固[6]，利令智昏的古斯塔沃·迪亞斯·奧達茲——一個周身覆蓋在病態反共主義裏面的極端傳統主義者，反共主義這一體系完全是在冷戰名義下發明的——政府沒有注意到“經濟奇跡”本身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的變革：城市化，大規模工業化引生的工人階級新團體，第三產業的增長，不平等，農業危機，農村移民和貧困，新的更加對外部世界開放的文化進程，等等。所有這些因素促進了社會的成熟，同時，擴大了一方面是這個社會和另一方面是難以忍受的政府和政治體制兩者之間的隔閡，後者建立在征服和排斥的基礎上。

1968 年出現了一個體系的矛盾，該體系是絕對的，不容置疑的，禁止奢侈浪費的，但其中含有準備讓它爆炸的力量和矛盾。這是一個雙鎖封閉的體系，沒有絲毫的開放，安全閥或漏洞。所謂的 1910 年革命體系的頂峰和天頂，它根基於穩定經濟發展的奇蹟，它組織了第一次在拉丁美洲舉辦的奧運會：象徵著國際社會的承認。它的衰退很快就會來臨。1968 年學運將成為該政治體系的頹廢和正在迅速深刻變化社會的出現的先驅。它尊重法律的要求，對正義和自由的要求，它的民主實踐，其創造力和溝通能力的施展，其自主性，其大膽，其迅速的政治化，有如腐蝕性酸，將要攻擊總統政權的專制邏輯。

2. 意外的反應

該政權體系已無法預見學生，教授，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UNAM）副校長的意外反應，換言之，無法預見社會的意外反應。在一個侍從關係及有罪不罰無法無天的環境裏，政府和機構胡亂行事這個特點，通過恐懼和辭職而被容忍。那些不滿者不是被收買就是被剔除。鎮壓水準和不可避免的行政複雜性以及腐

敗而完全順從政府的司法系統，使得個人或集體的抗議和投訴氣餒不振。因此，當我們，學生，開始用暴力和失控的對抗捍衛自己免受警察的打擊時，當學生會議投票反擊武力的濫用，和要求釋放我們受到攻擊的同志時，7月30日，國立大學副校長，哈威爾·巴羅斯·塞拉里昂，因為校舍的軍事佔領，在他的辦公室前把國旗降下了一半，因此引發了一次捍衛大學自治的示威，這時，在該體系的高層沒有人懂得發生了什麼事。

在軍隊佔領的墨西哥城，8月1日，由副校長巴里奧斯·塞拉里昂，學者和教授領導的示威遊行，動員了8萬多參與者，他們來自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和國家理工學院。我們徹夜活動，從而開始了雪崩似的動員，儘管有警察和軍隊的經常干預，有綁架，迫害，攻擊和准軍事（恐怖分子）的暴行，動員仍在不斷增長，這些暴行是最高階層組織舉辦的，而不是只由體系的下層命令組織的。該國首都充滿了被學生和教師大眾的行動所改變的生活。在幾個星期內，我們逐漸接管城市，把它變成了一個供作討論，抗議，自由和無畏言論的論壇，收回公共場所，比如左卡洛廣場——通常是保留給該體系支持者的——但也收回學校，市場，公共場所，街道，居民區，交通運輸，辦事處，公司——使它們都成為對話的論壇。大遊行的組織，沒有實在的物質資源，大多是即興發生的，大遊行只是數千甚至數萬名學生瀰漫性活動——是狂熱的——的指標，學生們滲入墨西哥城最後的幽深處：8月5日，示威遊行從紮卡騰庫到卡斯科·德·聖托馬斯（10萬人參加）；8月13日，示威遊行從卡斯科·德·聖托馬斯到左卡洛（15萬人）；8月27日，示威遊行從查普爾特佩克人類學博物館到左卡洛（超過25萬人參加）；9月13日，舉行了一場無聲的示威遊行（20萬人）。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組織的幾次中心集會為這些凱旋示威遊行做了準備，集會舉行的城鎮有600萬居民，他們習慣於“acarreo”社團主辦的正式遊行和集會。[7]

學生不滿和反抗的表達，對政府來說，是難以理解的，不可想像的，不可能的，而且很顯然，在國家元首的心中，它只能是外國共產主義型的顛覆勢力之產物，目的是利用學生們破壞國家穩定和破壞奧運會的舉行，而奧運會對政府是如此的珍貴。在拉薩羅·卡德納斯時

代，處於大眾動員中間時，那時墨西哥革命在制度化，社會是通過將要成為制度革命黨的東西而被壓服的[8]。工人和農民的戰鬥力，自主力，組織能力和表達能力被政府沒收了。社會的集體力量，被一個極其等級森嚴的政治制度沒收了，該制度把人口劃分為不同的階層（工人，農民，普通階層），劃分為團體（工會，工會聯合會，由政府干預而扭曲的不同的重組團體），在那兒，屈服的集體決不允許公民個性的表達。受制屈從於強行的分化和等級，導致團結鏈的破裂，社會因而要受害於它同社群主義和相關傳統的撕裂和扭曲，社群主義和相關傳統的特點是代代相傳的人民和廣泛的社會群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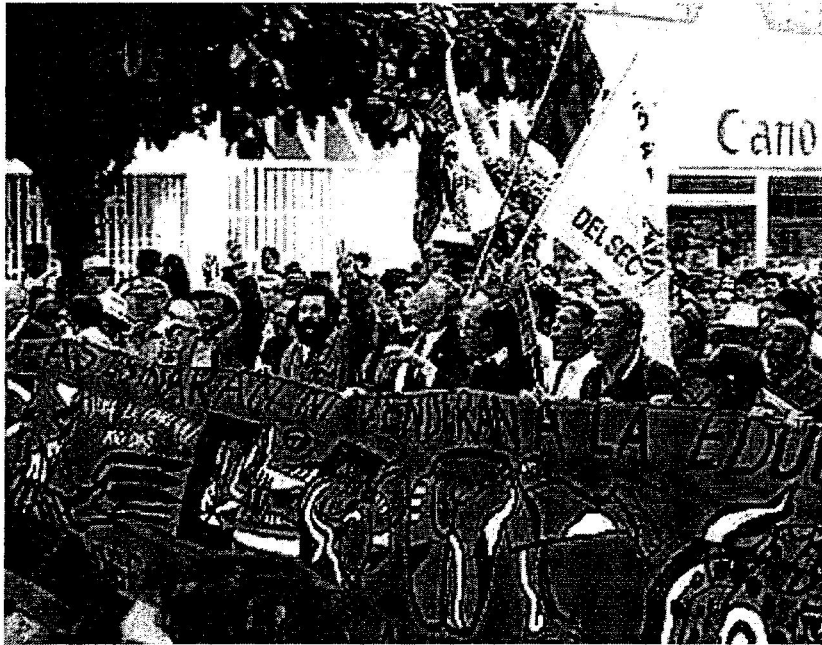
墨西哥的政治，因此只在制度革命黨的成員裏才發生，該黨是一種政治機器——由共和國總統操持的機器——其作用是保證維持其統治，而且也給辯論提供體制空間，在所謂“革命家庭”成員的政治行動者之間分配權力。新異議和新政治行動者可能出現，但他們不是立即被吸收同化，就是以某種方式被剔出行動。這台機器是國家機器網的一部分，其政策，無論公開與否，都致力於保障現有秩序，保障穩定，甚至保障其仍植根於墨西哥革命的合法性。

所以，當學生和老師開始反抗國家的任意鎮壓，謊言和無法無天有罪不罰時，他們打入了保留給政治的空間，打亂，入侵，打破了規則，這些規則可能充分延續該制度並保證繼續當前的經濟社會秩序。這就是為什麼墨西哥的學生運動從一開始就表現為一個審慎的政治運動；它的要求是反對獨裁主義的：釋放政治犯，清算鎮壓部隊的罪行，並解散他們，拒絕濫用權力，要求正義和尊重民主自由[9]。所有這一切都不要忘記，墨西哥所有的社會運動，一旦出現，由於國家本身的干預，它們不可避免地會政治化，針對干預，社會運動不可避免地會加速。這是該政治制度的本質，它削弱了社會和政治的傳統區分，並造成這樣的悖論，該制度把所有社會衝突政治化，而它自己卻依賴於非政治化。

1968年3月退伍軍人與罷課的國立大學學生遊行，1999年，由於暴發成全國舞臺，學運贏回了公共空間，把整個城市具體轉變成了政治活動和溝通的場地。然後，人們工作，教學，生活，偶然會有一些碰撞（如公共交通）的地

方，被轉化成許多交際和對話的場所，換句話說，成了政治活動的空間。看到最多樣的人，最不同的社會群體，以上千種不同的方式捲入運動，這種情形令人吃驚。儘管這個運動處於這樣的氣氛中，即：媒體（當時主要是廣播，

報刊和少量的電視）一直展現極權主義的特點，受到國家檢查和每日自我檢查，機會主義者，服務於冷戰，天主教會和這個政治制度，這個運動，已經能夠贏得人們的理解，他們的團結，他們的出謀策劃。



毫無疑問，學生的想像力，他們的敏感性，他們的創造力及組織和動員模式的發明能力，激情地充滿了一個社會，這個社會一直苦於遭受到權力的濫用，任意的判決，貪污腐敗以及必然的侍從庇護關係警官，法官，公務員，雇主，社團領袖，黨魁，雇員：在各個級別和各個環境中，老百姓受害于任意的權力，專制，公正和民主的缺乏，甚至侮辱或鎮壓。這就是為什麼從不同的部門和社會各階層有越來越多的人最終聆聽了我們學生的要求。許多父母認同了來自他們的子女，他們的親戚，他們的朋友和鄰居的挑戰，即：我們，學生或教授，反對因恐懼而麻木不仁，即使遭受打擊和迫害，仍然堅持鬥爭。一些累積而發的憤慨，把隱忍未發的狂熱怒氣帶上了臺面，至少鼓勵了他人的潛在反抗，並導致對政府信心的喪失和總統的非神聖世俗化。多虧以自主，勇氣和決心使社會動盪的學運行動，大眾政治化的起頭就開始尋找自己的道路。

3. 運動的組織

一旦 7 月 26 日星期五晚上發生的事件眾所周知時，我們就開始動員，並尋求協調的方

式。週六 27 日，罷課開始的地點選在理工學院，並設立一個國家理工學院的協調委員會，和呼籲舉行總罷課。與此同時，在大學宿舍建立了一個機構代表的協調委員會，這些機構有組織傳統，主要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幾天之內，罷課已擴展到國家理工學院的所有研究所，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查賓戈國家農業研究所，國立人類學和歷史研究所，教師培訓學院和國立大學。全國各地許多學校和大學以及像阿納瓦克·伊比利亞美洲大學一樣的私營機構很快就加入了罷課。雖然學生的罷課一般只發生在墨西哥城，它實際上是一個全國性罷課[10]。

在一般的集會，團隊遊行和行動委員會的每一個組建過程中，自發組織的學生，齊頭並進，努力協調和集中，導致第一個統一的宣言，提出了 6 點綱領，要求政府在 72 小時內回答，並警告說，如果沒有得到答復，就要把罷課擴大，而且 8 月 5 日星期一召集了第一次示威運動。8 月 8 日，標誌著 72 小時警告期的結束，全國罷課委員會正式創建，在開始時，有 59 個集會或行動委員會的代表與會。幾乎同時，高校教授爭取民主自由聯盟出現，它來

自 50 所支持該運動的學校，甚至派代表（有發言權，但無表決權）參加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此後不久，作家和藝術家協會創立，它用多個活動給運動以文化和節日的印記。

全國罷課委員會（CNH）負責運動的全面協調和領導，提出了各種將保持它進攻氣勢的行動。這項工作涉及各個統一示威遊行，而且還有會議，宣言和倡議，如要求公開與政府對話，把它作為解決衝突的方式。隨著運動的增長，它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合法性，運動達到最高點的時間，是 8 月 5 日的示威和 9 月 13 日星期五的無聲示威之間。在這六個星期的時間，全國罷課委員會（CNH）鞏固了它與學生集會的關係，並幫助加強團隊的工作，在此期間，完全侵入了該城市並發展了反專制和民主的宣講，那將是該運動的標誌。面對政府的計謀，其威脅和鎮壓行為，它保持了對政府的挑戰。它為公開對話所作的辯護[11]作為一個絕對的原則，使得保持運動的凝聚力和連貫性是有可能的，只要維護它不被傳統的政府機制拉攏收買，從而保證其主要代表和發言人的地位。毫無疑問，目標是獲得“最大的民意支持”，並造成“該政治體系最大程度的孤立”[12]，這個目標是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動機，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特別是從長遠來看，得利於整個運動所動員的各個力量的結合，該目標已獲得很大程度的實現。

大會聚集了大量的學生，他們討論並做了集體決定。這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化學校，是某些知識份子疲於醜化的社會化和集體思想的學校[13]。但是，這些大會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他們往往變得冗長和乏味，因為他們可以在日常的基礎上保持普通學生同行動委員會及全國罷課委員會（CNH）之間的關係。贊成激烈討論和集體決策的資訊和建議，在不同的團體之間流轉，並導致日益良好的協調和集中活動。通過對行動委員會做選舉，大會阻止它們變成不具代表性的活動家或左翼激進分子所壟斷的機構。這種運作方式使運動具有民主性質並賦予它一個不可否認的凝聚力。

學生團隊是擴展，動員和進行政治社會組織的最廣泛和最有效的機制。一般是三個，五個或十個學生一組，他們便於四處活動，在牆壁上塗寫口號，散發傳單，在即興的會議和與人討論時解釋運動的理由，促進團結，籌集資金或貨品實物（市場上的糧食，辦公室中的紙

張，商店中的油漆，等等）。還有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科學系成立的更大規模的團隊，由幾十甚至數百名學生組成，他們在一些重要的途徑上封鎖交通，目的是舉行即興會議。團隊還去了工廠，工業區，辦公室，市場和建築工地，他們還走進被稱為是粗野似乎不可滲透的街區，而且在那裏學生們總是會遇見關心和聲援。人人害怕的，尤其是警察擔心的幫派，年輕人團夥——歡迎我們，甚至加入我們的鬥爭，例如在某些接近學校的地區，這些幫派團夥發揮了基本作用，抵禦警察攻擊，特別是在卡斯科·德·聖托馬斯和特拉德羅爾科地區。許多團隊甚至做到了有組織的大遊行示威，給他們帶來組織和安全，然後他們又繼續工作在城市的漫漫長夜。

數百個團隊的出現和廣泛工作，示威和集會以及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出現，提供了 1968 年運動論述的形式和意義。首先的挑戰是對抗新聞和電視操縱的虛假資訊，反駁政府和其代言人的誹謗，這是逐步實現的，如同從示威遊行中看到的，示威遊行被越來越多的人跟從遵循，先是從公寓的窗戶裏，從街頭數百名行人裏，然後成千，然後上萬，然後成千上萬的觀眾成為了遊行參與者。

許多宣傳是團隊自己的即興發揮，儘管它最初由每所學校行動委員會集中制作的，然後由全國罷課委員會（CNH）集中化，從而增加其大量印刷傳單的能力。我們聖卡洛斯學校的藝術家同志狂熱地製作了海報和張貼，整個城市都可以看到。在政治科學學院，製作了非常富有想像力和創意的宣傳，有無數的傑梅·哥德的墨水畫海報，人們要拍攝這些海報顯然沒有問題。

對於征服公眾輿論，在宣傳和喚起同情上，以及在獲得甚至是非常不同的社會群體的聲援方面，團隊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運動在全國各地的伸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團隊及其成員的工作。即使是媒體，特別是新聞界和廣播，不時有開放的跡象顯示出來，因為有壓力來自追隨我們努力的記者本身，來自於我們學生要使自己得到理解和實現我們的目標的努力，也因為有運動不斷提出其要求而帶來的明顯影響。

然而，由於團隊本身的性質和分散性，他們的自主權和他們實在的自我組織，集中化的組織是不可能的，儘管它通過一種團隊總協調

(CCGB) 機制做過嘗試，該機制是政治科學學院倡議創建的，雖然它得到國罷工理事會 CNH 的批准，仍然被一些人認為是一個挑戰全國罷課委員會 (CNH) [14] 領導作用的極左嘗試。在現實中這種協調被用來計畫和合理化這些普通組織結構的活動，防止他們彼此來到同一地點而耗費太多的精力。9 月 1 日星期天——總統第四次報告的時候——我們嘗試了一個秘密的行動，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功 [15]。9 月 18 日國立大學的軍事佔領並沒有使該項目成熟，儘管許多自主團隊繼續發揮作用。

所有這一切組織的和參與的熱潮並非空穴來風，並非是完全新的。實際上，它是一個學生組織的社會政治上重組的長期過程的表達，比如農民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或是失敗的嘗試，如全國民主學生聯合會 (CNED)，他們為物質的或明確的政治要求，鬥爭在區域的或甚至更廣泛的層面上，那些地方的學生們是中心或參與者之一，就像奇瓦瓦州，米卻肯州，格雷羅州，布埃布拉州，錫那羅亞州，索諾拉州，新萊昂州和塔巴斯科州，以及在首都本身，在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國家理工學院，以及在教師培訓學校 [16]。

在許多這樣的經驗裏有一些先例，不僅有鎮壓和軍事干預，有固執和不妥協的狀態，而且也有阻力，以及像會議，團隊和各種協調委員會一樣的組織形式。特別是，在 1960 年代的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最激進學生的活動主義——這是我們的組成部分——在奧運會的爆發之前，最終挫敗和拆除了所謂的整合學生聯盟主義（大學學生社團聯合會，FUSA，連帶其學生社團，它的執行委員會及其被稱為“波拉斯”的行動團體），整合學生聯盟主義從屬於制度革命黨，它控制了校園；在 1968 年的國家理工學院，我們看到了強大的技術學生全國聯合會 (FNET) 的死亡喪鐘。1968 年的學運集中了這一複雜的過程，豐富了它並加強了其最好的經驗。

4. 實習合法性

墨西哥 1968 年學生運動特點首先是它的和平性質，它對合法性，正義和民主的要求。它首先是一個反對有罪不罰現象的鬥爭，反對謊言，不僅同總統古斯塔沃·迪亞斯·奧達茲的頑固而且同官方機構的頑固作鬥爭，這些官

方機構沒有代表性，更是缺乏合法性，他們腐敗並濫用權力。六點綱領要處理侵犯公民權力的問題，要處理把懲罰合法性疊加在自由之上，置於憲法載明的保障之上的問題，要求和希望恢復受到侵犯的司法制度，那些侵犯者有：負責任保障它的人，創造了它的人，以及根據自己的興趣利用它的人。

對於學生，尤其是最政治化的學生，實習合法性有點困難，它違反了這個國家的潮流，這個國家極其墨守成規，但不重視法律，順從任意的統治和烏有的法治。憲政秩序本身就是矛盾的，是革命妥協的情況下的產物，革命通過粉碎其主要驅動力而獲得勝利，該驅動力就是其參與者中的普通民眾階層。被神聖化的總統絕對主義，成為一個不受檢驗，核查或控制的政治體系，在那裏模仿是一個主要特點。三個武器（行政，立法，司法）被吸納在單獨一個全權的總統權威中。政府和缺乏權威的法官，習慣於專制統治，提出荒謬的指控，而且審判的根據是謊言和陰暗的秘密操作，尤其是還有政治的幹與。事實上，1968 年的要求之一就包括釋放未經真正法律審判而關在監獄的工會領袖，如德梅列霍·瓦勒若，瓦倫丁·坎帕，維克托·波多黎各·加蘭及其他人。

政府觸犯法律的行為成了日常活動，政府的這種性質令人驚歎。憲法載明的權利在事實上的缺乏，把憲法弄得像是一紙空文，導致了一個專制的，包辦一切而令人難忍的王朝之非常真實的存在，它不容有任何一種民主調解。同所有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一樣，學生不得不在一種半秘密狀態下活動，而且校園以外的任何活動都是受到嚴重威脅的冒險。只有某些宗教儀式的遊行被容忍的。“制度暴力”補充以准軍事暴力。運動期間，政府不時地訴諸可怕的行動，如向學校開機關槍，毆打，綁架，爆炸，起於 10 月 2 日的一場骯髒戰爭，到 20 世紀 70 年代失去了控制。

因此，合法性的實習，逐漸臨到我們而沒有保留。所以如此，不是因為全國罷課委員會 (CNH) 某些領導人視為拒絕民主的東西，或者激進派學生的“極端主義和左派教條主義” [17]，而是因為難以達成協定的形勢。面對辱罵鎮壓，軍隊的非法干預，大學自治受到侵犯，處決和無休止的迫害，學生還是開始講說使用並去理解合法性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合法性保護我們，讓我們合法化，它也突

顯出該制度的犬儒主義和不協調性。副總理哈威爾·巴羅斯·塞拉里昂的態度，以及 8 月 1 日的示威用了他的名字，這些都是積極的步驟。

示威的舉行，沒有屈從必須請求警方允許的條例，這個事實給了我們信心。團隊遊行，每日會議，無論有或沒有警察的攻擊，終於使我們擁有了法律設立的權利，它過去一直是有條件的，並被政府取消了。一點一點地，人們理解到和接受這一點，即：合法性，憲法，也可以是權利的底護所，保護牆腳已挖的自由，保護對政權無法無天的行為作抗議的權力。因此，該運動獲得了合法性的一面，它要求尊重已經遭到了踐踏的憲法和法律，而踐踏者就是憲法和法律的制定者。因此，在墨西哥，學運也是爭取人權和為民主戰鬥的先行者。

5. 群眾政治化

直到讓整個民族蒙羞的特拉德羅爾科事件的那個黑夜——正如奧克塔維奧·帕斯所說的——因為政府的大屠殺，學生運動發展的近十周時間，是群眾政治化緊張而漫長的日子。首先是學生和教授的政治化，他們避開慣性，離開束縛他們的冷漠，因循守舊，等級關係的繁殖以及溝通的缺乏和孤立。

這個運動是一個平均主義的呼吸氣息，它創造了團結，合作和快樂的關係。它不僅沖走了殘留的正式學生和專業的分組，而且還掃去了教育系統的功能所促進的舊仇恨和競爭，如那些起源於體育比賽，執著在自治國立大學和理工學院之間的仇恨。大會的辯論，街頭的佔領，自由的實習，同所有社會和文化環境的人民的重要相遇，對城市多樣性的承認，未知交流能力的調動，尤其是對日常事件的集體破譯（這些日常事件使我們同政府及其機構，同它對媒體的處理對抗），運動作出反應的能力，所有這一切標誌著一個政治化的進程，一個認識發展的進程，整代人的一個不可逆轉的文化變革進程。

但是，人民（正如在那些日子裏我們所說的），換句話說，社會，帶有差異性和不平等性的社會覺醒了，發現了示威遊行和政治實踐，對制度的意見和批評，使無數的社會團體不僅更接近學生，而且也接近政治。這也是為什麼運動表現出了把尊嚴還給政治的一種可能性[18]，政治已經退化，並被仍然自稱為墨

西哥革命的政權體系抹殺了。如果運動成功地被視為學生和民眾運動，那是因為墨西哥城的居民——特別而不是唯一的——接踵而來，湧上了政治舞臺。教授，藝術家，小店主，母親，中產階級的和更加寬裕階層的所有家庭，雇員，工人等，在示威和會議期間，特別是在同學生的日常接觸時，表明——有時以傳播的方式，有時以開放的方式——贊成運動。在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各個會議上，越來越多的各種群體來表達他們的聲援或呼籲其他人也這樣做。

這一過程造成了人們心境的改變，其中最重要的時刻，一個顯示公眾輿論轉而支援學生的時刻，不是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是 8 月 27 日，因為那一天的示威達到了該運動的最高點，根據一些估計，有 40 萬人參加了該示威遊行。而是第二天，28 日星期三，這一天所謂向國旗宣誓效忠的儀式失敗，必須參加一次官方會議的公務員反叛，而政府不得不求助於軍隊坦克驅散了該會議。公眾輿論的戰鬥已經取得了勝利，體系控制的裂縫象徵了決定性的變化，它當然影響了政府訴諸武力結束衝突的決定。

6. 學生領導

自然地，許多學生在運動的各機構中變得政治化，他們在那裏獲得他們的初步經驗，然後進入政治世界。但是，許多運動參與者來自其他的鬥爭，他們有經驗，這些經驗在辯論和政治實踐中培訓了我們，而實踐或多或少是社會的和開放的，或多或少是秘密或半秘密的。全國罷課委員會（CNH）大多數最突出的領導人曾是或在最近的過去已是左派組織的中堅，就像行動委員會以及會議和團隊組織者的許多成員一樣，尤其是在自治國立大學，以及在墨西哥城和在該國其他地區的其他學校。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代表了理論和政治遺產的記憶和連續性，這些遺產已經成功地生存下來，並面對鎮壓體系的潮流塑造了本身，在人民和民族主義神話的基礎上，20 世紀的第一次革命產生了鎮壓體系。

1968 年的運動之前的這些年代，是重組改組的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墨西哥左翼增強的年代。這一危機，破裂，和創新群體及左翼潮流出現的進程，實際上是偉大的獨立工會鬥爭的矛盾結果，該工會鬥爭結束於 1959 年的

軍事失敗[19]。墨西哥共產黨（PCM）的這場危機，發生在古巴革命勝利和中蘇衝突的情況下，導致一個馬克思主義類型（自我確定為革命者或自由者）的重要出現，開啓了左翼的選擇範圍，那以前左派主要限於親蘇聯共產主義和隆巴多主義方面，後者是一種史達林風格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20]。斯巴塔克主義，由作家何塞·熱烏爾塔所創造，是最多樣化和廣泛的潮流，但也有托洛茨基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格瓦拉主義的增長。隨後的左翼的社會和世代交替變化，有更多的年輕人捲入——主要是正在擺脫制度化網路的學生和知識份子——該變化將在狂風般國際氣氛的影響下成熟[21]。所有這些左翼潮流導致全國罷工理事會（CNH），即使運動把它們吸進來，把它們弄得雜亂無章，變革和運動的成果終於把它們擺平。1968年之後，一個左翼新結構造成了不同節奏和水準的崩潰。但是，在運動期間，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有了更多的辯論和貢獻，它們往往兩極化，沒有做到人人滿意，但總體上有利於處在一些戰略事件熱潮中的建設，該戰略是：在初期階段，組織運動，把運動投射到社會，並成功地孤立制度革命黨政府而且顯示其真面目。

決定性的問題，如公眾對話和沈默示威，通過自身獨特的話語建構對運動的認同；關鍵時刻的運動反應，例如第四次總統報告的誹謗和威脅；9月18日自治國立大學的軍事佔領，和學生反對沒收國家理工學院大樓的戰鬥的緊張時刻，超過1500人被捕；政權對副校長巴羅斯·塞拉里昂的攻擊——所有這些涉及到的大辯論和大決定，顯示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凝聚力和集體能力。在城市中心區組織統一的示威還是在工業區組織大量的分散示威遊行，那種方式更好？對此有辯論，很明顯，結論來自於採取最有效的決定。公開對話的問題所暗示的同政府關係，不過是這樣的問題，即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未能及時決定採取談判的出路。

儘管組成的多樣性，或也許是因為它，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確立了自己作為運動無可爭議的領導者的地位，完全合法化為一個集體，它獨立於一些同志的實際份量，比如勞爾·阿爾瓦雷斯·加林或吉爾伯托·格瓦拉·涅夫拉[22]。有一些錯誤的產生，是由於放縱了一些發揮陰暗作用的相關者，比如蘇格拉

底·坎波斯·勒穆斯，他建議在左卡羅等待公開對話的時刻，促使了8月27日粉碎行動成功後再次鎮壓的來臨，也放縱了運動中的一些人，他們在10月2日之後成為政府的發聲筒。

最重要的是，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沒有能力感知9月13日後，隨著軍事調動和骯髒戰爭而來的政治局勢的變化。戰術退卻的可能性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但所有跡象都指向正在來臨的災難性結果。在政治學研究所，一所被視為最激進和甚至極端的學校，我們討論了它，甚至寫了分析文章，在文章中，我們設制了一個得勝運動的論點。被慣性所困，用火車作比喻，火車全速奔向懸崖，而此時沒有人能夠拉動傳輸線，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總結大會沒有考慮這一檔。在其他學校，他們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並且巴勃羅·岡薩雷斯·卡薩諾瓦還出版了他就這一題目的反思[23]。顯然，誰都不願承擔風險，向運動的普通成員建議，必須停止運動，因為運動已經取得了巨大和不可逆轉的政治和文化成果。全國罷課委員會（CNH），被視為20世紀下半葉墨西哥最重要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有作為的領導者，對於它，這是最後的考驗[24]。10月2日屠殺，伴隨著全國罷課委員會（CNH）主要領導人的逮捕，以及甚至在奧運會期間都沒有停止的迫害，使得運動的領導消失了，其結果是運動失去了主動力和洞察力。

墨西哥共產黨 PCM，成了政府的替罪羊，它在運動中沒有獲得重要作用，突然發現自己在全國罷課委員會（CNH）裏的支配權。在沒有任何全國罷課委員會（CNH）責任的一些浮誇學生的協助下，馬塞利諾·佩熱洛借助新聞界的批准，得力於他同政府人士的非官方關係，他堅持不通知全國罷課委員會（CNH）（征得其黨領導層的同意），自立為主要領導人。沒有考慮事件或尋找替代方案，從而有可能在這些新情況下為運動開一條出路，新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急急忙忙試圖結束罷課。後來，當學生決定在12月4日結束罷課時，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提交了一份“10月2日的國家宣言”，以一個不光彩的方式，只提到特拉德羅爾科夜晚的屠殺，作為一個政府“頑固”和“難以容忍”的問題而提出，卻不採取行動捍衛我們被囚禁的，遭受拷打和遭受最荒謬指控的同志們，甚至忘記迫害仍在繼續。1968年12月6日，當全國罷課委員會

(CNH) 決定解散時，它已經不存在了。

7. 冷戰的呼吸

學運開始於政府的一種挑釁行為，該挑釁行為最初似乎是一種預防性的鎮壓——冷戰期間的常事——目的是把一些麻煩的人物（共產黨人，批評者，持不同政見者）清除出去，以保證 19 屆奧運會的和平。7 月 26 日對墨西哥共產黨及其青年組織 JCM 成員的壓制，就是突出標誌，佔領他們的辦公室及其報紙「墨西哥之聲」的辦公室，而這個時候，學生和警察在城中心的第一次對峙甚至還沒有結束。立即啟動的新聞運動是該攻擊一部分。在 7 月 30 日星期二凌晨的軍隊干預之後，政府公務員（攝政者阿方索·科若那·德·羅薩爾，共和國總檢察長胡·桑切斯·瓦加斯和路易士·埃切維裏亞）譴責了“精心組織計畫的蠱惑和顛覆”。不管怎樣，清除的一點是，迪亞斯·歐達茲政府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衝突超出了他的控制，儘管有政治危機和事態發展的跡象，體制上層沒有人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

學運揭示了處於頂峰的社團主義總統體系的弱點，並在同一時間發現了自由；這表明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經歷政治活動，以一個民主，平等，不強迫人們服從的方式經歷政治活動。學生運動被軍事粉碎，以一個殘酷過分而無理的方式被粉碎。這是一個國家的犯罪，現在必須審判那些已經確定的負責者。它並未從政治上被粉碎。整個國家因特拉德羅爾科夜晚種族屠殺的可鄙性質而蒙羞。像獅子那樣臥藏，它跳躍，反抗，羞辱負責人，並釋放出不停產生變化和辦法的勢力。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長遠說來，1968 年的民眾學生運動以驚人的方式得勝了。

40 年後的今天，1968 年的遺產依然存在而且可敬自豪。

阿圖·安吉亞，自治城市大學（UAM，墨西哥城）的教授和研究員，革命工人黨（PRT，第四國際墨西哥分部）前領導人，在 1968 年是自治國立大學國家政治學學院的行動委員會的一個成員。

注釋

[1] 胡勒·雪熱爾·加西亞，卡洛斯·芒斯維，局

部戰爭。特拉德羅爾科 1968 年。一般馬塞利諾·加西亞·巴拉文件。事實和歷史，墨西哥城，阿吉拉爾新世紀，1999 年及擴展版：局部戰爭 II。68 年的工作，自治國立大學 / 阿吉拉爾新世紀，墨西哥城 2002 年。

[2] 勞爾·阿爾瓦雷斯·加林，特拉德羅爾科紀念碑。68 年學生運動的歷史重建，格裏曼爾博，墨西哥城 1998 年。這是論述 1968 年墨西哥的最佳著作，由其主要領導人撰寫。除了介紹運動紀事和反思外，它對 1968 年的軍事干預作了細緻的分析。

[3] 奇怪的是，它是晚間新聞小報，對五月事件，卻提供了最廣泛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報告件。

[4] 根據國防秘書長的說法，“一個步兵旅的三營步兵，外加一個營的傘兵”，也就是說，約 2500 名士兵，被派去增援未能成功控制學生的一萬名警察（勞爾·加東引用的，1968 年。希望的火焰，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墨西哥城 1968 年，第 34 頁）。

[5] 技術學生全國聯合會（FNET）是國家理工學院 IPN 和其他技術學校的一個學生社團組織，依附於掌權的制度革命黨（PRI）。

[6] 在左翼政黨（墨西哥共產黨，PCM，以及墨西哥工人和農民黨，POCM）指導下的運輸工會大罷工，激勵了一些金屬製造工，石油工和其他行業後來發生的工會鬥爭，並把這些鬥爭串聯起來。這些鬥爭最終挑戰了工團主義政權，並要求工會的獨立。1959 年 3 月 28 日，軍事鎮壓逮捕了大約 10000 工人，這些人上了政府的黑名單，因此無法獲得任何工作合同。最後，主要領導人，德梅·列霍和瓦楞亭·坎帕，被譴責犯有破壞社會罪，這項罪名發明於 20 世紀 40 年代的世界大戰期間。

[7] “Acarreo” 這個名稱，指的是強制動員人民支持政府的行動，由制度革命黨 PRI 的社團組織負責。

[8] 這個主題的論述見於我的書，卡登主義的國家和工黨政治（時代出版社，墨西哥城，1975 年）。雇主和農業大土地所有者也顯然是有組織的工團主義團體，但並沒有服從於制度革命黨也沒有因為他們同政府關係的特殊地位而受益。

[9] 請願書的六點要求是：

1. 政治犯的自由；
2. 解僱行為像警察局長的將軍；
3. 解散作為直接鎮壓工具的特種兵部隊，不能代之以一個類似的機構；
4. 廢除破壞社會罪，這條罪名是用作鎮壓的法律工具；

5. 賠償遭受警察和士兵侵略的受害者家屬；
6. 審判對破壞和鎮壓行為有責任的公務員。

[10] 8月中旬，在韋拉克魯斯州，瓜納華托州，米卻肯州，克雷塔羅州，伊達爾戈州，恰帕斯州，杜蘭戈州，塔毛利帕斯州，薩卡特卡斯州，聖路易波托西州，阿瓜斯卡達特爾州，索諾拉州，巴哈加利福尼亞州，納亞里特州，莫雷洛斯州，塔巴斯科州，瓦哈卡州，錫那羅亞州和布埃布拉州，眾多的示威發生在各個城市而且有 70 個機構在罷工（勞爾·加東，同前。第 42 頁）。

[11] “市民對話對工團主義控制的政權是一個真正的挑戰；對於政府來說，接受這樣的對話，等於承認另一種力量的存在，一個獨立不受管制的社會行動者，它要求徹底改變，而這種可能性已被拒絕”（阿爾瓦雷斯·加林，同前。第 183 號）。公眾對話的可能性損害封閉和反民主的政府系統的邏輯。正是這種需求最強烈地反對政府。

[12] 阿爾瓦雷斯·加林，紀念碑...，同前。頁 77。

[13] 參見，例如，上述著作中芒斯維的文章，局部戰爭...

[14] 例如，吉爾伯托·格瓦拉·涅夫拉的憤怒（例如，見注 17）和勞爾·阿爾瓦雷斯·加林的較平靜觀察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15] 在有關墨西哥 1968 年的書籍資料中，這個問題很少涉及。我們可以在何色·雷裏·裏瓦斯·翁蒂韋羅斯的書中找到一些內容，如：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的左派學生。組織、運動和領導人（1958 至 1972 年），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 Porrúa，墨西哥城 2007 年，624-625 頁。

[16] 恩裏克·德·拉·加爾薩，萊昂·湯瑪斯·艾吉阿，路易士·費爾南多·馬西亞斯，另一種學運，報導，墨西哥城 1986 年，第一章。

[17] 這令人吃驚地看到，吉爾伯托·格瓦拉·涅夫拉如何嘲笑和憤怒譴責那些他所謂的“自治國立大學人文系的激進學生”，他不承認他們有絲毫的貢獻，他指責他們是運動的一個障礙，並且在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各代表團中間“播下仇恨和災難”。他還誇大“極左”組織的影響，如斯巴達克斯共產主義者同盟，而這些影響幾乎沒有從事件中生還的。自然，對那些在各種場合提出不同於他的意見和建議的人，他的整本書流露出鄙視和仇恨。他甚至抄錄新聞界和政府所使用的許多話語，這些話語同 CNH 內和學生中間的各分支有關，而正是學生貢獻鍛造了運動（自由永遠不會被忘記，68 年備忘錄，加州及競技場

版，墨西哥城，2004 年）。

[18] “1968 年的一大優點是斷言，政治是必要的和可尊敬的事物”，它可能以“不同於制度革命黨的程式”，而且“作為同政權對抗的政治”進行。（阿爾瓦雷斯，紀念碑...，同前。第 147 頁。）

[19] 這項運動後 POCM 失蹤，而 PCM，儘管它有經常性的危機，自 1919 年以來已經存在並且仍然是最強的左翼組織。

[20] 社會主義人民黨體現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潮流，該潮流由維森特·隆巴多·托勒達諾具體化，維森特·隆巴多·托勒達諾，一個自封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在 20 世紀 30 年代的工團主義政權形成中發揮了根本作用，對拉薩羅·卡德納斯，是不可或缺的。作為同墨西哥革命政權的次級“同盟”，和階級合作的推手，他為墨西哥著名的“頭腦糊塗的黨派”，制度化的虛假反對派，揭開了序幕。直到他反對的 1968 年運動後，他去世為止，他在墨西哥是一個關鍵的政治人物。前總統拉薩羅·卡德納斯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潮流，儘管它徘徊在左翼，在現實中不可避免地受制於它幫助建立的政權體系。面對帝國主義對古巴革命的威脅，卡德納斯促進動員民族解放運動，這是一種廣泛的戰線，它引起了許多人的希望，但事實上卻失望了，因為卡德納斯支持的總統候選人古斯塔沃·迪亞斯·奧達茲，在 1964 年接管了政府。

[21] 古巴革命和美國入侵古巴，越南戰爭，美國入侵多明尼加共和國，黑人叛亂和黑豹運動，第三世界反對殖民主義的起義，印尼流血清洗，六日戰爭和巴勒斯坦革命，切·格瓦拉的象徵，等等。

[22] 事實上，聯盟的這些同志，在其方向上保持批判的態度的同時，曾是 PCM 青年組織的激進分子，組成了非常廣泛的學校代表集團，學校特別地按統一的方式分組為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的理工學院和技術部門。

[23] 公報發表的“決策的風險”。全國罷工通訊，第 7 期，1968 年 9 月 13 號，吉爾伯托·格瓦拉·涅夫拉轉載‘自由’雜誌...，同前。261-268 頁。所說的文章，9 月 18 日之前我寫了一點，該文以政治學行動委員會卡爾·馬克思團隊的署名散發。

[24] 見勞爾·阿爾瓦雷斯（同前。第 179-180 頁）和吉爾伯托·格瓦拉（同前。第 267 頁）的意見，他們發言讚揚岡薩雷斯·卡薩諾瓦的反思後，自問關於複課的想法：“在一個像理事會騷亂情形的那種集會中，在所有的學生媒體前面，處理這種類型的反應，這怎麼可能？”

曾猛其人(下)

石隆

以下(一)、(二)的事說明他除刻印秘寫文件外，還在周恩來手下參與機密工作。

一

曾猛瞭解當時溫州地下活動的情況，這是因為溫州各縣的縣委，大多數都是他在“五卅運動”中結成過戰鬥友誼的至交，如王屏周、林平海（王是永嘉縣委書記），平陽縣委書記遊俠（公任）及屏周的前任書記鄭馨…等。1928年6——7月間遊俠所領導平陽奪城起義失敗後，到上海。一直和曾猛有來往，隨時把溫州地區的鬥爭情況告知他。

約在1929年夏，中共中央為對溫州地區的土地革命及武裝鬥爭作新部署，特召鄭馨（這時鄭已是中共浙江省委成員）、王國楨及雷高聲（即施德彰）到上海。我從鄭馨口裏知道，他們在上海的住宿、開會、聯絡都是“阿猛參與安排的”。而且王、雷因意見相左有矛盾。雙方都是曾猛的朋友，所以“阿猛從中調解”。

二

王屏周是在1928年3月間和林平海一起，受中共省委指派回溫州的。8月間擔任永嘉縣委書記。同年12月15日清晨在永寧巷底家裏被捕。溫州駐備司令甘清池即派兵將王押解杭州。當時是乘輪船去的。按該輪航線中途，原都是在海門停靠，因此，溫州中共組織聞知消息後，策劃在海門劫救屏周。但甘清池因王是“要犯”，命令輪船直放上海。劫救計畫落空。屏周在船上對押解官兵做工作，要求船到十六鋪時，允許他打電話給朋友，押解的軍官同意。船到埠時，他打電話給商務印書館西書部職員李景芳（李是王和曾猛的朋友）。屏周知道李平時和曾猛有聯繫，希望通過李通知曾猛。李接電話，立即趕到十六鋪，在附近的飯館請屏周及押解的官，共進餐。屏周在席間無法明言，只能暗示。但李糊塗，沒有立即通知曾猛，只送了一些錢給押解的官。只要他們在途中照顧屏周，到第二天才把這事告訴曾猛。曾猛聽了禁不住拍桌子大

罵李糊塗，誤了大事。曾猛後來對我說：“中央知道了海門劫救計畫落空後，周恩來指示他無論如何要設法在上海營救，李的糊塗使中央的營救也落了空。他還說李雖是我的好友，但畢竟是黨外人，我不能向他洩露秘密，只能委託他，如有押解屏周的船隻到上海的消息，立即通知。而李只知道盡友情，一接電話，只知急於見屏周，不馬上通知我。如果當時李能穩住押解官兵，立即打電話通知我，也還來得及營救。但他到第二天才通知我，李還怨我不明言…曾猛告訴我這件事時，還越說越生氣，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沒有完成周恩來交給他的任務。

屏周押解到杭州後，關在陸軍監獄。經王祥齡的疏通，監獄醫官，放屏周出牢房，給犯人治病。屏周利用到各治病的有利條件，在政治犯之間進行聯絡。察看獄內防衛情況及地形，為越獄作準備。

1930年8月間的一天，我在上海《新聞報》看到浙江陸軍監獄槍決越獄犯人的消息。當時，曾猛拿報紙趕來說：“屏周犧牲了。”他要屏周的朋友立即設法派一個人去杭州領取遺物，辦理安葬。曾猛對我說：“屏周在廣州時就已受到周恩來的器重。”

1929年8月3日李立三在《紅旗》上發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和中國機會主義大綱》。李立三不但完全執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示，而且在蘇聯黨爭問題也完全擁護斯大林。

1930年秋，莫斯科送來在中山大學參加反對派的中國留學生名單。其中有曾猛，為什麼到1930年才發現曾猛是托派？這是因為他在中山大學參加反對派時用的是假名：“徐慧英”。周恩來知道曾猛是反對派後，曾跟曾猛談話，告誡他必須承認錯誤，脫離托派，把問題交代清楚，黨可以從寬處理，否則，後果是不言而明的。（這是曾猛告訴我的話的大意）。但曾猛堅持不肯認錯，說他是為了中國革命的前途參加反對派的。並且反對李立三執行斯大林的盲動主義路線，說這條路線使黨的力量受到本來可以避免的摧殘和損失等。那次談話後不久，他就被開除出黨，遷出機關，

生活陷於困境。

（附記：這二節題為《中共中央秘書處幹事》。但周恩來曾負責組織部，曾猛從莫斯科回國後參加的工作機關可能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因此，曾猛也可能是組織部幹事。此外，王文元（凡西）在他的《雙山回憶錄》中說自己是組織部幹事，而曾猛在加入反對派前就已認識王文元。總之，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找到材料，證明他有否擔任過以及什麼時間擔任過組織部幹事，對此，只能存疑，待後證實。）

四、在莫斯科中山大學

1927年“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派一批幹部去莫斯科學習。在那批留蘇的中共黨員中，曾猛是其中的一員。溫州籍的還有戴賓（英若，是立夫先生的女兒）何止爭，胡識因（她的十歲兒子育才，因為是烈士鄭側塵的遺孤，也由她帶往莫斯科。）等等。據國民黨最高法院庭審記錄，曾猛自供是“一九二七處十月被派去莫斯科的，”“同行有二十余人。”

據汪原放的回憶，陳獨秀是在同年9月10日由汪陪同化裝從武漢秘密回上海。曾猛去蘇聯的時間，估計當在陳回上海以後。曾猛說他只帶了一條鴨絨被動身，足見天氣已涼。他是經海參威，乘西伯利亞鐵道的長途列車到莫斯科的。

他進中山大學學習時，斯大林已派米夫到中山大學，米夫的任務是清除前校長拉迭克在中大傳播的托派思想。

中共中央派去莫斯科學習的幹部，絕大部分都帶著中國革命為什麼失敗這樣一個問題去的。在拉狄克任中大校長時，他們談到反對派，特別是托洛茨基有關中國革命的主張及第三國際爭論中國革命問題的檔，不少中大的學生認為托洛茨基的主張是對的，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是第三國際，也即斯大林的錯誤指導造成的。曾猛在中大學習時，校內已有反對派組織。他通過校中的反對派同學，也讀到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他當時認為已找到中國革命問題的鑰匙，不久他加入校內的反對派組織。

當時，米夫雖然是中山大學的當權派，但校內的陳紹禹（即王明）為首的所謂“布爾什維克”為一方，以接受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觀點的同學為另

一方，爭論非常激烈。曾猛在爭論中，除理論鬥爭外，他還揭露王明從國內帶出來的新制大衣上的緞裏子剪下送給米夫作禮品（因為俄國人有用中國綢緞作壁飾的愛好）。

這裏應當說明：據曾猛說，當時的情況和後來的情况不一樣，托洛茨基還沒有被徹底打倒，中共領導在蘇共黨內鬥爭問題上還沒有公開站在斯大林一邊，因此，當時中共旅莫支部書記王若飛對中山大學裏兩派中國同學的鬥爭，沒有偏袒王明一派。王若飛對王文元和曾猛在校內的活動，沒有加以干涉。他們都曾在王若飛領導下工作而且得到過他的器重。

溫州籍的留蘇同學逢星期天都到附近樹林中聚會。有一次聚會，曾猛和胡識因的談話，可以說明曾猛當時的思想和態度。胡識因不同意反對派的意見，但她也不是王明派，她跟曾猛的私人感情不錯，平時無所不談。她勸曾猛不要參加反對派（她不知道曾猛已經秘密加入反對派），不要反對陳紹禹等“布爾什維克”，並且責備曾猛不去聽黨課，而躲在寢室裏看《紅樓夢》曾猛則反唇相譏說：“斯大林的錯誤害得中國革命還不夠嗎？如果不執行斯大林的指示，早作防備，我們數不清的同志會人頭落地嗎？你的丈夫會犧牲嗎？如果聽斯大林的話，會有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的勝利嗎？陳紹禹會把新大衣的緞子剪下來作禮品，奉承米夫，這是為中國革命戰爭嗎？米夫會接受這樣的禮物，是關心中國革命，還是關心他房間裏的裝飾？…”據曾猛說，當時胡識因趕緊用溫州家鄉話說：“童子癆！童子癆！”（意即短命鬼），暗示曾猛不要再說下去了，謹防“隔牆有耳”。

五、《我們的話》派

曾猛在莫斯科的時間只有一年多，（據國民黨最高法院的庭審記錄：曾猛自供是“一九二九年一月回上海。”）即由中共中央提前調回國，他一方面仍在中共中央幹秘密技術工作，另一方面是中國托派之一的《我們的話》派的重要成員。為什麼定名為《我們的話》？因為他們的機關刊物名《我們的話》。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托洛茨基流亡歐洲期間，辦過名為《我們的話》的刊物。

《我們的話》派領導機關稱“幹事會”。就我所

知，當時的幹事有陳亦謀、歐方、史唐（施雲）、梁幹喬、張特、曾猛等。

《我們的話》派很窮，平時的活動經費都無著落，靠賣譯稿接濟，例如把英文小說《七重天》拆開，分由該派分子翻譯。

曾猛動腦筋，企圖為《我們的話》派籌集比較可靠的經費來源。王屏周在溫州被捕，王的好友韓敏家二，是王隱蔽活動的一個地方，因此韓在王被捕的當夜逃離溫州到上海。曾猛撮合韓敏、李景芳及其它好友出資，在上海東寶興路開設江東書店。以銷售大學用的英文教科書為主，同時兼售新文藝社會科學書籍。《我們的話》派幹事會成員同福州路上的新文藝及社會科學著作的出版社都有關係，不需要先付書款，代為經銷。原文教科書則由李景芳向商務印書館西書部記帳供應。曾猛的目的是希望江東書店有盈利，可以資助《我們的話》派。他自己被中共中央開除後，生活無著落，就是靠江東書店，才有棲身之所，為了安頓他的生活，江東書店在福州路的一條弄堂裏租了一間房間作為書店業務的聯絡處，曾猛就住在聯絡處，同時也成為《我們的話》派幹事會的活動地點。

何止爭到1937年才從蘇聯回國，他完全因曾猛的影響，加入《我們的話》派，他住在江東書店翻譯高爾基的《母親》。《小小十年》的作者葉永蓁是江東書店內常客。他看到譯稿後，即自告奮勇說：“我去要求郁達夫介紹出版。”想不到馬到成功，第二天就送來郁達夫給中華書局總編輯舒新城的信，囑何止爭立即送譯稿去，可以當場領取稿費。何止爭譯《母親》一書的署名是“何妨”。

《我們的話》派和國外通信的地點之一是曾猛設置的。他在“五、四”運動中結識的好友李鍾英，當時是上海四川路橋邊德商禮和洋行營業部高級職員。他要李幫忙，李每月花點錢給營業部的練習生，囑咐她收到給xx信件及書報都交給李，而後每次由曾猛到李處去取。這個通信聯絡點，從未出過差錯，何止爭譯的《母親》俄文原書也是寄到禮和洋行的。

據曾猛說，劉仁靜原是《我們的話》派的創始人，劉去過土耳其普林基普島，見過托洛茨基，在托面前自誇回國後，一定能發展反對派運動。但托知道這一

運動的發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托認為劉過於自負。劉在《我們的話》派為時不久，就離去另搞了一個派別《十月社》。不久，又搞了個《明天》。又不久，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進江蘇反省院，還當了反省人的所謂“自治會”的主席。

《我們的話》派要求其成員到工人中去，代表絕大部分基層分子都去做工，象何止爭去當修理下水道工人。但他們在上海工人群眾中沒有打開局面，只有歐方在香港太古船塢領導過反對英帝國主義的鬥爭。因為歐方原是省港罷工鬥爭中的骨幹，有群眾基礎。

《我們的話》派鬥爭幹事會成員都上馬路散發傳單，象史唐就因散發傳單被當時的公共租界巡捕房捉住，因為他當時的職業是印刷工人，被捕時沒有暴露真實身份。所以只在提籃橋監獄關了半年。歐方和陳亦謀也是先後在群眾中活動被捕，死在牢裏的。

《我們的話》派存在不過幾年，在那幾年中，他們忙的是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及中國四個托派之間的爭論，當然也出版過幾本書。如劉仁靜譯的《托洛茨基自傳》。劉用的筆名是劉鏡園，神州國光社出版；陳亦謀等幾個人譯編的《蘇聯黨爭文獻》，新生命書店出版。

陳獨秀派的尹寬最早從《我們的話》派中看到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文章，然後交給陳獨秀、彭述之。陳獨秀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論點。

1931年春，在托洛茨基極力促成下，中國的四個托派：無產者社、我們的話、十月社、及戰鬥社協商統一。同年5月1日，中國托派大會在上海召開，陳獨秀當選為總書記。《我們的話》派中，只有陳逸謀當選。該派的梁幹喬在統一大會不久，投奔他的黃埔軍校老同學胡宗南；張特則去廣西投奔桂系。

1930秋，曾猛所賴以生活的江東書店，因生意清淡，只好關門大吉。曾猛的生活陷入絕境。他同何止爭商量：在上海即無法謀生，只好冒險回溫州避居偏僻的鄉間。統一大會後，有一天，他在馬路上遇見彭述之的妻子陳碧蘭。她問起他的近況，他說在上海已無法生活。明知回溫州有被捕的危險，也只能回去。她制止他回溫州，囑咐他等候她的回音。她當即轉告

陳獨秀，陳沒有忘記曾猛的秘密技術工作，當場決定留住曾猛，住機關，負責秘密技術工作。他因而同何止爭一起住進機關，當時出版的《火花》、《校內生活》以及秘密檔都是他幹的。

1932年10月15日，因托派叛徒告密，陳獨秀、彭述之、曾猛、何止爭被捕。第二天由公共租界引渡到上海警察局。19日國民黨中央命令上海市政府將陳等全案人犯押解南京，26日由軍法處轉移到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關押。

曾猛被捕後，秋君到南京去找戴立夫先生。要求設法營救。當時立夫先生任國民黨立法委員，和張沖住同一幢房子。張住樓下，他老人家住樓上。秋君在立夫先生家住了八個月，立夫先生最後不得不托張沖。但張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後必須在“留俄同學會”過一段時間。曾猛從獄中出來，住留俄同學會招待所。幾個月後，他才和秋君回溫州。

六、發瘋之謎

曾猛返溫，住在麻行僧老家。父親和他的關係雖有所改善，但靠父親吃飯，總不是辦法。從南京回來時，張沖交給他陳立夫寫的一封“八行書”，說憑這封信，可以到任何文職機關求職。爲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確實需要有一個職業。但他明白，憑這封“八行書”求得一個職位，等於承認自己是陳立夫的手下，他不願幹。他一直都沒有利用過這封“八行書”。

史唐從廣西南寧來信，告訴他在師範學院教書，並且要他也去那裏。說教書，他很願意，但考慮到這是投奔桂系的張特出的主意，決定回絕。

1936年夏，我到上海去。曾猛托我帶一封信給立夫先生。當時戴家往霞飛路（即現淮海路霞飛坊），立夫先生的房間在三樓。我進去一看，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一張單人床，兩張小沙發椅和一隻茶几，一張靠牆角斜擺著寫字臺，臺上放一部日文的《資本論》，寫字臺前入一籐椅，室內別無裝飾。立夫先生看了曾猛的信，就說：“我不寫回信，你回去告訴阿治，餘漢謀是我的學生，我可以介紹阿治到那裏求職。諒必餘也會答應。但餘是反共的。即使安排阿治去教書，也一定有條件的，所以阿治要仔細考慮。”我回溫州把這些話轉告曾猛，他聽了感動地說：“真是君子愛

人以德。”他接受了立夫先生的告誡，打消了在餘處謀職的念頭。

這時曾猛認識了陳又東、余嘉、王濟通等幾個青年。他在老家的客廳裏給他們講蘇聯拉皮多斯著的《政治經濟學》及用王純一筆名譯的《西洋史要》。這兩本書原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講義，由反對派帶回中國出版的。

曾猛住在老家，覺得終非久計，他同秋君商定，要她回娘家取些錢。由老家的幫工阿潘在蓮花心山上找塊朝南的地，搭三間茅頂的屋。在本文第一節中說過阿潘在王屏周的領導下，和蓮花心農民一起響應過縣委奪城起義的號召。曾猛認爲那裏的群眾關係好，可以久居。從此，蓮花心山上的茅屋就成了他向那些青年傳播托派思想的地方。

1937年初，曾猛接到張沖從南京發來的電報，要他立即到南京去有事待商，他無法拒絕。他說：“淮南的電召，無法拒絕，必須隨傳隨到。”他沒有路費，要我向親戚借一百元，即充路費，又留作家用。並且要我跟他同去，因爲我的哥哥當時在南京德士古大煤油公司當職員。我父親也在那裏，而且我還沒有見過新婚的嫂子，我同意了。

我們到南京後，第一天，他要我同去付後崗三號張沖住處。但沒有見到張，只見到杜桐蓀。我記得杜在客廳裏對曾猛說：“淮南這次非常高興和你合作。”至於“合作”什麼，杜沒有說。我們從付後崗三號出來後，我問他“張沖究竟要你幹什麼？”他沒有回答。以後他每來我哥哥處，只討酒喝，說自己晚上失眠，又說已寫信要秋君出來，要我陪他去找房子。又過了幾天，他對我說：“神經太緊張，要到無錫陳素農處玩幾天。”陳當時是無錫警備司令。曾猛還從無錫來信，告訴我陳素農如何用他的包車（黃包車）到車站迎接。陳自己則乘自行車跟在後面等等。以後就沒有音信，快到這年的七月時，突接到秋君來信說，他因發瘋在上海醫治。

爲什麼會發瘋？有人因爲他的瘋病好得快，認爲他爲擺脫張沖，不得不裝瘋。但不少人，包括他的家屬都說他是真發瘋。我也認爲發瘋是真的，因爲他事前有過連續的神經緊張和嚴重失眠。發瘋畢竟是有原

因的，從本節上面記述的事實，可以證明。一、他不願眼看張沖跟國民黨其他派走，否則，他不會發瘋；二、他仍堅持托派觀點，否則，他也不會發瘋。我幾年後才知道，張沖要他去南京市，所謂“合作”，原來是要他去西安到張沖新成立的一個辦事處工作。那個辦事處是代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協商聯合抗日的聯絡機構。張沖要他去，可能是因為他曾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過。他當時得知“合作”的內容後，就神經緊張，連夜失眠。因為他沒有忘記當年周告誡他時，他振振有詞說過“為中國革命前途”的話，如果去西安，見到周，不要說周的嚴詞譴責，就是含笑問問：“為中國革命的前途，怎麼跑到國民黨機關裏去了？”他就會無地自容。而且，儘管當年他拒不接受周的告誡，被中央開除。但由於在周的領導下工作，受過周的教導，周在他心上的精神威懾，一直沒有消失。他既不敢見周，又不能公然拒絕張沖的“合作”，思想上沒有出路，所以神經緊張，嚴重失眠，才促成他的發瘋。

七、溫州托派組織

盧溝橋事變引發了全面抗日戰爭。曾猛認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應當積極抗日。當時，陳獨秀（八月間）在武漢，托洛茨基在國際上都主張抗日。彭述之從南京監獄出來後，到上海領導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托派）臨時委員會。寫了《抗戰勝利的必須條件》小冊子，在上海亞東書局出版。

在溫州一方面，曾猛影響了身邊的一些青年。另一方面，在上海參加過《我們的話》派的何樹芬、朱鈴及受王獨清影響的李國棟也影響了一些人。雙方都要成立托派組織，但彼此沒有溝通。恰在這時，一個《我們的話》派分子賀希，從國民黨反動派的牢裏放出來。因為身體很弱，加以生活無著落。上海的老朋友要他到溫州來找何樹芬和朱鈴。賀到溫州後，由李國棟和朱鈴出錢租房子。供給他生活費用。並托當時同受兩方面影響的錢川給賀打針服藥，進行護理。

於是，賀撮合雙方合併成立溫州托派組織，他的領導機關也稱幹事會。第一選屆幹事有曾猛（書記）、何樹芬（宣傳）、朱鈴（組織）、何止爭及李國棟。

溫州托派組織成立後，賀希身體已經有所恢復。

曾猛提出應向在上海的“臨時委員會”報告，要求承認。幹事會決定委託賀去上海報告。

曾猛提出經幹事會通過：為了抗日，必須同中國共產黨聯合行動。決定派李蔡志代表“溫托”和中共浙南縱隊駐城內辦事處主任吳育商談。李和吳是歐海公學同學，又是同鄉，原有私人感情。但李向吳正式提出聯合抗日的建議時，吳斷然拒絕。李問吳：中共和國民黨合作，為什麼不能和托派聯合？吳回答說：

“托洛茨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敵人，是法西斯的奸細，陳獨秀是漢奸。”

中共領導的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在抗戰開始時成立，同時，永嘉國民黨縣黨部成立救國禦侮團。“溫托”幹事會認為：儘管吳育拒絕“溫托”的建議，但托派應參加戰青團。因為它是真正抗日的群眾組織，決不能加入禦侮團。曾猛提議經幹事會通過。“溫托”成員（除二三人外）及受影響的週邊分子全部加入戰青團。

賀希從上海回來，帶來“臨委”承認溫州托派組織為支部的信件。但“臨委”同時交給賀希一個任務：教育溫州的青年托派分子不要信賴曾猛。於是賀在錢川家中分別跟每個他要教育的對象進行談話。賀的這一活動，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引起每個教育物件對“臨委”的不滿。因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受曾猛影響參加托派的。曾猛當然立即知道賀的背後活動，但裝作不知，只是領導青年托派分子積極進行群眾運動。他用實際行動使青年托派分子更加信任他，使賀希在青年托派分子中陷於孤立。

“溫托”組織成立後不久，青年托派分子提出李國棟的跨黨問題。因為李當時還是國民黨縣黨部的監察委員。他們認為李由國民黨的監察委員成為托派是一進步。但既當選為托派幹事會的幹事，應該退出國民黨。何樹芬和朱鈴認為：如果李退出國民黨，縣黨支部勢必追究原因。就有暴露阿棟托派身份的危險。目前還是要阿棟辭去監察委員，另找工作，脫離縣黨部。曾猛同意這一措施，並由他說服青年托派分子。當時溫州成立蛋類運銷處，李設法謀得該處駐辦處處的職位，於是李辭去監察委員，這個所謂“跨黨”問題，就這樣解決，幹事會決定李在上海代表“溫托”

組織和“臨委”就近聯絡。

1938年下半年，國民黨反動派步步加緊要解散戰青團，與此同時，從武漢開始大規模的反托運動，說陳獨秀、彭述之是領取日寇津貼的漢奸。溫州城內街頭也出現反托海報。生活書店書攤上擺滿反托書刊。

“溫托”組織自己沒有刊物，只能用油印方式編發“臨委”機關報《鬥爭報》上的文章，但這不能公開散發。曾猛指示中華書局職員托派分子王濟通聯絡店裏的師兄弟把亞東書局出版的陳獨秀、彭述之、高語罕、李季等的著作擺在顯著的臺子上，任讀者翻閱。其中還有意因譯的紀德著的《從蘇聯歸來》、《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以及王凡西譯托洛茨基悼念兒子西道夫的小冊子《兒子、朋友、戰士》（西道夫是在法國被格別烏謀殺的），杜威委員會對莫斯科審判案的調查報告（五十年後，蘇聯才為莫斯科審判案平反。）同時，曾猛還指示陳獨秀在戰青團的刊物上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受到戰青團中中共黨員的圍攻。

戰青團江北五區寶台支部因為是托派朱鈴、潘泰運及吳昭松領導，戰青團總團下令解散整頓。但支部解散後還沒有整頓好，總團終於被國民黨反動派“勒令取締”。

1939年春節，“溫托”在蓮花心曾猛的茅屋裏召開第二屆代表大會。為了防備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曾猛佈置兩個托派分子在蓮花心山頂上的小廟前瞭望。如發現山下大路上有可疑的動靜，立即放鞭炮示警，以便及時疏散。代表會上曾猛當選為主席，率領全體代表首先為抗日陣亡戰士及犧牲的托派分子默哀。李國棟受上海“臨委”委託傳達“臨委”指示，那次代表會選出第二屆幹事會。選舉前，曾猛指出“溫托”當時已有工人支部，新的幹事會中，應該有工人的席位，才能表明是工人的政黨。因此，選舉結果，第二屆幹事會中有針織業工會理事長葉學廉，而且葉還是代表會主席團成員。新選的幹事會共七人：曾猛（書記兼組織）、陳又東（宣傳）、李國棟（溫托駐滬代表）、何止爭、王國龍、錢川、葉學廉。那次代表會還決定成立工人運動委員會，其成員為：曾猛、葉學廉、陳又東、王國龍、錢川五人。

那次代表會決定籌備溫州救亡大同盟，把原來參加戰青團的托派週邊分子作為基礎，分別先成立工人、學生、店員、小學教師、農民等“同盟”支部，待“同盟”發展到可以召開代表大會時，產生救亡大同盟自身的領導機關。

1939年5月間，“溫托”幹事會派我去上海向“臨委”報告工作。臨行，曾猛托我探聽彭述之對他在南京出獄時的態度。我見彭時，按曾猛的囑託問彭，彭說：“我們既被捕，只有利用他們的法庭作為我們宣傳的講壇。我們在獄裏，只能進行鬥爭，包括當時正進行的絕食鬥爭，決不能去想什麼出獄問題。國民黨放你，總是有條件的。他說沒有條件，但我不信，我怎能批准有條件的出獄？當然，他在溫州影響了你們，並且成立了組織。對此，我們已表示肯定，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警告：不能無條件信賴他，而應督促他，使他不致重蹈覆轍。因為鬥爭還很艱巨，國民黨反動派不會放過我們。”（這些話是我今天還記得的大意。）我回到溫州後，把彭的話，如實轉告。曾猛聽了知道彭不原諒他，他以前對彭一向很敬重，但從此他對彭的評價變了，甚至罵起來了。

八、溫州針織業工會

溫州針織業工會在1925—27年大革命是一個很活躍的工會。大革命失敗，落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黃色工會手裏以後，工會只知收會費，毫不顧工人利益。工人極為不滿，抗戰軍興，溫州成為東南沿海唯一的轉運口岸。針織業突然興旺起來，針織女工人數激增。正在這時，原在上海做工的針織機修理工葉學廉、葉樹芳等回到溫州。他們在上海有過鬥爭經歷，眼看工會腐敗，女工受盡剝削和壓迫，而工會卻充當資方的幫兇。因此，他們就想重整工會。在民眾教育館主辦的時事形勢報告會上，他們遇上了陳又東（陳是該館的圖書館館員。）王國龍和錢川。他們要我們幫助他重整工會。我們當時都沒有職工運動的經驗。於是曾猛親自出馬。他掌握了當時溫州針織業興旺的有利時機，他要葉等動員女工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那次爭取增加工資的鬥爭取得勝利，使女工信任葉等。她們都說工人如由葉等領導就好了。曾猛因而要葉等推動各廠女工要求工會改選，否則，不繳會費。這時，曾

猛要我們幫助葉等在女工中成立救亡大同盟工人支部，以此為核心去組織各廠女工進行改選工會的活動；並派錢川和葉等生活在一起，為他（她）們辦理改選工會的準備事項，為工人護理小病。不久，工會終於改選，擇定曾宅花園的一個小樓作為會址。葉學廉等幾個救亡大同盟工人支部的成員都當選為工會理事，葉學廉為理事長，工會正式聘錢川為工會文書，陳辦會務外，加緊組織女工，辦文化班，講抗戰形勢，組織女工分批接受軍訓和救護技術的培訓等等。

工會改選中，曾猛看到葉學廉等三人公正無私、能團結工友、肯吃苦、有活動能力，就向幹事會提出吸收他們入黨，並由他們三人成立工人支部。

工會改選後，向資方提出改善女工工作條件的要求，針織業資方害怕大革命時期那樣的針織業會重新出現。他們要求國民黨縣黨部取締針織業工會，並決定對策：關廠開店，從上海運進成品，解雇工人，企圖借此從根本上扼殺工會。工會經過調查，得知資方運進的成品都是日商出產的。曾猛對葉等說：“這正是結合抗日和保護工人利益鬥爭的典型例子。”他問葉等：“運進的成品並無日本牌號，你們用什麼辦法證明是敵貨？”他們說：“我們有辦法。”

於是，針織業工會要求縣抗敵後援會召開各界聯席會議秉公處理針織業資方解雇工人，販賣敵貨事件。葉等在會上當場對資方運來的敵貨和國產成品進行拉力及染料作對比試驗。試驗的結果證明資方運進的襪子是敵貨。葉等還提出證據說明資方運進的襪子上貼的廠家招牌，不是上海無此廠家，就是早已關門的廠家。與會的各界代表都認為葉等的證明很有說服力。葉等向各界代表呼籲說：“資方此舉，不但陷三千多工人生計於絕境；而且販運敵貨，替敵寇為虎作倀，是奸商行徑。”各界代表會議決定查封敵貨，並要資方繼續開工，不得解雇工人。這一鬥爭的勝利，不但針織業女工更加信賴工會的理事會，而且其他工會出紛紛要求進行整頓。

國民黨縣黨部出於階級本能，決定摧殘針織業工會，拘捕葉學廉，關在警察局看守所裏，進行威脅利誘。女工們憤不可遏，除到看守所探望外，還到縣黨部質問書記長吳子屏。翌日，《浙甌日報》發表吳的

談話，說針織業工人工潮受少數陰謀分子操縱，必須取締。這使女工和縣黨部的矛盾更加激化，以致一群女工未經理事會同意，擁進縣黨部搗毀辦公室，曾猛知道後，馬上到工會的理事會去，指出不可這樣蠻幹，他建議理事會召集全體三千名女工到防守司令部請願，並請求其他工會支持。

當夜，曾猛去見防守司令參謀長陳適。陳是平陽人，是他與當年在廣州時的朋友。他向陳說明針織業工會鬥爭的實際情況，指出縣黨部無視女工們為本身生計及抗日救亡的合理要求，而為奸商張目，拘捕工會理事長葉學廉，這樣倒行逆施，能坐視無睹嗎？第二天，針織業女工（包括男工）由工會理事們領頭，列隊到防守司令部（即現在的市委所在地）門前請願，三千多女工加上其他工會支持的工人隊伍，西起道前橋東至舊縣府（即現在的人民廣場）門口，站滿了人，當時街道狹窄，因此擠得水泄不通，陳適出來站在桌子上，向請願工人講話，表示防守司令部一定秉公處理，女工們要求立即釋放她們的理事長。陳說：釋放要同縣黨部商量後處理，工友們如不放心，我派人請葉理事長來同大家見面，讓他親自跟大家講話。陳當場寫條子派一副官到看守所提葉。葉到場時，陳請葉登上桌子，葉情緒激昂，話簡單明瞭，而又堅決：“我們的要求合理，我們要抗日。大家在理事會領導下繼續鬥爭，不勝利不停止，即使不放我，我關在裏面也很高興。”陳當時對葉的表現非常欽佩。但無權當場放葉，過幾天，敵機對城區濫肆轟炸，陳乘機著令釋放葉學廉。

九、在軍法處看守所

“溫托”組織既成了國民黨縣黨部的眼中釘，1937年7月間，他們終於動手了。曾猛、王國龍、陳又東、謝循歡、董國榮相繼被捕，逮捕的機關是舊浙江省第八區專員公署。何止爭，錢川逃走，李國棟險些被捕。因為他機警，連夜從旱路逃往上海，我不知道曾猛被捕時待遇如何。我一被捕就被釘上死鐐。那天

古曆七月十五日，即俗稱“鬼節”的深夜，突然提我上來，才看到曾猛，他可能事先已得到我通知，所以他身邊帶有一個包袱，我身上只穿一件汗背心 and 短褲，拖一雙破鞋，我們兩人共戴一副手銬。由一個

軍官和六個荷槍士兵押送到西門外的碼頭。上了舢舨船，押解的軍官才告訴我們要解往省保安司令部。當時該部設在金華。到金華之後又把我們押送到該部設在郊區羅店的看守所。

這時有一批汽車司機，因為不服當地機關的敲詐勒索，也被關在該看守所裏，羅店看守所是臨時設立的，監房不多，所以把我們兩人也關在司機們關的大籠子裏，那些司機都愛國，關心時局，痛恨國民黨的腐敗。他們問我們對時局的看法，曾猛第一夜對他們講的話就吸引了他們。於是他們要求他每天給他們講形勢，講抗日的勝利條件，講工人的責任。他講了國民黨說要抗戰，卻實行法西斯統治；國共雖合作，卻秘密逮捕共產黨的基層幹部。講我們主張並且積極投身抗戰，主張抗日必須依靠工農兵，維護他們的利益，因此，把我們關起來，還釘上死鐐等等。我們同司機們一起共過了半個多月，曾猛還對他們講《共產黨宣言》的內容，講十月革命的意義和蘇聯黨爭等。後來司機們在外邊的朋友向國民黨行了賄，才得到釋放，他們臨行時把他們在金華的住址留給我們。說：如果放出來，希望能出去看他們。

我們後來又調了一個看守所，那裏防備嚴密。在那裏關押了兩個多月，一直沒有提審。古曆快十月時，省保安司令部的一個軍法官來通知我們說：“已電溫州保安司令部的人把你們押解回去，由防守司令部軍法處審判。”

押解我們回溫州的是押解我們出來的原班人馬，所以他們打開我們的鐐銬。曾猛看他們這次態度比前次好說話，就要求去看司機們。他社會經驗豐富，怕他們不答應，就說：“到那裏他們會招待你們，對你們的辛苦，會有表示。”他們答應了。司機一見我們就圍上來，要他講形勢。有個司機說：在席上邊吃邊談吧。他們擺了兩桌酒席。酒宴完畢，他們還用卡車送了我們一程，然後上船，在碼頭，一個司機給押解人員一筆錢，要他們在途中照顧我們。回到溫州，保安司令部把我們轉送到設在太平寺的溫台防守司令部。為什麼把我們解回溫州？因為朱鈐叛變，告發了“溫托”組織的全部活動。防守司令部沒有看守所，臨時把太平寺的三間醃鹹菜的矮屋裝上鐵門和鐵柵，

把我們關進去，和鹹菜為伍。

曾猛和我說定：我們開審時，矢口否認，軍事法庭一定提出朱鈐的證詞，我們就要求朱到庭對質。他若來，我們就借此把他痛罵一頓；他若不來，就說朱不敢來，證明他的證詞純系捏造。反正是死，也落得個痛快。結果，軍法處的軍法官說朱鈐避免對質。

曾猛和我商量：我們還是要設法托朋友營救。他經過妻子給陳素農和杜桐蓀寫信。杜當時是重慶軍事委員會外事局局長。陳素農接到信後，立即打電報給溫台防守司令部黃權，說明曾猛是他的朋友。黃和陳是陸軍大學同學。黃接到電報即來鹹菜間看曾猛，當場要曾猛搬出鹹菜間，另外安排房間給他住，我仍留在鹹菜間。杜桐蓀沒有回信，張沖卻來信了（當然是杜告訴張）。說浙江情況複雜，重慶鞭長莫及，除非他親自來浙江等等。這話是否推諉，不得而知。

曾猛搬出鹹菜間不到半個月又回來。他認為我們的終審判決近了，他準備自殺。我說：“自殺是弱者的行為。”他搖搖頭說：“不，槍斃並不比自殺更痛苦，但自殺是把死亡操縱在自己手裏，越飛不是在列寧像前自殺嗎？”但是，軍法處毫無動靜。這時來了一個新難友一曾定，我在平陽山門見過曾定。我說：“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又相逢。”曾猛的幽默勁上來了，說：“宗兄，你是共產黨員，我過去也是共產黨員，現在是托派，托派坐牢是當然的，但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你卻跟我們坐在一個牢房裏，真是幸會幸會。”

吳育到防守司令部來交涉，也來鹹菜間柵欄口探望曾定。他們講平陽蠻話，我們都聽不懂。他們談話結束，吳育要走時，曾猛喊住吳，說：“我們經李蔡志向你建議：我們兩黨聯合抗日，但你執行斯大林的命令，這是服從紀律，我不怪你。今天我們和你的同志曾定關在一處，客觀事實證明：凡是真正抗日的必然成為蔣介石的死敵，我看，你來交涉，不但不會有結果，而且，不久恐怕蔣介石把你也抓起來。我說的意思是應當記取中山艦事件、馬日事變及四·一二等血的教訓…”吳育不待曾猛說完，就表示歉意，不作答復走了。我們和曾定相處的日子裏，曾定從不跟我們爭論，但他對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從未流露過絲毫

懷疑和動搖；只表示承認我們是抗日的；對我們是托派表示惋惜。這一方面證明曾定立場堅定，另一方面也說明他是實事求是的。所以，我們相處得不錯，特別當我每天發高燒達39-41度時，他極為關懷，非常親切的護理。

溫台防守司令部軍法處通知：我們的案子已呈送軍事委員會，要我們聽候發落，曾猛要妻子立即寫信告訴陳素農。

1940年5月間，我因惡性瘧疾，連續發高燒二十一天，每天大半時間處於昏迷狀態。軍法處的警官，是我十中附小的同學，他大哥李聖恩是曾猛的朋友。他不忘舊情一直給我服藥，但毫無效果。曾猛要求他請胡長庚到看守所來為我診治。第二天李警官帶胡進來。胡診斷後對李說：希望准予保外就醫。否則，必死無疑。李警官如實報告軍法處，終於得到批准，但條件是必須在甌海醫院由胡醫治。當時胡是甌海醫院的內科主任。

陳素農知道我們的案子移送軍事委員會後，即要求他在軍委會的同學設法營救。據曾猛說，後來陳的同學要求軍委會參謀長（？）黃菊裳先生幫忙。下由於黃的出力，最後，軍委會指令溫台防守司令部准我們交保釋放。在我因病保外就醫後約兩個月，曾猛也交保出獄，但我們仍須隨傳隨到。

“溫托”組織因為主要人員被捕、逃亡而瓦解。曾猛從此脫離托派組織。

十、尾聲

1942年秋，我從上海回溫州，企圖恢復“溫托”組織，幾次約曾猛商談。他雖沒有拒絕，但因為對彭述之的不予原諒，耿耿於懷，始終不願作出恢復組織的行動。由於他持這種態度，受他影響的托派分子，也都沒有行動。因此，我恢復組織的企圖沒有成功。

1943年秋，有一天我偶然在路上遇見了他。他對我說要去碧湖浙江省行政人員訓練團工作。我問他：“你怎麼可以到那樣的地方去工作？”他說張沖囑該團教務長陳希豪到溫州來請他。他說：“這等於服兵役，不能拒絕應徵。”

抗戰勝利後，溫州中學遷回溫州。原托派分子金宸樞多年隨同校長金嶸軒先生工作。金宸樞向金校長

建議，聘任曾猛和何止爭任教。曾猛進溫州中學，名義是“公民”教員，但他上課講的不是“公民”課，都在講時事、講國內外形勢。

約在1947年，陳素農調任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第六軍官訓練班主任。1948年10月要曾猛到那裏工作，負責文書課課長（軍銜中校）。約在同時，陳在溫州競選偽“國大代表”。曾猛又替他策劃競選。但陳那次競選失敗。曾猛因為自己幫陳競選沒有成功，感到對不起陳。但陳並不在意，陳知道選票為地方勢力所把持，而陳一向在外做官，沒有地方勢力，失敗是當然的，因此陳仍帶曾猛去武漢。

（1948年下半年，曾猛從武漢回來。路過上海時，由餘嘉領他到中陸小學，原擬經由蔣振東去見鄭超麟，但到了那裏，鄭正在該校。鄭當時因曾猛社會關係複雜，避免和他談托派問題，只談大革命時期的往事）。曾猛回到溫州後，我在一個朋友家裏見到他，我問他對解放戰爭的看法，他說：“在武漢知道長江佈防情況，長江天塹，共產黨要渡江，不那麼容易，蔣介石手裏有錢，有裝備，誰抵抗共產黨，就給誰錢和裝備……”這些看法跟他以往的見解完全不同，而且和托洛茨基說的紅軍有一天會進大城市的話，也不符合。

溫州解放初，曾猛仍住里安的仙岩，溫州解放第二天，他被捕，，不多久，准予保外。他在家裏寫了一份自傳作為交代。鎮反時又被捕。後來轉解杭州，關押在杭州監獄。

1957年夏。政府集中各地關押的托派分子在上海、北京、瀋陽、鞍山、撫順、武漢等地參觀，我又見到了曾猛。有一天他心情沉重地對我說：“我的家累太重，我對不起秋君。但她也沒有為我著想。”這話在不知情況的人聽來，可能覺得含糊。但我完全知道這話的含義，這他對我講的最後的話，應該說是他的心聲。參觀總結寫好後，曾猛被送回杭州。三年自然災害中，在1960年，他患水腫病後去世。去世的確實月日迄今未查明。他的家屬是在1961年才接到杭州監獄的通知，說曾猛已死，囑領遺物。

從1950年到1960年，他被關了十年，至死沒有判決。

Continue to struggle for China'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89 Movement for Democracy

October Review

The 1989 great movement launched by students, workers and citizens for democracy,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nd against corruption and bureaucracy was brutally repressed by the ruling bureaucracy. However, over the last 20 years, the objectives of the 1989 movement for democracy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y are valid and necessary for Chinese society. The resumption of the ruling might of the bureaucracy has guaranteed it more arbitrariness and ardour in depriving the people of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and in pursuing corruption and graft.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n China is being carried out through a collusion of power and money; a large section of communist party cadres have legally appropriated public wealth and turned into upstarts, while capitalists have gained access to the ruling party, which is degenerating into a bourgeois party, and has even discarded its previous camouflage rhetoric of upholding "socialism" and "vanguard of proletariat". The slogan of "Mr Democracy" from the May 4 Movement of 1919 has still not secured its ground in China after 60 years of so-called New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society suffers from more differentiation and polarization. Former welfare securities have mostly been scrapped, and new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services are expensive, adding to the burden of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The threat of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grows, collusion between political officials and capitalists strengthens, and abuses are rampant. The struggles also accelerate on the seizure or occup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serious for peasants since their direct livelihood is made insecure. The agrarian issues continue to be most grave.

Such adverse policies from the state have deepened the grievances and anger of the people in the lower social strata. With social contradictions growing more and more acute,

more protests and revolts have taken place. In recent years, statistics have shown that people's resistances have been growing; in 2007 alone, there were 100,000 incidents of social unrest, and over 400,000 incidents of labour disputes. Indeed, the more repressive the regime, the more resistances there are.

Society advances with the persistence of struggles of th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fighting for democracy, freedom and livelihood. The advance of technology also enables more weapons such as the internet to be deployed by the people in their struggles. For example, exposures of injustice and calls for action are often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for the ruling autocracy to continue with extreme, brutal and arbitrary repression. Hence we find the current party-state leaders,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people, declare that they need to be concerned with the people's interests, and put up a posture of being liberal and open,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ir repressiveness is revealed time and again.

Today,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89 Movement for Democracy, we put forth the following demands and continue to struggle for their actualization:

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and the State Council should immediately announce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1989 Movement for Democracy and the "June 4 incident", and recognize that the movement was a peaceful practice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demonstration, rally, parade and gathering; the government's previou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1989 Movement as a "riot" should be revoked.
2. The party-state authorities should announce the full list of victims and casualties during the repression, compensate the families for their losses, and persecute the officials responsible for the repression.
3. The party-state authorities should immediately and unconditionally release all detained dissidents and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reinstate their political rights.

4. The one-party dictato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ould be abolished, and power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people for democratic politics to be implemented, for genuine democracy to be institutionalized, and for the people to be true master of the country.

5. All officials should be elected by the people in a democratic way, and should be monitored and recallable. All citizens should have the rights to vote, to be elected, and to monitor the authorities. The salaries and remuneration of all

officials should be comparable to ordinary workers, and corruption, graft and privileges of officials should be scrapped.

The struggle to remove social inequalities, poverty and injustic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tic rights. Only when there is institutionalized democracy will there be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the people.

20 May 2009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Qing Yan

With the erupti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China being part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is also directly affected. Unemployment becomes a critical issue with the drop in factory orders. On 2 February 2009, Chen Xiwen, director of the CCP Rural Work Department, said that in 2008, among the 1,300 million peasants who have migrated to the cities for jobs, 15.3%, that is, around 20 million workers, have lost their jobs and returned to their villages.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in November 2008 alone, in Henan Province,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amounted to 60,000 per day, much higher than past records. There were 21 million migrant peasant workers in Henan Province, of which 11 million work outside the Henan Province. Faced with this grave situation, the State Council in December 2008 called on the local authorities to prioritize their support for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Take Guangzhou as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Guangzhou Labour Department which conducted a survey of 397 enterprises employing over 260,000 workers in February 2009, in the first quarter, enterprises that recruit workers comprised only 58.7% of enterprises, compared to 70% a year ago. The number of workers to be recruited comprising the total number of workers also fell from 11% in the previous year to 7.12% this year. According to actual surveys on 16 occupations, the average monthly wages for unskilled

labour was 1,050 yuan, compared to 1,160 yuan previously. Up to February, 20.3% of job applicants in Guangzhou were new job seekers. This year's graduates in Guangzhou are 330,000. Together with the unemployed graduates from last year, the official magazine Lookout estimate was over 7 million.(Reuters, Beijing, 10 Jan 2009)

According to Zhou Tianyo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CP party School Research Centre, the real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in 2009 will rise to about 14%. The figure given by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is 9.4%. The problem would be hitting very hard on the most poverty-stricken regions, where un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comprise almost 30%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f the families were to rely solely on agriculture for their income, their average annual income could drop over ten times. In 2008, the per capita annual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was 4700 yuan, an increase by 8% over the previous year. Much of this increase came from migrant workers' jobs. Still this income is only one-third of an urban resident. It is also foreseen that with the mass return of peasants to their villages, land disputes will increase, and the demand for medical services will also increase. These ar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further social instability in China.

15 May 2009

目錄

香港	2	堅持港人治港，不要另一支管治隊伍.....	振言
六四	3	繼續努力爭取中國的民主人權——紀念八九民運「六四」二十週年.....	十月評論社
二十	4	特區政府每況愈下的表現.....	仲明
週年	5	史實不容歪曲！ 謬論須予揭破！.....	軍行
特輯	8	評價趙紫陽對八九民運的回憶	張開
中國	11	金融海嘯中的中國農民工.....	青岩
	14	大旱的警告.....	破謎
	16	中國南方航空公司：走向國際化的國家官僚資本主義.....	趙京
國際	20	經濟危機多方面地決定整個世界政治.....	弗朗索瓦·薩巴多
歐俄拉美	28	反資本主義歐洲左派會議聲明.....	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聲明
左派專頁	30	俄羅斯 資本主義左派和社會主義鬥爭.....	伊利亞·布德拉茨克斯，瑪麗亞·庫爾茲納
	37	拉丁美洲左派戰略.....	克勞迪奧·卡茨
歷史	43	40 年前的國家大屠殺 墨西哥 1968 年：社會爆發成政治舞臺.....	阿圖安·吉亞
回憶	53	曾猛其人 (下).....	石隆
英譯	62	Continue to struggle for China'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October Review
	63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Qing Yan

OCTOBER REVIEW VOL.36 ISSUE 1 2009.6.4

Hong Kong	2	Persist in Hong Kong people's autonomy.....	Zhen Yan
1989 June 4	3	Continue to struggle for China'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Special page	--	20 th anniversary of 1989 Movement.....	October Review
	4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going down the drain	Zhong Ming
	5	Historical facts must not be distorted!.....	Jun Xing
	8	On Zhao Ziyang's memoirs on the June 4 movement	Zhang Kai
China	11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Qing Yan
	14	The warning of serious droughts.....	Po Mi
	16	The China Southern Airline: internationalizing state bureaucratic capitalism ..	Zhao Jing
International	20	The crisis overdetermines world politics: Taking measure of the crisis.....	F. Sabado
Special page	28	Anti-Capitalist European left conference statement:	
On the Left		It's not for people and workers to pay for the crisis, the capitalists should pay!	
In Europe,	30	Russia: The Anticapitalist Left and Social Struggles	I. Boudraïtskis, M. Kurzina
Russia, LA	37	Strategies of the Left in Latin America	Claudio Katz
History	43	State massacre in Mexico 1968: society erupts onto the political stage	Arturo Anguiano
Memoir	53	Zeng Meng (part 2)	Shi Long
English Article	62	Continue to struggle for China'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October Review
	63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Qing Yan